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

VISIT…

2 020 8321 7

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

林一知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耀　岚
特约审稿：朱熹豪
封面设计：戴士和
封面画、插图：李　彤
　　陈晓林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

林一知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 13.75 插页 5 字数 195 千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012—X/C·4
统一书号：17118·180　印数：1—43,000

定价：2.08元

C38/07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

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序　言

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产品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理论已经从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转换。这是一个具有巨大社会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理论变革。

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提出了大量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经济理论工作者去探索，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社会各界都盼望早日见到中国自己的宏观经济学，我便在友人的鼓励下，斗胆操笔写出了《凯恩斯理论与中国经济》这部拙著。我是学工科的，半路出家学经济。正是由于我这种无知帮助了我，使我不带成见和无所顾忌地闯入了宏观经济学领域。许多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经济学素养，我凭自己的理论勇气向他们抛出一块砖头，希望能引出许多玉来。

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对于商品经济而言，不同制度的商品经济，同一种制度的不同发展时期的商品经济在形式和内容上是有差别的，但这些差别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引起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范围的不断延申和扩展，有些差别会逐渐缩小和趋于消灭。从长远观点来看，在宏观商品经济前面冠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不免有蛇足之嫌。

商品经济的本质就是市场经济。我们主张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实行有政府管理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宏观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理论。市场的力量主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心理力量，是人民大众创造与追求的力量。代表国家与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府，通过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市场力量，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品宏观经济学。政府管理市场经济，主要任务是保护市场经济的效率，实现社会的安全、稳定、公平和正义。市场经济是经济活力和效率的生态系统，它好比一辆由充满活力的马拉的车，在一般情况下，马知道沿着既定的路线以一定速度前进。政府好比驾车的驭手，手中握有法律的缰绳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鞭子。在必要时，政府运用

这些手段，控制马车的运行方向和速度，以达到预定的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宏观经济问题，其实质是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问题。

发达国家的政府，有着管理市场经济的丰富实践和经验。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宏观商品经济的理论体系。我们刚刚起步搞商品经济，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不能不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有关的成功理论，不能不突破传统的产品经济理论格局，闯出一条新路。在学术上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看成资本主义的专利品是不公正的。凯恩斯理论首先是属于商品经济的宏观理论，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珍珠。把产品经济理论看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必然结论也是错误的。马克思没有实践社会主义的经验，但他预言的产品经济形态是商品经济形态发展的产物，并没有强制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去实行产品经济。产品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大行其道，是马克思本人始料不及的历史误会。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宏观经济理论的人是凯恩斯。我在书中的有关理论部分，主要是借鉴凯恩斯的《通论》写成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能不能攻玉，还有待实践证明。孙中山先生说得

好："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期也。"改革需要改革的理论为指导，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实践。改革理论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到商品经济理论库中去发掘，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

宏观经济理论是为政府管理市场经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服务的。本书应用宏观商品经济理论，具体分析了一系列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对有关经济政策进行评论，为改革和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经济体制改革为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学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许多理论的争论问题都将受到实践的严格检验，使正确理论更快成熟。因为本书是学术性著作，对现行政策的评论也是学术行为，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此评论的影响，而对国家现行政策的效用发生怀疑。评论的目的在于影响决策者，影响未来的政策，而不是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

林一知

1985年8月于长沙

《走向未来》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包遵信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一咨
陈翰伯　钟沛璋　侯外庐　钱三强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金观涛

副主编：陈越光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良　王小强　王岐山　王军衔
王晓鲁　王　焱　尹蓝天　乐秀成
朱嘉明　朱熹豪　刘　东　刘青峰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阮芳斌
陈子伶　陈越光　易小冶　金观涛
秦晓鹰　贾新民　翁永曦　唐若昕
陶德荣　黄江南　董秀玉　樊洪业
戴士和

目　录

序　言

上篇　宏观商品经济学理论基础

第一章　生产要素共同创造效用 原 理…… 3
第二章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 关 系…… 17
第三章　有效总需求不足 原 理…… 23
第四章　工资 理 论…… 29
第五章　预 期 …… 37
第六章　所得、储蓄及投资的 定 义…… 49
第七章　储蓄与 投 资…… 63
第八章　消费倾向：（一）客观 因 素…… 71
第九章　消费倾向：（二）主观 因 素…… 81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与 乘 数…… 87
第十一章　资本的边际 效 率…… 103
第十二章　利率 通 论…… 113
第十三章　灵活偏好的 动 机…… 121
第十四章　资本的 性 质…… 131

第十五章　利息与货币的特性…… 139
第十六章　就业通论提要…… 145
第十七章　物价论…… 153
第十八章　其它…… 161

下篇　宏观商品经济问题探讨

第一部分　引论

第一章　市场与价格…… 180
第二章　供给和需求…… 205
第三章　国民经济的统计…… 217

第二部分　对国民产出的总需求分析

第一章　国民产出总需求的均衡…… 235
第二章　税收、赤字与通货膨胀…… 248

第三部分　货币供给和需求

第一章　货币供给分析…… 265
第二章　国家储备、货币发行和回笼…… 278
第三章　货币需求、供给的均衡…… 289

第四部分　宏观经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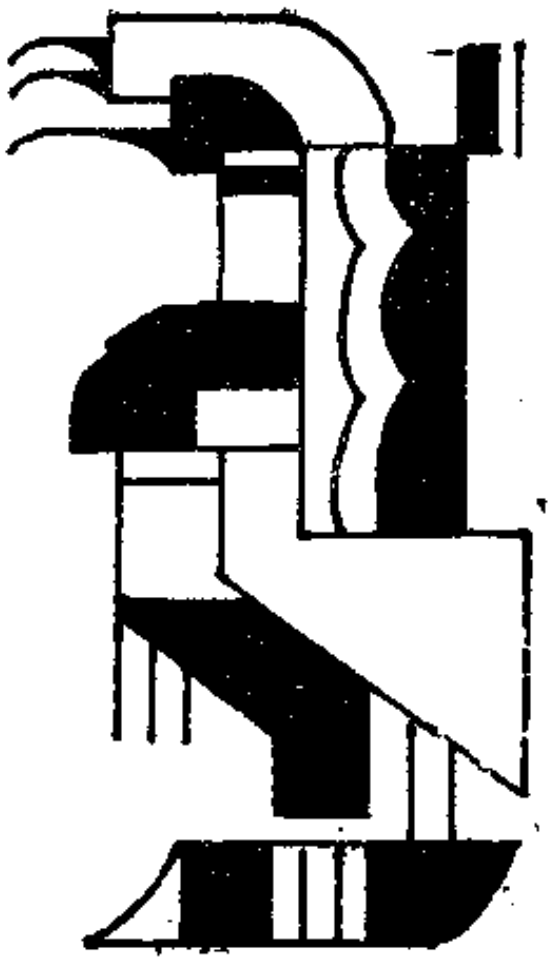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国民经济行为分析…… 307
第二章　近期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对策…… 316
第三章　远期经济发展问题…… 328

第五部分　国际经济问题

第一章　世界货币体系…… 343
第二章　国际贸易…… 353
结　语…… 378

上　篇

宏观商品经济学理论基础



第一章
生产要素
共同创造效用
原理

宏观商品经济理论，是商品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沿用了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古老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效用”原理，也就是萨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三位一体”宏观经济原理。

兹对生产要素共同创造效用原理，作如下讨论：

1. 国民财富的生产

萨伊认为，生产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生产因素协同活动，使自然界本来就有的各种物质，适宜于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

造效用。这种观点与亚当·斯密的观点不同。萨伊并没有采用劳动创造财富的传统观点。他认为：效用所体现的价值，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协同作用的结果。生产力三要素中，不管人力的作用多么重要（当今，人力中包括智力、技术），也不可能在现代生产中单独起作用。人的劳动总是与资本、自然力相结合的完整体系和过程。

如果从“生产力”这个范畴考察生产过程，萨伊的观点是经济学中的“自然”科学观点。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能有“自然”的色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联合劳动代替了雇佣劳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行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联合的社会主人翁间的关系。“生产力”的自然本性显现出来了，完全有条件把“生产力”作为一个“分离体”成为研究对象，从而找出其固有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萨伊的“生产力要素共同创造效用”的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力要素是这样表述的：劳动者、生产条件、劳动对象加上科技和信息。生产力是人征服自然创造效用的能力。人的因素是生产力诸因素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第一因素。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效用，以不断满足人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人所需要的效用，光靠“人”的单一因素是无法创造出来的，必

须与生产条件、劳动对象联合起作用。

“效用”同马克思（及以前的李嘉图、亚当·斯密等）的使用价值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是从商品分析入手，从劳动两重性到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推断，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只有人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概念。萨伊的“效用”不是从“商品”中推导出来的概念，而是从生产力、生产目的和消费—供给中直接得到的概念。我们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不习惯萨伊这种研究方法，情不自禁地采用司空见惯的方法，看待和处理另一个体系中的概念。

社会主义制度下，效用是用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物品或服务的功能。可见，效用是人的消费和需求的属性。人的需求是有时间空间性和心理偏好特点的，是动态和发展的具体需求；需求又是多层次的。由此可见，如何衡量“效用”，不单纯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供给问题，而是以需求为起点的供求综合问题。因为供给的效用存在一个为消费者承认的飞跃过程，反映这一过程的价值和价格概念，可以作为衡量“效用”数量的尺度。社会主义制度下，效用是价值的基础，价格是效用的尺度。这种“借用”，符合效用的供给—需求特性。毋

须多作说明，价格只能由供求关系所决定。萨伊的“价值”，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它是指由劳动力、生产条件、自然力协同创造效用中所支付的代价。三个生产要素的价值，是通过它们所创造的效用表现出来的。我们在财富生产问题上，把生产力三要素看作一个协调一致的系统，分别都对创造效用付出代价，可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特性。凡出了劳动力、资金和自然力的，都可以在联合劳动中得到平等的报酬。在一般情况下，资金和自然力是全社会公有的，体现了社会层次的联合劳动。劳动者直接的劳动组合体现经济实体间的联合劳动，分别按所投入的劳动力领取报酬。当然，资金也可以是劳动者个体所有，用自有资金形成的生产条件由于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不可能形成个人的完全占有。自有资金获得的报酬，是经社会扣除后的财富再分配，不是全部资金费用。今后，个人、集资办厂，照这个观点分析，是生产力因素的联合，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相结合的一种形式，都属于公有制总制度下的具体经济形式，而不是私有制。

2. 财富的分配

生产力三要素的独立作用，带来了分配的三个独立“报酬”。对应关系是：劳动—工资；资金—利息；土地—地租。土地在广义上包括了矿山、土地、山川、河流、森林、道路、公共设施等公有制的全部内容。工资、利息之中，都不包括社会的必要扣除在内。马克思批判过萨伊的“三位一体”观点，认为这个观点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使之成为绝对的和永恒的收入形式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包括管理者）都是社会的主人，生产条件和劳动对象（自然力）是社会公有的，把收入和分配看成对应的独立部分，正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特定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应用这一规律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厂长（经理）等生产经营管理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企业家和事业的开拓者，他们在管理性的劳动中按劳取酬。这种分配和工人的分配，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并不存在管理者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这种不合理的剥削现象。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工资是生产效用时

所付出活劳动的报酬。衡量活劳动量的尺度，在于以所创造效用为基础的、在流通中实现的价格。由于存在社会层次的联合劳动，产值工资率是作了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的数值，并不等于全部活劳动消耗量。

物质生产条件就是资金（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资金在创造效用过程中得到的报偿就是利润。资金是具有时间价值的，利息就是资金在生产服务中得到的报偿。这里，不必追究资金是否创造价值这样一个传统的疑问。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资金，本身是物化了的劳动，是生产力三因素协同的产物，其法学所有权是归全体劳动者的。资金具有时间价值的本身，已经包括在劳动创造财富之中。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者所得工资提高，工资中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会转化为物质生产条件，在新的再生产过程中，这一数量的资金将获得新的报酬归资金所有者，这是资金在生产服务中的报酬。我们已经习惯于“银行存款生息”的现象，谁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资金也会生息；现在，在个人集资、入股、购置生产资料方面，也应该生息。利息率决定于资本效率。可见，萨伊的观点在特定条件下是适用的。为了加速资金的流通，提高资金利用率和使用效果，明确提出与资金的生

产服务好坏相联系的资金报酬率概念，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有益无害的。如果不承认资金是生产中一个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也不承认资金要从生产服务中平等地（不管是国家资金或个人资金）获得利息，整个生产过程就会崩溃，发展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

社会主义土地报酬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房地产业的理论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存在土地使用权的流动现象，存在一个被掩盖的土地供一求的市场。土地的价格就是在这个市场上实现的供求双方妥协的产物。中国宪法规定土地是公有的，理论上也不承认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土地报酬和土地价格问题是很困难的。萨伊的“三位一体”理论，恰恰是打破这个理论僵局和解脱困境的[illegible]认为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使[illegible]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是一[illegible]生产要素，它在联合创造效用中获得自己[illegible]资本所有者仅仅通过获得利润来体现“所[illegible]生产者（经营者）通过三个要素共同创造出来的，无需由资本所有者直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只有资本化后，才能成为一个生产要素。对资本化后的土地归谁所有是个法学问题，而土地归谁使

用，才是真正的经济问题。土地资本公有制不等于官僚土地资本，而是全体劳动人民共同联合起来占有，是通过国家分配给具体单位和个人加以使用。中国土地已划归农民、企业、商店、单位使用。当使用权发生让渡时，就有一个土地的价格问题。双方议价主要依据是对土地这一资本要素在未来创造效用的估计和预期上；即：把土地看作独立的生产要素，在未来特定的生产（服务）组合中将创造多大的效用，取得多大的报酬。如果承认土地存在报酬（地租）问题，就同时承认了萨伊的“三位一体”理论，从而房地产的市场与价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土地的市场与价格是商品经济的客观存在，如实地承认它，就会调动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这笔财富的运动，就会发展成巨大的房地产业，创造日益增多的新财富。香港、深圳“炒地皮”获得巨大成功，其奥秘就在于此。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土地的价格，是影子价格，这是在理论上避实就虚的技巧性处理。影子价格是技术经济价格，因为它并不是市场价格，因此它象影子一样，不可捉摸。谁都知道重油用来铺路，其技术经济价值最大；但在实际使用中，大量重油却是用在技术经济价值不怎么高的燃料上。重油价格主要是由供给与对燃料重油需求双方决定的。用影子

价格的观点看待“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鸡蛋的影子价格将高得吓人，谁也吃不起这种价格的鸡蛋。谢天谢地，人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没有让影子价格变成市场价格。

3．财富的消费

萨伊在消费方面的观点是与生产、分配相配套的。他对消费的定义是：各种消费的直接结果是失去财富。他把消费分为非生产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两种。在非生产性消费（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中，满足需求的代价，是失去相应的财富；而生产性消费——创造新的财富，失去财富是为了得到新的更多的财富。生产性消费是萨伊消费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财富生产的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民对物质与文化的需要。这里，关键在于“不断满足”这四个字。非生产性消费看起来是直接目的，但这个目的会使社会财富逐渐耗尽。如果在进行非生产性消费过程中，不进行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消费，消费过程将会很快中止。我们有一个形象的讲法：“一要吃饭（非生产性消费），二要建设（生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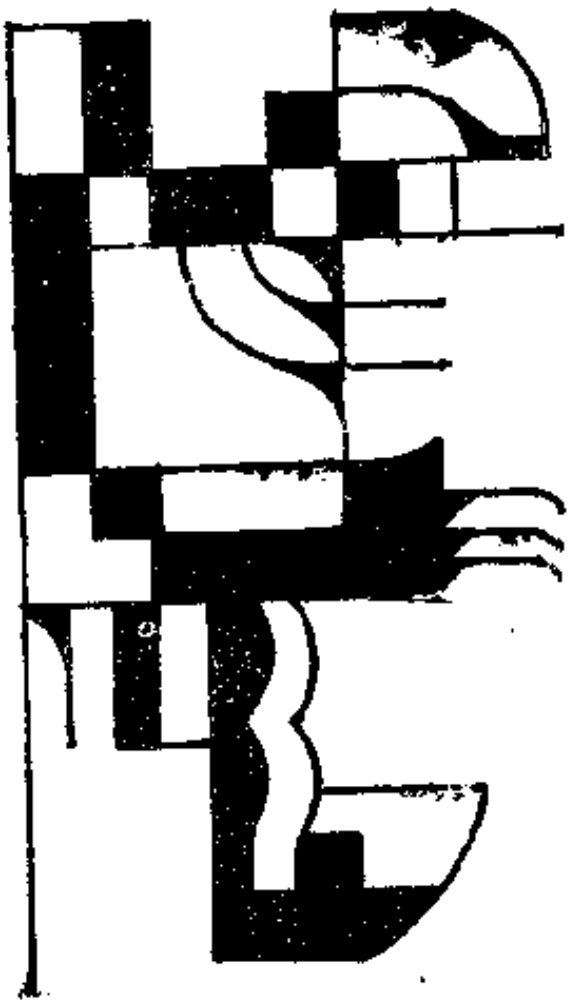
消费）。”财富的生产性消费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再生产理论的重要问题。只有进行一定规模的生产性消费，才可能达到“不断满足”非生产性消费的目的。

萨伊对非生产性消费的作用看得过于消极，他认为：“激励生产是英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我们认为，生产虽然决定消费，但消费也会刺激生产。需求不振，必然导致经济停滞。生产创造的效用不为消费者所接受，“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就得不到财富来分配。

生产性消费，是把财富转化成为新的生产力。这里有一个转化效率问题：当投入大于或等于产出时，虽也称作生产性消费，但对社会和投资者并无补益，这种消费是消极的浪费。当投入小于产出时，才是具有实质意义的生产性消费。我们过去的体制，把生产性消费看作单一的社会层次的消费，抑制了集体与个人的生产性消费，使投资效果恶化，不能得到更多的新财富。现在要改革这种体制，要允许集体、个人参加生产性消费，使投资者直接关心投资效果，并从投资中获得新的报偿，就能够大大改善全社会的生产性消费效果。

消费之中包含生产性消费内容后，刺激消费再不是萨伊所认为的“拙劣”政策，而是英明的政策

了。政府在指导和调节宏观国民经济活动中，主要的任务是刺激需求，特别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抓住需求这一环，就抓住了发展经济的“牛鼻子”。



第二章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

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供一求关系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经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社会对物品的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相匹配的，只要能生产出来，总是会有人买的，物品的价值总是会实现的。这是供一求自动均衡理论。

凯恩斯的《通论》则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发达国家）总需求要比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可能提供的总供给要小。这是近代的生产过剩理论，是唯一的宏观供求理论。

新古典主义学派，主张供求均衡理论。

产品经济理论，认为供不应求（又称短缺经济）是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体制的经济特征，是供应

不足理论，不属于商品供求失调理论范围的产品经济理论。

凡是主张供求均衡理论的学派，一般都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和管理；凡是主张供求失调理论的学派，一般都主张实行有管理的市场经济，提倡国家参与市场，用政策管理和影响市场。

宏观经济理论，是以供求失调理论为出发点的。换句话说，没有供求失调现象，就没有政府管理经济的必要，因而也没有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

对于商品经济而言，生产是企业的事。企业家担心的事，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只要市场需要的东西，企业家总会生产出来。因此，宏观商品经济学只能采取“有效总需求不足”的供求关系理论为自己的基础理论。这也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础。（有关内容详见《通论》）

附：论短缺经济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纳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特征时，指出短缺现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这是供求失调理论的例外。

供求问题，是商品经济的问题，商品经济的供

求理论无法覆盖产品经济问题。因此，短缺现象与供求失调理论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产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集权经济体制，用权力的关系代替市场关系，企业变成权力的附庸，供给的主体——企业丧失活力和效率，供求脱节。供给失去进取力，其结果必然是供不应求（或供非所求）。这是体制弊端的表现，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中国和东欧许多国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搞活企业，开放市场，对市场和企业实行间接管理，就会从根本上改变短缺现象，从而出现符合商品经济特征的“供应过剩”现象。当出现这种现象时，宏观经济问题才会被经济运行提出来，才谈得上如何运用供求关系理论制定宏观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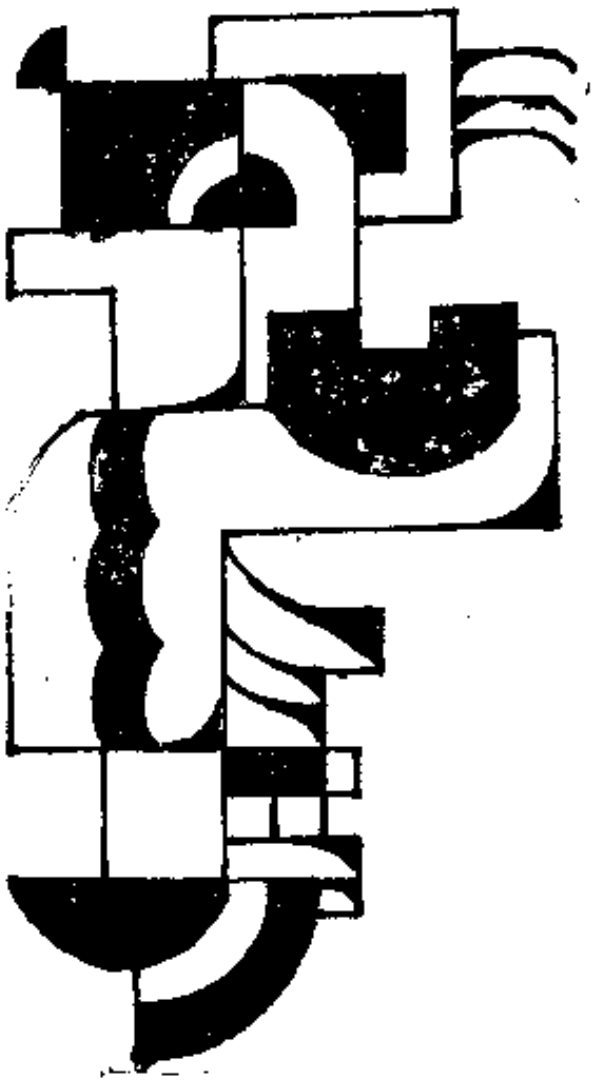
在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转换时，产品短缺现象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机会。可惜，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过高估计了这种转换的风险，忽视了迅速转变本身带来的巨大机会。结果是在谨慎有余的缓慢转变中，把发展经济的大好机会错过了。

改革过程中，短缺本身又是恢复产品经济体制的最大借口。当企业获得生机时，产品短缺现象会很快解决，但作为物化产品的灵魂的资金、资本、

外汇、生产资料、物价、工资等要素仍然紧紧地控制在国家手中，造成生产要素的短缺。这种短缺会引起当局的惊慌失措，把短缺归咎于“生产发展过快”，不得不重新把企业控制起来，造成人为的产品新短缺，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

在旧的产品经济模式下，提出“创造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经济环境”命题，是自相矛盾的命题。唯有及时、坚决地实行经济模式转换，才能够彻底解决短缺问题。

短缺程度与行政对产品及生产要素控制程度成正比。在经验上，越是短缺的东西就越要加强控制，控制的结果是更加短缺，陷入控制——短缺的恶性循环之中。在改革初期，旧体制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常常会患控制病，用控制来否定改革，使改革受挫折。因此，在改革战略上，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渡过新体制的劣势关，使新体制起主导作用，改革才会摆脱“寒热症”，走上坦途。两种体制胶着状态是改革最担风险的亚稳态，习惯势力最终会破坏这种状态，复辟旧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勇气比谨慎精神更可贵，改革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勇往直前，才能取得胜利。



第三章
有效总需求不足原理

有效总需求不足原理，是由社会心理法则决定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会出现阻碍经济顺利发展的“钝化反应”。象无机化学的氧化还原反应一样，生成物的浓度越大，逆反应的倾向也越大，正向反应逐渐被削弱，除非把反应生成物的浓度降低，或改变反应条件。宏观政策就是做降低反应物浓度或改变反应条件的工作。

“钝化反应”的社会心理原因是：当总供给增加时，需求增加量不如供给增加量大。这是一个可测量的经验和原则，无须多做烦琐的数理推导就能够成立。资本主义发展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有效总需求不足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了，于是才出现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革命，诞生了宏观经济学。

由于存在总需求不足的事实，相应出现了生产

能力过剩的现象。生产要素一方面是稀缺的，另一方面又是过剩的。造成资本闲置，产品积压，工人失业，新技术无法更多地被采用，带来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有效总需求不足原理是成立的。

有效总需求不足是商品经济的宏观属性。人类谋求财富的愿望和努力，总是超过所享受财富的限度，使一部分财富沉淀下来，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心理。各国政府在宏观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在本质上都是在做影响和调整社会心理的工作。

有效总需求不足不都是消极的商品经济属性。经济之所以能够不断向前发展，动力恰恰就在于有效总需求的不足需要补足。尽管这个“不足”是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但它引起了人们的无尽希望和不懈的追求，把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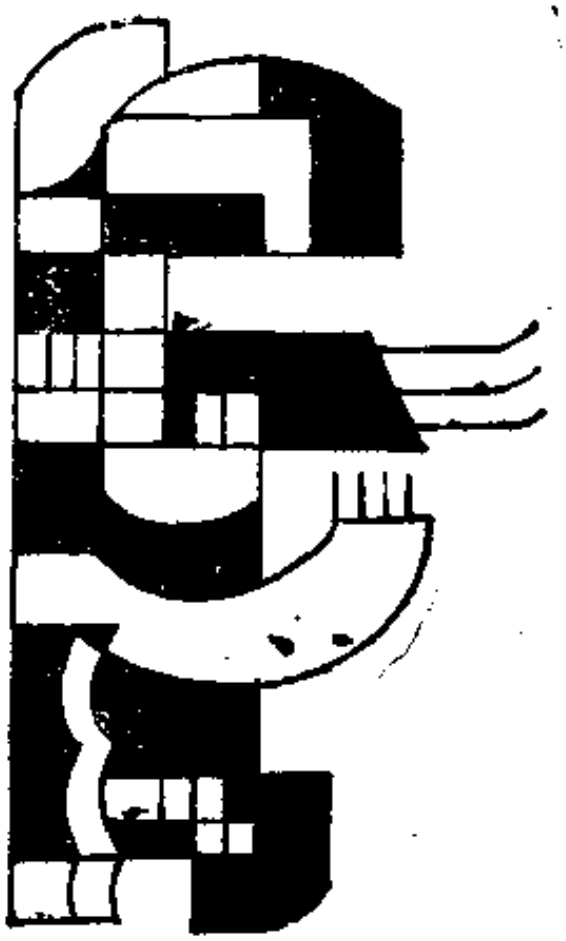
说明：有效总需求这一概念，是指：社会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这时的总需求不是纯粹的需求一方的愿望，而是供求双方共处一体，互相较量后实现的有效需求。

社会心理，主要指：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等社会经济心理。经济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人的

心理力量成为影响经济运动的根本力量。因此，有人把一个社会的心理力量看作是发展经济的第一资源，并把努力开发心理资源作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

有效总需求不足是凯恩斯就业理论中的重要结论，它是通过对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关系中推导出来的普遍原理。有效总需求不足通常是指对劳动力总需求的不足，存在不自愿的失业现象。广义而言，就业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就业和已有生产力的利用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效总需求不足”，是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又一表达方式。

学术界所理解的“总需求”，是居民消费、投资和政府消费的总和。在商品经济模式下，这种意义的总需求不足，也是一个不移的真理。但在产品经济模式下，供应活力不振（同样也存在生产能力的闲置），总需求相比之下，不是不足，而是“膨胀”。用商品经济理论去解释产品经济现象，无疑是一种逻辑错误。由此可见，在经济理论上实现新旧模式的转换是多么迫切和重要了。



第四章
工　资　理　论

宏观商品经济的工资总水平，是指在劳动力供求市场上实现的总价格。总价格水平与就业水平是严格对应的，也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因此，工资总水平在通常情况下，受劳动力总需求不足原理的制约，总是落在充分就业工资总水平以下。在就业队伍以外，保持着一支“不自愿失业”队伍。

假设全部劳动力都就业，就必须严格服从两个条件：一是就业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至少要等于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失业虽会引起工资的节约，但却因此减少产出，抵消了工资的节约。这时的临界状态，称做“工资等于劳动力边际产出”。二是就业者的工资水平控制在不会导致别人失业的界限上，好歹大家都有工作，都有一碗饭吃。这叫做

“工资的效用恰恰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以上两个条件是很难满足的。首先，企业吸收劳动力（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能满足“工资等于劳动力边际产出”这个条件，而是还要额外追求预期利润。在边际产出与预期利润水平线以下，企业即不再吸收劳动力了。其次，在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工资效用是一个不确定数，找不到一种机制来灵活调节就业工资水平，实现“工资效用恰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由此可见，充分就业的工资水平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有人认为，在经济不景气年代，只要降低工资水平，就能够减少失业，这是严重的误会。不景气的经济并不会降低劳动力的效用，工人也不会因为不景气的经济而自动降低工资水平。工资水平降不下来，就业量就要减少。用调节工资水平的方法调节就业水平通常是行不通的。工资水平只上不下的刚性特性，使宏观的收入政策无法奏效。

以上所说的工资水平，是指的货币工资水平，而不是指真实（货币工资购买力）工资水平。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对资方作出的任何货币工资的削减决定，总要进行顽强抵抗，引起社会问题。但工会却不可能对每一次生活费用的上涨作出反应。（除非价格上涨太猛，使真实工资低于目前就业量

的边际负效用。）因为，货币购买力的改变，是全社会的综合经济行为，全体社会成员都受其影响，找不到抵抗的比较标准和抵抗对象。资方并不是改变货币购买力的罪魁祸首。削减货币工资水平的政策主体是政府，工会就会找到他们的抵抗对象。社会的稳定是进行正常经济活动的环境。为了社会安全，国家不得不放弃工资这个宏观经济杠杆，无条件地把工资问题交给市场去处理。

货币工资的刚性特性，可以成为衡量是否存在不自愿失业的标准。当货币购买力稍有降低时，现行货币工资下的劳动力总需求量和总供给量趋向增大，则称作有不自愿失业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就业队伍之外，存在一个愿意就业而无法就业的“不自愿失业”队伍，在等待就业机会的到来。当物价上涨时（或货币工资购买力稍有下降时），不自愿失业现象便显现出来了。

真实工资水平除受价格影响以外，还与资本量有关。通常在设备不增加的情况下，增加就业量，就会使真实工资下降。我国在长期以来实行广就业政策，让企业在不扩大规模的情况下吸收劳动力，降低了劳动力的效用，降低了真实工资水平。其机制是：广就业引起货币工资水平上升，造成费用推动型的物价上涨，从而使真实工资下降。

附：凯恩斯论货币工资的改变

经典学派认为：不能充分就业，是因为工人不愿意降低货币工资，咎由自取，不是他们充分就业理论的过错。他们把货币工资的弹性看作自动调整就业的特性。现实经济生活并非如此。人们都知道：货币工资特性呈刚性，并有不可逆性。

对货币工资弹性的未经论证的结论，是十分迷惑人的。通常人们很少站在已有的事实上理论此事，多半是凭主观愿望作符合经典结论的解释：首先他们认为货币工资减少时，并不影响总需求。由此出发，降低货币工资→降低成本（利润增加）→降低价格→刺激需求→增加就业即增加产量（资本不变）→降低劳力边际效率→降低货币工资（直至劳资双方均衡）。

然而，就业量是有效需求（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函数。有效需求只与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表、利率三者有关。总需求不变，就业量就不可能有变化，降低货币工资也无法实现。货币工资的下降，就降低了总需求，与总需求共处一体的总供给也随之下降，就业量就要减少。所谓减少货币工资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刺激需求的神话被打破了。

问题归结为：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对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有何影响。

1．当货币工资下降时，物价也随着下降，引起对真实所得的重新分配，降低了消费倾向；另外，也影响资本边际效率。

2．货币工资相对与之贸易的外国货币工资减低，将推动出口，有利投资（影响资本边际效率）。同时，贸易顺差将恶化贸易的顺利发展，为此，必然增加对进口的需求。

3．货币工资减少，影响人们对未来工资水平的预期，从而影响对资本边际效率的预期。

4．工资总支出的减少，加上物价与货币所得的减少，将减低社会的灵活偏好表。

5．工人为其切身利益抵制和反抗货币工资的减少，而很难反抗物价上涨造成的真实工资的下降。使货币工资呈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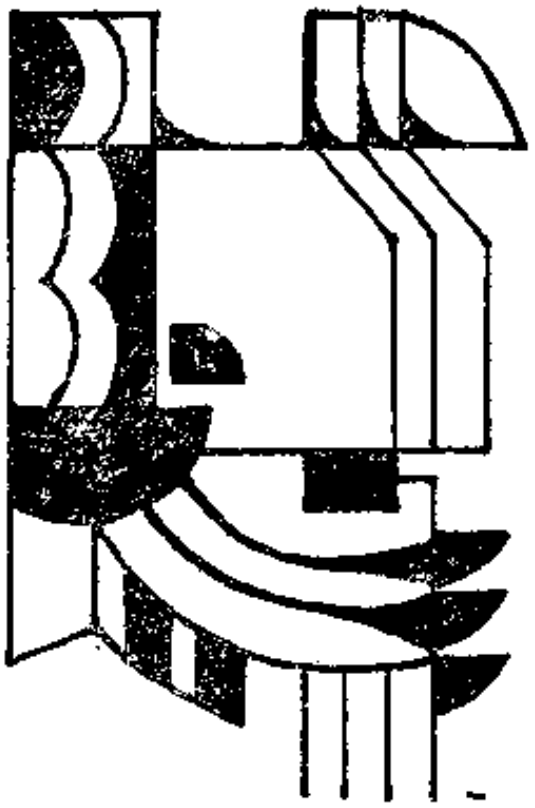
6．改变货币数量是政府当局可以控制的。选择一个有弹性的货币数量政策，比选择一个有弹性的工资政策容易而有效得多。

7．用减少货币工资来增加货币数量，导致雇主产生盲目乐观的投资情绪，不适时宜的过量投资，将使债务成比例增加，这是很不明智的办法。

8．为使利率下降而采取减少货币工资政策，会

使资本边际效率蒙受双重不利影响，阻抑投资。因为降低货币工资产生虚假的货币数量（牺牲消费），在影响已有资本效率的基础上，投入同样低效率的资本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以上各种因素都说明，降低货币工资，一是不可能，二是不智，三是有害无益。中国的统制工资体制，似乎可以由政府用计划的形式加以随意变更而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计划当局看来，货币工资政策象橡皮一样，是一种由国家控制的弹性政策。实行统制的工资体制只是统制经济总体制中的一个环节，没有一部完整的单一计划（排斥市场）的机器，工资这一环是无法运转的。



第五章
预　　期

“一切生产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生产者总是希望获得最大利润。由于从生产到实现利润还需要走入市场这个裁判所，由消费者与生产者在较量中达到均衡后，才是生产者所能得到的。生产者总是在尽力对结果进行预期，并在预期基础上行动。预期是经济动力学中重要的心理动力。社会的社会心理资源丰度，将决定经济发展的强度。排斥预期，经济学将陷入机械唯物论泥淖。

影响决策的预期可分为短期预期与长期预期两种。短期预期（short-term expectation）主要对正在开始生产产品的价格预期；长期预期（long-term expectation）是在购买资本设备时所作的对未来报酬的预期。对报酬、价格的预期影响着生产

者的决策，导致经济扩张或收缩的运动，决定某一特征的经济状态。决定就业水平的，主要是对资本未来报酬的预期。对未来预期是一个不断受到近期预期的结果影响和修正的动态过程。一系列长期预期产生一系列预期状态。“一个旧的改变尚未充分展开其影响以前，一个新的改变早就又加上来了。故在任何一特定时间，经济机构中有许多错综叠陈的活动存在，都是各种预期的产物。”

对经济运动起关键作用的是长期预期。这是立足短期预期基础上，包含全部现实经济信息的预期。随着经济发展的社会化与国际化，预期的规模、内容在扩大，预期的方法、手段也在进步。预期对于有机的社会经济系统，犹如人的智能行为一样（当然是人的活动综合表现）。人们不仅能对外界信息作出直接反应，还能够对信息进行综合加工，制造新的更重要的信息，新信息的反馈使经济系统修正运动轨迹，纠正异常和偏离，走向持续稳定的发展。当今发达社会的经济系统已经进化到能进行主观思考的程度，已经从被动反应走向主动反应的新阶段。主观思考与主动反应就表现为全社会范围对未来的预期。分解开来看，对未来的预期是千千万万企业家、消费者、金融家和政府预期的总和。每一个个别的预期都有“主观”性和荒唐的成分，

正如人的大脑细胞不是每一个细胞都作同样的反应一样，但集团（总体）反应却只能是一个。没有千千万万主观、荒唐的预期，就不可能有整个经济系统的总预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预期。任何高明的政府预期，都不能代替经济系统的总预期。政府预期也是主观预期的一种，政府有自己的利益和偏见，并且这种利益与偏见总是与企业、消费者利益相对立的。国家代表公众，但公众却很难理解“国防消费”是什么，把它称作“令人遗憾的消费”；政府的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总是以解决紧迫问题——大量是社会、政治问题而制定的，或多或少损害着消费者和生产者某一方、某一阶层人的利益。从总体而言，从一个过程而言，政府的经济政策是惠及人民的，是对发展生产有积极意义的。但纠正偏向，改变发展速度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牛顿的力学定律指出：物体运动状态改变（包括改变运动方向和变速）总是伴随着力的改变。这个定律的表述方式，可以为经济学所应用。每一种经济状态的改变，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预期就是施加作用的力，它改变经济体系的方向、结构和速度。

预期的概念是如此重要，以致经济学缺了它，就缺了一块基石。

附：长期预期状态

资本的边际效率取决于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和它的未来收益的关系；一个当前的投资量，存在一个与之相应的资本边际效率；投资量又是取决于利率与资本的边际效率表的互相关系。

人们进行长期预期，总是从现在开始出发的。现有事实加上对未来的预测构成预期。现有事实主要是：1．目前各类资本资产及一般资本资产的数量；2．目前有何种消费品工业需要扩充，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扩充资产应考虑未来资本的类型与数量、消费者的嗜尚、有效需求强度、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的大小以及这些因素在资产寿命期内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心理预期状态总称为长期预期状态。

1．长期预期的作用

未来是从现在发展而成的，所以依据目前事实推测未来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未来是未经历过的，毕竟不是事实，无论如何不可能与预期的一毫不差。特别是长期预期，不确定因素太多，主观的

成规和习惯也起很大作用。因此在进行预测时，往往会把自己熟悉的东西也看成影响未来的主要东西；把自己不熟悉的，认为眼前不重要的因素加以忽视，而这些因素有可能是影响未来的重要因素。尽管预测技术与方法、手段有了长足的进步，预测学形成了一门学科，技术方法的改进却无法代替人们的第一次选择。虽然预测速度和精确度有所提高，但总不免带有经验和主观色彩。预期，特别对一国、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的预测，是如此远离实际，以致经济学家们怀疑预测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和作用，这是不公道的。人类是在预期和希望带动下前进，取得今日的成效和美好的明天。许多预期被发展粉碎了，历史就是踏着这些碎片铺陈的道路向前，向前！

实业界对预期的作用坚信不移，在进行预测时充满自信，并忠实地按预期行事。没有千千万万实业家的这种自信和努力，就不可能产生联系现在与未来的边际资本效率，虽然自信不是直接影响投资量的因素。

2. 长期预期的发展

投资充满了风险。越是谨慎的人，风险也就越吓人。光靠对风险的估计，投资是不容易实现的。好在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是投资风险的恐惧者，而是投资成功的追求者。历史证明，只要不是太蠢，办实业成功的机会是很多的。人们投资往往顾不上细细盘算到底在资产寿命期内能赚多少，甚至象参加有奖储蓄一样，只是大略估计得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够了。尽管得奖（特别是头奖）的几率很小，轮到自己头上机会更小，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中头奖。这是办实业的心理现象，企业家好象在玩一种既靠本领又靠运气的游戏。这种心理长盛不衰，代代相传，表现了投资者的信心和勇气。新技术产业投资风险是比较大的，一旦成功，其收益也是大的。在美国大量涌现开发新技术产业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促成了新的产业革命。

经济社会化带来了经营者与投资者的分离，提高了投资效率。投资者不亲自经营，证券交易市场每天每时都在对投资作一次估价，使投资者可以依据行情，及时调整投资方向和数量。经营者与投资

者一样可以充分利用股票市场进行投机。投资的这种机制，使经济体系变得活跃和不稳定。但资金的高效率流通和灵敏的调节，使预期行为更具客观意义，主观与经验色彩淡漠了。人们想象中，证券交易纯粹是主观投机行为，可以为少数人所欺骗和左右，认为是消极的东西，这是莫大的误解。商品经济在过去造就了市场，造就了银行这两个精妙的机器；现代又创造了“证券市场”这部更神奇的机器，使多数储蓄者都变成精明的投资者，他们都参加对未来的预期；使多数经营者都进入证券市场，接受投资者的检验，他们也在对未来进行预期；并使两者预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股票价格成了证券市场的平均预期。活跃的股票市场具有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政局动荡时，股票市场价格会大起大落，这恰好是公众投资信心的指标。

越是运动的体系，越是大的体系，越具有稳定性。和牛顿力学原理一样，大质量的运动体，是容易保持其原来的运动状态的。投资系统成为投资市场之后，就是一个运动的大体系，除非有一股强大的力量（特殊理由的预期）起作用，在通常情况下，现存状况将不定期地延续下去。这是经济学家默契遵守的一条通例（或成规）。股票的流动性在宏观上表现出了投资的稳定性。犹如气体在某一状

态下，具有稳定的温度、压力和体积间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是靠气体分子作热运动（布朗运动）实现的。就局部气体分子而言，其运动具有随意性和短期内的起伏，但所有这些个性的统计，表现出明显的共性。

证券市场上活跃着一批职业投资者，他们互相斗智，都想高人一筹，从未来的变化中捞一把。他们的活动会不会搅乱投资市场呢？不会！这些人无论多么高明，也不可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高明是相对的，不可能人人都高明，有人高明，必然有人不高明，并且两者是等效的。十个能干的人抢坐八把椅子，在某一瞬间，总有二个人坐不到位子，这种游戏无论怎么玩，不幸运者总是20%。置身竞赛的人，往往不是在作竞赛本身的努力，而偏于对参加竞赛人群行为的揣测，高明者会进行高级别多层次的揣测。比如全国投票选最佳女演员（或歌唱家和运动员）的活动，投票者很少考虑谁是真的最佳女演员，佳在何处；往往更注重于对别人将选谁的揣度，特别是研究大多数人将怎样选，最可能选谁；高级的投票者甚至研究一般人将如何估计一般人认为最佳者。所有这些活动，都不会影响最终选出一个最佳女演员，人选者总是得票最多的。投机本身是在很复杂的心理指导下的活动，多数偏

离了所追求的问题本身，但总不会偏离社会将实现的目标。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投资市场的形成，使边际资本效率和总预期变得更符合实际了。

希腊船王的发迹史，好象是一个例外。他预期石油运输业的兴起（在海运萧条期），预购了大量油船，作了大胆的违反投资市场常规的投资，冒了很大的风险。事实说明他成功了，获得了与风险相应的成功。对世界海运业而言，在行业范围内，还不可能形成世界性的投资市场，希腊船王的预期和千千万万企业家的预期一样，仅仅是他自己凭才能与运气所作的预期。如果把这个预期包括在世界投资总预期之内，恰恰构成了当时的预期。他的成功和其他成功者一样，毫无奇特之处。正因为他冒的风险大，投资量大，所以引人注目。

上例可见，不同考察的范围，有不同结论。研究长期预期状态，首先要选好观察体系。

经营者的信心只是投资问题的一个侧面。投资者不可能满足无限的借款愿望。因为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投资者的信心成了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投资者的信心主要表现在对经营者信用状态（state of credit）的估价。由于政治等非经济原因，使投资者失去信心，导致证券价格的崩溃，也就引起边际资本效率的崩溃，爆发了经济大萧条危

机。这时资金既不用于消费，又不进入投资，对经济起了重大的、累积性的破坏作用。

发展至今天，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的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政府力量已经参与其中起作用。国家储备系统在证券市场吞吐通货，并征收高额资产转手税。这个发展趋势使投资市场更为复杂化，政府的预期成了影响投资的又一因素。凯恩斯主张政府有引导和刺激投资的职能，不能听凭市场起作用。特别是在萧条期间，政府的努力，可以避免和减轻因资本边际效率崩溃造成的破坏性后果。

政府参与投资市场活动要比政府直接成为经营者好得多。我国包揽投资的体制并不成功。改革要朝开放投资市场方向发展，让全体劳动者都成为投资者和有机会成为经营者，国家参加进去加以调节，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投资体制。

第六章
所得、储蓄及投资的定义

1. 对所得的定义

通常人们对所得的理解是：在任何一段时间内的销售收入扣除销售成本后，即为本期所得。宏观经济学的所得，是按生产要素协同生产效用的理论来表达的。以下以资本（属雇主所有）和劳动力两要素为前提条件进行讨论：

设F为原素成本（数值上等于工资）

U为使用者成本（为获得所得而牺牲的资本价值）

A为生产要素协同创造的价值。

U+F称生产A的直接成本

雇主（资本所有者）获得资本报酬（毛利）为A－（U+F）（对某企业而言）

社会总所得包括原素成本与雇主所得的总和：即为$\Sigma(A-U)$

设本期雇主从其他雇主那里购买了A_1的资本品，则社会全体成员在本期的消费（C）

$$C=\Sigma(A-A')$$

社会在本期内的总投资（I），在数值上等于因生产A所牺牲的资本价值（U）。在不考虑本期资本新的投入情况下（$A_1=0$），$I=-U$。

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是一系列假设就业量及其对应预期收益的函数。在总需求函数曲线上，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点：这一点的就业水平所提供的产品，可以以一定的价格出售，使雇主的预期利润最大化。

供给价决定于边际收益。它等于边际使用者成本与边际原素成本之和，即等于边际直接成本。

雇主净所得，即通常所说的可用所得（available income）。净所得在数值上等于毛利(gross profit）再扣除一笔估计的补充成本（V）后，得到的收入。这个收入是雇主决定花费或储蓄限度的依据。

补充成本V，是指不自愿但不是不可逆料的资本设备折旧，它等于预期折旧超出使用者成本(U)的部分。非自愿主要指市场价值的改变导致损失（包括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设备的精神磨损），或天

灾人祸使资本设备蒙受损失。这种预期超过U的 折旧V，并不进入使用者成本之内，故须在毛利 中扣除，才能得到可用收入。

凯恩斯当时还没有提出“精神磨损”和“技术性折旧”概念，但他对“资本设备的时耗作了充分的估计和探讨。他把刚购置资本设备时所预期的补充成本称做基本补充成本；以后根据当时的价格、技术情况重行估计的当前预期，称做当前 补 充 成本。这些预期，都在影响净所得，也影响对所得的分配（股息）和消费。很明显，折旧是一个既固定又游移的数值。折旧政策应该充分考虑这个特点，把应提的折旧提足，以补充耗损了的资本设备，使生产过程得以延续。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净所得是国民生产总值减折旧后的国民生产净值，即总净所得 $=\Sigma(A-U-V)$，是全社会该期可用的所得。我国以往把折旧看作预算外的资金，看作与国家财政收入相抵触的“遗憾消费”，人为地压低折旧率，并由国家强行集中一部分折旧费用于新的资本设备投资。企业对补充成本的预期行为完全被 排 除 在外。该提的补充成本和使用者成本没提足，造成对资本设备“掠夺性经营”，耗竭了资本要素，破坏了生产力。这种政策是“杀鸡取 蛋”、“竭 泽 而渔”的自杀政策，不单是“复制古董”的问题。至

今，对企业应采取怎样的折旧政策仍争论不休：财政认为提高折旧率将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企业认为再不提高折旧率，企业就无法应付市场竞争。我们有些经济工作者并不熟悉商品经济形态下的折旧理论与实践，不了解折旧是使用资本设备的代价，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主观地争论折旧政策问题，是不会有结果的。把削减折旧当作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把所增加的收入重新分配到消费和投资中去，是国民财富“虚收”的根子。国家集中一部分折旧费的做法无异于“剜肉补疮”。企业无法自我复原和成长，反而伤了企业的元气。当今，经济发达国家采取加速折旧政策，以使企业更新改造速度与产品更新周期同步乃至超前，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人认为中国目前企业成本高，经济效益低，对折旧忍受能力差，因此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的经验。我认为这种议论颠倒了因果关系。事实上正因为折旧率低，企业无力实现自我更新和技术进步，旧的工艺、设备导致了企业成本升高，效益下降。越是压低折旧率，越是陷入恶性循环。为今之计，就是要制定一个鼓励企业技术进步的折旧政策，恢复企业元气，才谈得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越是目前这种困难境况，越要尽早决策提高折旧率，容不得半点迟疑。

2. 对储蓄与投资的定义

储蓄是所得减消费开支。对“所得”，上一节已经作了明白的定义。设A为总所得；A_1为雇主之间互相买卖的总值；U为全体雇主总使用者成本；V为总补充成本。

则　　所得 $= A - U$

消费 $= A - A_1$

储蓄 $= (A - U) - (A - A_1) = A_1 - U$

净储蓄 $= A_1 - U - V$

本期投资等于本期内资本设备的价值增益，在数值上等于本期所得扣除消费后的余额（即储蓄）。同理，本期净投资 = 净储蓄 $= A_1 - U - V$。储蓄量是企业消费行为的总结果；投资量是雇主投资行为的总结果；两者必然相等。这是经济系统的生产——消费——投资整体性的属性。不难证明，

所得 = 消费 + 投资

储蓄 = 所得 − 消费

因此

储蓄 = 投资

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是出售给消费者，就是售

给其他生产者；每个生产者本期投资又等于从其他生产者那里买的设备减去自己的使用者成本。可见，生产者与消费者或生产者与资本设备购置者之间的交易，具有互向性和双重性。就社会全体而论，消费后余下的所得（即储蓄）必然等于资本设备的价值增益。投资与消费来源于所得，在恒定的所得下，投资与消费是以等量反向增减的。投资每增加一个数额，储蓄就要增加一个数额，消费就要减少一个数额。这种全社会的收支均衡的实现条件，取决于产品可以实现一个均衡价。现实经济生活告诉我们：社会上有种种心理反应和习惯，他们互相较量后，总会实现均衡价格，在这个价格下，愿买的数量与愿卖的数量恰恰相等。产品实现市场价值，使所得可用货币加以准确的衡量，从而消费、储蓄、投资都可以用货币准确计量了。

研究消费行为时，由于所得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消费欲望总是大于消费能力，显得收入不足，不得不牺牲某些支出。在决定所得的用途时，总是要在投资与消费之间进行调整，并表现出明显的消费倾向。

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国民经济统计原理：总所得等于总支出。支出可以看作广义的消费，包括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和对资本物品的消费。由此引伸出

另一个国民经济统计原理是：总储蓄等于总投资（净储蓄与净投资的关系亦然）。

必须说明，以上是建立在纯粹竞争市场模型上，只有企业与居民存在情况下的结论。有了这个背景的结论，讨论有政府干预，有垄断寡头起作用，有国际贸易存在的现实经济模型的问题就不难了。

附：论使用者成本

经典学派忽视了“使用者成本”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带来了价值论的重大缺陷。为了正确理解凯恩斯的价值论，有必要对“使用者成本”作进一步探讨。

设 A_1 为某雇主购买其他雇主物品的价值

G为期末原资本设备的实际价值

B′ 为不生产时，对资本设备支出的最适度的维护改良费

G′ 为不生产时，资本设备期终可能有的价值

I 为本期中雇主对其资本设备的投资

U 售量为A时使用者成本

依照定义：

$$U = A_1 + (G' - B') - G$$

证明： 雇主上期移交下来的资本设备最大净价值

为（$G'-B'$）

本期增加的资本设备价值 $= G-(G'-B')$

据前述定义，$I=G-(G'-B')$

∵使用者成本 $U=A_1-I$

（或储蓄 $=A_1-U$，储蓄 $=I$）

∴$U=A_1-[G-(G'-B')]$

$=A_1+[G'-B')-G$

此式可以表达为：雇主在本期内购买其他雇主的资本物品连同上期结转的资本设备最大净值一起投入生产A的运行，由于生产A的磨损，期末只剩下G的资本设备价值，$A_1+(G'-B')-G$即为生产A付出的资本设备代价，这就称做销售量A的使用者成本U。此式还可改写为：$U=(G'-B')-(G-A_1)$

$G-A_1$是期末投入生产后的资本净值扣除本期新补充的资本设备价值后的资本净值余额，是投入生产后的净值。

即：上期结余的资本净值（$G'-B'$），与本期末资本净值的余额之差，就是生产A所蒙受的资本损失。

从使用者成本概念出发，可以得到一厂产品短期供给价格的定义：

一厂短期供给价格＝边际原素成本＋边际使用

者成本

在现代价值论中，往往忽略边际使用者成本对一厂短期供给价格的影响，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粗心处置。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因生产边际产量引起资本设备的边际负投资。可见，一厂短期供给价格等于边际直接成本。

长期供给价格与短期供给价格相比，与长期价格相关的不仅是对直接成本这一项的预期，还要考虑：补充成本的预期；投资的实际报酬与预期报酬不相符的未知可能性的风险成本（risk cost）；资金使用成本（即利息成本）。故当生产者决定购买或建造资本设备时，边际直接成本与平均直接成本之间的差值应等于补充成本、风险成本及利息成本之和。设相对产量的边际直接成本曲线总是连续的，在曲线上可以找到一个点，在这一点上，边际直接成本恰等于平均直接成本和补充成本的和，这是一个盈亏分歧点，在这一点上，企业既不赚也不赔。当产量大于此点产量时，企业可获得净利润；当产量小于这一点产量时，企业就要亏损。

事实上，由于资本设备能力并不是无限的，产量也不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一定量资本设备当产量低于某一点时，边际直接成本曲线也会变的不连续。为了使边际分析不致崩溃，必须规定约束条件

和有解空间。在讨论长期均衡中的短期供给价格时，不连续点附近的分析方法，不能采用“增量”法，而要应用“减量”法，从反向求得产量减少时的边际直接成本。

如果本期的全部折旧由于某种理由包括在原素成本之内，使用者成本（除外购外）与补充成本等值，但符号相反，互相抵消。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边际原素成本超过平均原素成本这一部分，须等于利息成本与风险成本的和；如果补充成本计入使用者成本之内，则补充成本等于零。

使用者成本并不是越低越好。采用高效率的先进资本设备虽然会提高使用者的成本，但它将降低原素成本。如果综合的直接成本并不因为采用先进资本设备而升高，企业总是乐于采用的。相反，采用陈旧落后的资本设备无疑将减少使用者成本，但这是一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节约，导致原素成本、补充成本大幅度增加，企业收益下降。当然，以上讨论涉及面是较窄的。从宏观上看，降低原素成本和使用者成本，对有效需求水平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资本设备有不同的规模效益，与产量有很大关系。不同产量条件下评价不同的资本设备经济性，受需求影响较大。特别是社会总资本技术水平，是经济发展的综合体现，与企业的微观决策有

很大区别。

用动态的观点看待使用者成本问题，要用预期与贴现方法进行分析。企业经常要对如下问题进行决策：在决定生产规模时，是现在使用其设备，还是留在将来再用？如果要增加设备，是购买新的还是修理旧的？是现在购买，还是将来购买？不同选择都有不同的使用者成本。使用者成本在时序上的分布都要贴现成现值，以便与边际预期售价、收益进行比较，才能择优而行。使用者成本问题，是一个投资决策问题，利息成本、风险成本、市场价格及变化、产品产量、资本设备经济寿命、债务、收益的时间分布等都在影响使用者的成本。这一类问题的数量研究已经在工程经济中趋向成熟，这里不再赘述。

第七章
储蓄与投资

从全社会看，储蓄与投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二者必然相等。之所以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两者不相等，主要是对投资或所得的定义各不相同引起的。

1. 投资与资本

投资通常指一个法人购买一件新的或旧的资产。偶尔也用于在证券市场上购买资产。一般说，投资是在支配所得中，用于购买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的行为。出售资本资产则称负投资。就一个企业的投资而言，可能存在债务及其偿还问题（不全是用自己的所得）；对全社会而言，债务与债权之间总是互相抵消的。

投资必然引起资本资产的增益。（包括固定资本、运用资本或流动资本）

把握上述两个要点，投资的定义就严密地确定下来了。投资也是一种需求和消费，是对资本商品的特殊需求与消费。这种消费不仅不会耗费财富，而且会增加财富。眼前对资本物品的购买，是为了将来获得预期的更大收益，所以投资又可以称为以赢利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资本并不是资金，我们许多同志不敢承认社会主义存在资本这个现实。好象一提起资本一词，一个毛孔滴血的凶煞神的形象就浮现在眼前。这是一种迷信造成的恐惧。资本是什么？就是生产要素的结合体，是生产力的具体化。社会主义是一个为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保障的先进制度，很难想象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具体化了的生产力——资本。资本掌握在劳动者手中，与劳动者结合在一起，有十分可爱的形象，难道我们不正是为追求此形象而努力奋斗？！

生产者总是设法获得现在与未来的最大利润。生产者购置的资本设备，都有一定的经济寿命，在寿命期内生产者总是要从该资本设备中获得最大的报酬。可以使企业实现最大利润的就业量，则决定于总需求函数。总需求函数又决定于生产者在种种假设之下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因此雇主对未来收益

的预期是决定投资行为的起点。

2. 再论储蓄等于投资

相当多的人认为，储蓄以可不等于投资。这是一种经济视觉错误造成的。对银行而言，储蓄者握有的债权并不是银行自身的，而是那些过量消费的负债人的债务。债权具体内容是资产。一个人要想获得他原来所没有的资产，只有向社会购买与储蓄价值相当的资产（新的或者旧的）。因此，有储蓄发生，必然会伴随着新的投资。宏观经济学的这种道理，就象镜面对称一样，储蓄与投资是与银行成镜面对称的。社会的总储蓄如果不能够转化为等量的社会总投资，储蓄就将丧失其价值，所得就要减少，经济过程将会中断。全社会对投资收益的预期，推动投资和储蓄行为的发生和继续，在长期均衡中，投资、储蓄交融成一个有机体，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微妙的平衡，犹如人体内分泌、体液平衡一样。

银行依据信用可以创造投资，是不是出现了无储蓄的投资？从长期均衡看来，银行不可能凭空创造投资。新增的投资往往是在扩大就业、提高产出

之后，引起的储蓄增加。短期内对一个局部而言，可能存在赤字投资现象。但体现在一个社会的一个长期均衡过程，就象赊购一样，债务总是要偿清的。用局部和静止的观点看待储蓄与投资，是无法理解储蓄等于投资这个结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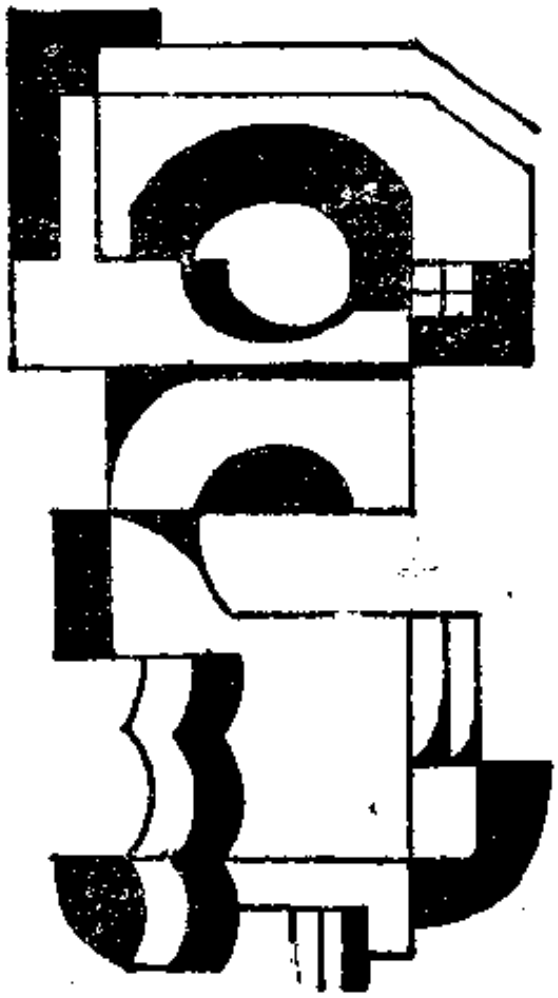
储蓄对个人而言，完全是“自由意志”，并不需要顾及储蓄是否会变为投资。对全社会而言，如果人人都只有储蓄而没有投资将会是怎样情景？资本物品的生产因无人购买而无所得，无所得就无所储蓄，全社会所得就减少，纯储蓄的倾向就会崩溃。如果储蓄量小于投资量时，就会增加全社会所得水平，使得人们愿意增加储蓄，最终导致投资量与储蓄相等。

货币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银行体系所创造的现款数量恰等于各人持有货币总和。这个命题与投资等于储蓄是一致的。因为持有货币量是从所得中来的，是以商品和物价为依据的。凡购买了商品的，便丧失了货币；凡持有货币，便有商品剩余。银行体系所创造货币数量被另一部分人借去购买了剩余商品。如果银行不创造这部分货币，这部分剩余商品无法实现价值和所得。这部分商品被购买前，因商品剩余，必然影响所得和物价，从而调节人们的持有货币量，直到持有量等于银行体系所创

造的货币数量为止。

一个基本事实是：有一买者必有一个卖者。一个人的交易量是渺小的，故忽视需求的两面性是无关大局的。但要研究总需求这个宏观问题，这种忽略就会出现大的谬误。

凯恩斯并没有对“银行体系所创造的现款数量恰等于各人持有货币的总和”命题作出动态和长期均衡的说明。但他在解释这个命题时提到了持有货币对所得和物价的影响，从而调节了持有货币的数量。在我读到这里时，认为有必要把深藏的这一精粹明白地揭露出来，为货币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本人曾经把商业银行创造活期存款（通货）的能力归结为与社会经济节奏相联系的现象，其本质仍然是货币的动态与长期均衡问题。



第八章
消费倾向：
（一）客观因素

1. 影响消费倾向的两类因素

凯恩斯写《通论》的目的，在于发现是什么力量决定就业量。前面已经建立起一个初步结论，即就业量定于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的交点。总供给函数的反函数就是就业函数（employment function）。

就业量是总供给函数的自变量。就业量变化引起可预期“收益”的变化。收益（proceeds）是该就业量下的消费量和投资量的和。由此可知，影响就业量主要是消费量和投资量。

某一就业量下的消费量将是多少？这个问题把就业量（N）与消费量（C）联系起来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归结为C、N的函数关系。

一个社会的消费量取决于下列三个因素：

1．所得数量；

2．其他客观环境；

3．该社会各组成成员主观需要、心理倾向、心理习惯，以及财富在他们之中分配的政策制度。

总之，影响消费因素不外主观与客观两大类。主观因素包括人性的心理特征、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凯恩斯理论中，“人性的心理特征”、“经济行为”、“倾向”、“预期”这些概念是最具特色的理论基础。

2．客观因素

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主要有如下六个：

1．工资单位的改变

消费量（C）在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真实所得”的函数，而不是货币所得的函数。而一个人的真实所得随可支配劳动力单位的变化而变化（设技术、嗜尚以及决定所得分配的社会条件不变），也就是说消费随着以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变化而变化。工资单位与总产量、就业量及分配制度有一定

关系，因而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工资单位对消费的准确反映。但工资单位变化方向与消费是一致的，用它研究“消费倾向”这个宏观问题是适用的。作为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之一也是无可非议的。

2．净所得的变化

影响一个人消费的与其说是所得，毋宁说是净所得。在特定情况下，所得与净所得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唯一的函数关系。我们研究消费倾向，关心的是所得变化导致净所得的变化，唯有净所得的变化才影响消费。

3．资本货币价值的意外改变（不包括在净所得之内）

资本货币价值的意外改变与所得或净所得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但这种改变对资本所有者的消费量有敏感的影响。它是在短期内改变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前面说过投资也是一种消费，用消费观点看待资本货币价值的变化是理所当然的。

4．时间贴现率的改变

严格说来，时间贴现率并不是利率，而是指现在与未来物品的交换比例。时间贴现率包括了货币购买力的改变和风险（如政府没收、夭折）因素，这些因素明显地影响着消费倾向。利率反映的

是货币供求的均衡价格，它对当前消费的影响是复杂且不确定的，主要是通过影响证券及其他资产的价值来影响消费。当然也会多少影响储蓄倾向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在个人所得不变下，由于短期小幅度的利率变动对消费影响不大，权且把利率作为时间贴现率的替代指标是可行的。

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经常在估量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来修正消费行为。明知货币将贬值时，往往会加大消费。这种对未来发展的反常反应，实质上也是时间贴现率在起作用。

5．财政政策的改变

在政府的作用下，财政政策的改变将影响社会总所得的分配。象利率影响储蓄一样，税率影响着消费倾向。政府向外借债或还债，引起总所得在一国范围外的输出和输入，也将导致有效需求的剧烈涨缩。

6．个人对其未来所得预期的改变

宏观的消费倾向与个人对未来所得预期改变关系并不明显。除非全社会的个人预期朝一个方向改变，但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从以上六点可见，宏观的消费倾向的变化，主要是受宏观因素的影响。消费倾向本身就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通常情况下，影响总需求函

数中的消费倾向，所得是主要变数。

3. 宏观经济学的制动原理

消费倾向对一个社会而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函数。一般说来，总消费量是决定于总所得量的。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消费，但消费增加量不如所得增加量那么大。这是一个社会消费的心理法则。设Cw代表消费量，Yw代表所得（二者都以工资单位计算），这个法则的数学表达式为：$\frac{dC_w}{dY_w}<1$。还有一个事实：当所得下降时，消费量也会下降，但后者下降量没有前者大，式$\frac{dC_w}{dY_w}<1$仍然成立。

这是消费的阻尼效应，是宏观经济学的制动原理。在经济扩张时，就业增加引起总所得的增加，并不会全部用于消费；在经济收缩时，就业减少引起总所得的下降，并不会使消费作同量的下降。这种机制缓和了经济变动的冲击力，使经济系统保持稳定。

很明显，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就业量的增加，引起消费量的增加；又因为消费增加赶

不上就业量的增加（总供给价格增加），就会出现因投资不足引起的对就业扩张的制动。因为就业量只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

4. 关于折旧问题的再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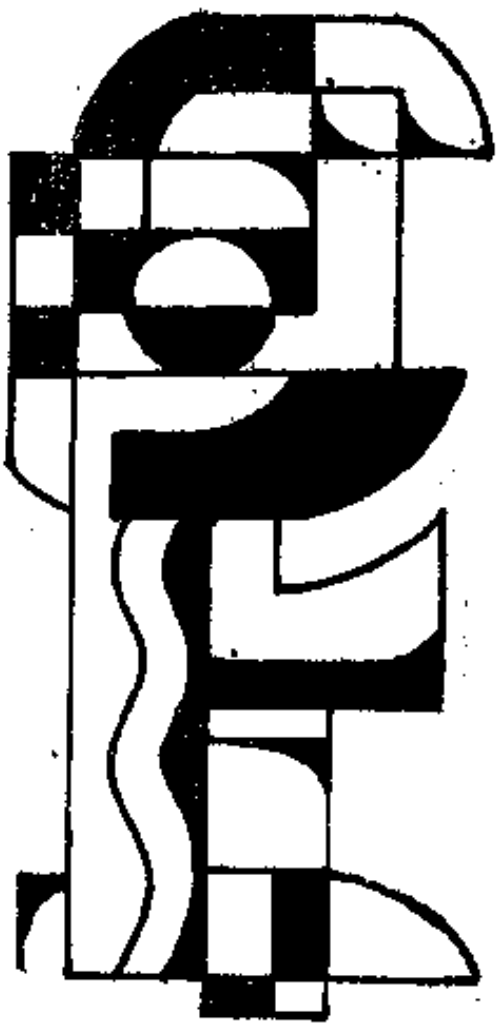
经济活动中，有一笔资金是从总所得中抽出来，用之于未来对资本设备的补偿（总称折旧）。这笔所得既不能用之于当前的投资，又不能用于当前的消费。如果这笔所得超过当前的实际维持费，无疑将对就业产生影响。折旧是对资产损耗的补偿，但却不是即期补偿。不连续的补偿之间，就会出现即期总资产价值下降的倾向，从而影响就业量。即期的投资需求与当前资本设备损耗几乎毫无关系。从微观上看，在旧设备重置之前（经济寿命期）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折旧从消费者手中夺去了一份消费能力，减少了当前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在加速折旧的财政政策下，这种因素对就业的影响就更加明显。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净所得等于总所得减折旧。折旧成了降低消费倾向的消极行为。这与上述“加强企业自我改造能力”不是矛盾吗？我认为要全面认识折旧的作用，必须从宏

观上进行综合考察。每一期都有一定的折旧，每一期都有一定的资本设备复元（不是简单的复元，而是指资本价值的补偿），这是经济自恢复的维持简单再生产能力，没有这种自恢复能力，社会经济系统就会崩溃。另外，消费的广义含义应扩大到包括支配、使用折旧费的投资在内。现实经济生活中，几乎没有发生过简单的自恢复投资现象，总是把折旧基金与新的发展投资捆在一起，在预期的引导下进行了包括补偿消失资本在内的综合投资。折旧成了企业的一项收益，成为清偿投资债务的产出。工程经济中计算投资收益率时，总是把折旧看作收入。可见投资与折旧已经交融一体，密不可分。在有银行的世界上，很难想象有一笔巨额货币不进入流通——既不用于消费，又不用于投资。即使埋在地里，银行也会通过创造货币把它调动出来。在消费时，只要我们不把现存资本设备"吃掉"，对损耗部分给予补偿，就是坚持了折旧的正确含义。至于怎么补偿，不是问题的实质。

从社会观点看来，折旧多少是与现在的资本产品生产相联系的，不是企业或政府的主观意愿或财政的分配问题。如果政府过分干涉折旧，就会造成折旧与实物生产脱节，减少总需求，损害公共福利。用之于未来的消费是很难预作恰当准备的。所

得愈多，储蓄额也愈大，运用投资的困难也越大。这样，人们对未来消费的预期成了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经济愈发展，获得对未来的均衡就越困难。问题归结为资本与消费间的依存关系：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如果减低消费倾向，不仅将减少消费需求，同时减少了对资本的需求。这个道理可以这样理解：消费资料是通过资本生产出来的；增加了消费，如果不同时增加资本，消费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也是一种消费，正确运用政府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同样可以引起新的投资，从而扩大就业。

中国急需提高折旧率是没有异议的。但政府如果不在政策上为企业技术改造准备条件（比如先进设备的生产），急剧提高折旧只会减低社会消费倾向，反而削弱投资，出现事与愿违的结局。明智的做法是，政府增加消费，大量购买物品和劳务，提高社会总需求。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有能力提高消费而没有努力去做，大量资金在低效率的经济体制中空耗掉了。打开投资大门的钥匙不是投资本身，而在它的对面——消费。



第九章
消费倾向：
（二） 主观因素

影响消费量的另一个因素是主观的、社会的动机。一般有如下八种动机，影响人们不以其所得用之于消费。

（一）建立准备金，以备不时之需或以防不测之变；

（二）预先对未来所得减少或消费扩大的储蓄（如退休、子女教育费、亲属扶养费）；

（三）为了获得利息和增值，即愿意牺牲一个较小的现在消费，以获得较大的未来消费；

（四）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不断改善（人类的本能），对未来模糊的追求（非实物）的需求；

（五）为了成功和表现自己能力的需求；

（六）为了获得从事投机或发展事业的本钱；

（七）为后人留下财产；

（八）满足对财富的占有欲，纯粹的吝啬欲（一贯遏制消费，过分节约）。

行为科学称以上八种动机为八种不同的需求，即谨慎、远虑、计算、改善、独立、企业、自豪、贪婪；相应的消费动机为：享受、短见、慷慨、失算、炫耀、奢侈。以上动机都引起个人对所得的储蓄。

除个人储蓄以外，还有大量所得由政府、社团、企业储蓄。这部分储蓄的动机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企业动机——不依靠市场或举债，使自己具有更大的资本投资能力和自主权；

（二）流动动机——为应付意外和不景气，储备流动资源（liquid resources）；

（三）改善动机——以储蓄调节丰歉，使所得逐年有所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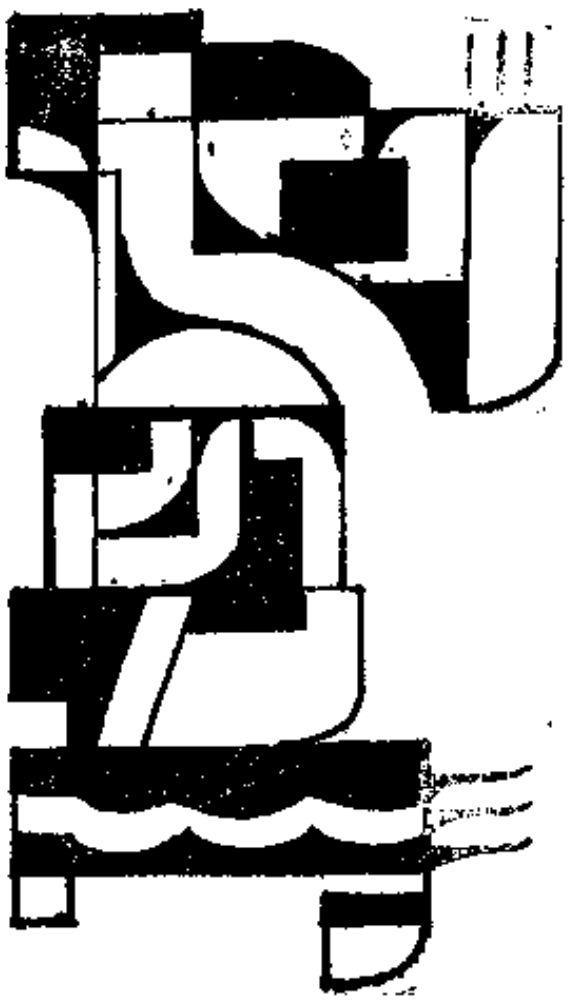
（四）谨慎动机——为更早偿清债务和跟随技术进步，加速折旧，采取谨慎稳健的财政政策。

以上动机既有顺向行为，又有逆向行为。动机的强度与经济制度、经济组织、种族、教育、成规、宗教及流行的道德观念等因素所形成的习惯，与现在的希望和过去的经验，与资本规模、技术水平及财富的分配办法，与社会各阶层已经确立的生活水

平都有很大关系。这些构成主观消费动机的背景，而背景对一特定的研究对象是确定的。

消费倾向是复杂背景下的全社会综合行为，因此具有很大的惯性。在短期内消费量的变化，决不是消费倾向的变化引起的，而是由于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变化引起的。

利率的变动对消费量的影响是比较曲折的。提高利率表面上看会增加储蓄，但它抑制了投资；投资上不去，所得就要减少，导致消费和储蓄的下降。因此，提高利率使储蓄和消费同时都下降。利率是通过影响投资来影响所得水平反射到消费和储蓄中来。经典学派颂扬节俭为美德，那是他们认为提高利率就一定提高储蓄从而提供充分就业的条件，这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



第十章
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

1. 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

前面提到的所得增减引起消费增减的反向制动原理(消费阻尼效应)，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法则。表达为：

$$\frac{dC_w}{dY_w}<1$$

兹称$\frac{dC_w}{dY_w}$为边际消费倾向。它表示产量（收入）再增加一些时，这个增量(ΔY_w)将怎样在消费与投资间分配。

因为$\Delta Y_w = \Delta C_w + \Delta I_w$

（其中：ΔC_w为消费增量ΔI_w为投资增量）

设K为投资乘数，则

$$\Delta Yw = K \cdot \Delta Iw$$

那么边际消费倾向为：

$$\frac{\Delta Cw}{\Delta Yw} = \frac{\Delta Yw - \Delta Iw}{K\Delta Iw}$$

$$= \frac{K\Delta Iw - \Delta Iw}{K\Delta Iw}$$

$$= 1 - \frac{1}{K}$$

$\because \quad 1 - \frac{1}{K} < 1$；故可知$K > 1$

从数学的处理中，不经心地引入了K这个投资乘数，它的经济学含义是：当总投资量增加时，总所得之增量将K倍于投资增量。

乘数概念是卡恩(R.F.Kahn)在《国内投资与失业之关系》一文（载〔Economic Journal〕1931.№6）中首先创用的。他的主要论点是：设在各种假设情况下，消费倾向及其他条件不变，又设金融机关或其他政府机关设法刺激或阻挠投资，则就业量将随投资数量之净增减而增减。该文的目的，在于建立几个一般原则，用来估计投资净增量与由此引起的总就业量增量——二者之间实际数量关系。

人们把所得增加的一部分用于消费，从而刺激生产，增加所得，改变了对所得的分配，使得储蓄的增加恰等于投资的增加。乘数原理告诉我们：人们

总所得要有较大的增加，才足以引诱人们作出增加就业所需投资的额外储蓄。可见，乘数是人们心理倾向的函数，更进一步推论，乘数也是生产资料工业与生活资料工业生产情况的函数。

乘数是符合经济实际情况的。增加对生产资料的投资，就会增加这些工业的就业，增加总所得和消费，从而刺激消费品工业的扩张，使得就业总增量大于生产资料工业中的就业增量。边际消费倾向 $1-\frac{1}{K}$ 趋近1时，K就是一个很大的数。这时就业对投资变动十分敏感。投资量稍许的变动就会引起就业和所得的大幅度变化；当 $1-\frac{1}{K}\to O$ 时 $K\to 1$；就业对投资变动反应不敏感。敏感型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就业所需投资量小，容易控制；迟钝型解决就业问题，要大量投资，则很棘手。实际的边际消费倾向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偏向敏感型。这种混合型的边际消费倾向，兼有两个极端的坏处：就业量变动大，达到充分就业所需的投资量也大。这好象一个人患了两种病因相反的病，病情危急，又无从下药。

在接近充分就业以前，增加就业和总真实所得的同时，物价也随着上涨。当达到充分就业后，再增加投资将导致物价无限制地上涨，出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

2. 政府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

政府投资对消费量的影响如何？为了应用上述结论，须假设政府投资不影响其他方面的投资；消费倾向也不会因政府投资而变动。卡恩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投资会引起如下问题：

（一）政府投资来自总所得，政府吸收了一部分所得的货币，引起市场货币利率上升；政府投资扩大就业量，物价上涨，增加对流动资金的需要，也将迫使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意味着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这些因素将导致私人投资的收缩，出现了“挤出效应”。

（二）政府投资会影响社会心理，影响公众信心。或增加对消费的灵活偏好，或降低预期中的资本边际效率，使私人投资减少。

（三）在经济国际化的今天，政府投资的乘数作用往往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去，为外国增加就业机会。国际贸易的逆差，将耗费所得的一部分用于进口消费，减少了国内消费和投资。

政府投资量变动较大时，会改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改变乘数。一般情况下，就业量变化方向

与边际消费倾向变化方向相反。

上述各因素有互相加强的趋势。因为：1.短期内投资的增加有报酬递减现象。就业量的增加会使雇主所得在总所得中所占比例上升，而雇主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要小于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2.失业的存在，引起另一部分人（私人或政府）作负储蓄。政府的投资引起失业者的就业，增加的社会真实所得效果是双重的，因此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更大。

无论如何，当投资净增量小时，乘数值大；净增量大时，乘数值小。式 $\Delta Yw = K \Delta Iw$，即 $K = \frac{\Delta Yw}{\Delta Iw}$，$\Delta Iw$与K成反比。边际消费倾向 $= 1 - \frac{1}{K}$ $= \frac{\Delta Cw}{\Delta Yw}$可以从K值中求得边际消费倾向。

政府的税收、投资与外贸活动都可能降低K值，使投资增量对经济的影响相对缩小，象稳定器一样对经济起内稳定作用。

诚然，中国就业问题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要严重的多，是体制不合理带来的经济现象。在政府严格和具体的控制下人们对是否就业没有主动权，经济本身的力量也不起作用，因此上述讨论的结论对我们很难理解和接受。中国经济在低收入、低消费状态下运行了三十多年，国家投资是唯一的社会投

资，投资与所得、消费完全脱节，名义上的高投资并没有给就业带来明显的好处。消费是投资的起点。很难想象在抑制和冻结消费的情况下，投资反而会发生和发展，这是违反常识的。至今，国家仍然进行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投资，这类投资从道理上想象是对的，实际上却违背了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品工业之间的乘数关系。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本意在于“补课”，在于纠正历史形成的结构畸形。但经济体制不改变，内在的经济机制不恢复，光靠政府用行政办法来纠正，一是没有能力纠正；二是无从纠正。病根在哪里？病情如何？怎样下药？畸形也是一种均衡状态。多少基础设施，多少生产资料工业，多少消费品工业都在实际上与边际消费倾向相适应，都有客观存在的一个乘数（哪怕是畸形乘数）。我们在经济上最紧迫的改革莫过于解除对经济的过分包办和控制，让经济成为自在的有生命的机体，恢复自我发展、自我调节的功能，使经济运行走上正常化。在这个基础上，政府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参加进去，施加积极影响，这就是大家熟称的宏观控制。

对中国经济进行科学分析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凯恩斯并没遇到过高度集权的经济问题，不了解高度集权产生的丰富多姿的、崭新的经济现象。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可宝贵的集权经济实践经验，虽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民族代价和经济代价，但这个代价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的改革作出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宏观经济学一般是从只有居民和企业的极端情形下，以纯粹竞争市场为背景，讨论重大的经济学原理和原则。中国则是从另一个极端：只存在政府和全社会统一控制的情况下进行长期实践，对宏观经济控制有很大的发言权。如果能很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一个完整的更高水平的宏观经济学就会诞生。《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在中国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就是这种结合的新宏观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界而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对商品经济学不熟悉，而不是计划本身。当然，计划本身也具有崭新的内容。为此，深入研究凯恩斯的《通论》，是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3. 投资到产出的传递过程

实际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量并不立即等于生产资料工业产量的增量，而是逐渐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值也不是一直保持在正常值上，而是逐渐回到正

常值。这种表现为时间上的滞后现象，又称传递过程和时滞现象，靠生产资料工业与生活资料工业间的互相作用达到最终的均衡。可以讨论一种极端情况：设生产资料工业就业量增加时，生活资料产量并未增加，前者把增加所得的一部分用于消费，相应的消费品不足，引起价格上涨。这将引起一部分消费的延期，增加了储蓄，存货量减少。在新的价格下，消费品供需达到暂时的均衡。这个均衡是以延期消费和减少库存为代价的，这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和乘数皆暂时变小。很明显，这时总投资增量小于资本品工业的投资增量。经过一段时间后，消费品工业得以发展，消费品供应适应了新的需求，延期消费得到满足。这时，边际消费倾向值暂时超过正常值。超过部分恰等于延期消费部分，最后实现了正常的均衡值。当存货恢复原状时，总投资的增量暂时大于资本品工业的投资增量。

经济是一个过程，从发动到运行到结果是一个变化着的动态过程。这个变化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在社会心理与价值规律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乘数原理是适用于每一时刻的普遍原理，它不是一个过程的原理。用乘数原理可以预测生产资料工业扩张时的就业量。生产资料工业的扩张，必须对生活消费品工业作相应扩张，否则，单向扩张是

无法实现的。这种连锁关系，正是乘数原理的事实依据。

4. 对贫穷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的讨论

上述的一些结论：边际消费倾向愈大，乘数值愈大，一特定量的投资变动所引起的就业变动也愈大，是否也适用于贫穷的社会？讨论这个问题，对我国有现实意义。

贫穷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比发达社会高，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总所得水平低，人不敷出，总是把最大量的收入用之于消费。贫穷社会本来投资就不足，即使有较大的投资增量，乘数亦较大，但那只是一个相对量。与基础失业量相比，对就业量的绝对量不会产生明显作用。同样，贫穷社会可能会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但那也仅仅是一个相对量，与很高的平均消费倾向相比，对绝对量影响甚微。可见，对经济落后国家，上述原理虽仍然成立，但并不象发达国家表现出灵敏的加速和倍增关系。

就业不单是劳动体力和数量的就业，更主要的是技术与知识就业。贫穷社会资本总量少，有机构成低，劳力的知识训练差，大幅度就业是不可能

的。这并不排斥在政策鼓励下，劳力自谋职业，从事以体力为主的简单劳动。这总比失业要好，虽表现在产出和所得是微量的，但总比负储蓄要好，对贫穷社会而言，政府向低收入的阶层征税，无异于把国家财政收入建立在十分脆弱的经济基础上。因为税收将抑制就业和消费，堵塞个人的自救努力。要在政策上放手让公众自力更生，各显神通，把经济基础充实起来，然后再收税。这叫做“欲取之，先予之”。

相对总需求增量与投资增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可从下列数学推导中得到：

$$\frac{\frac{\Delta Y}{Y}}{\frac{\Delta I}{I}} = \frac{\Delta Y}{Y} \cdot \frac{Y-C}{\Delta Y-\Delta C} = \frac{1-\frac{C}{Y}}{1-\frac{\Delta C}{\Delta Y}} = \frac{\Delta Y \cdot I}{\Delta I Y}$$

只有考察$\frac{C}{Y}$、$\frac{\Delta C}{\Delta Y}$，才能够衡量某一社会的投资增量与就业量关系的真实情况，机械照搬外国的数据，是无法说明中国情况的。

5. 政府的消费政策

政府采用发行公债方式举债支出，其用途主要有：用于兴办事业的投资，或用于增加消费，弥补

预算不足。举债与增加投资、消费倾向联系在一起，无疑将对发展生产、增加就业有好处。这种观点可以推论出：建长城、金字塔、地震或战争都可以增加财富。这是一个与常规经典的观念很不一样的新观念。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论？原因在于社会上存在着不情愿的失业，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比边际产物的效用小很多，只要政府愿意为之提供就业机会，就能够创造更多的所得，使社会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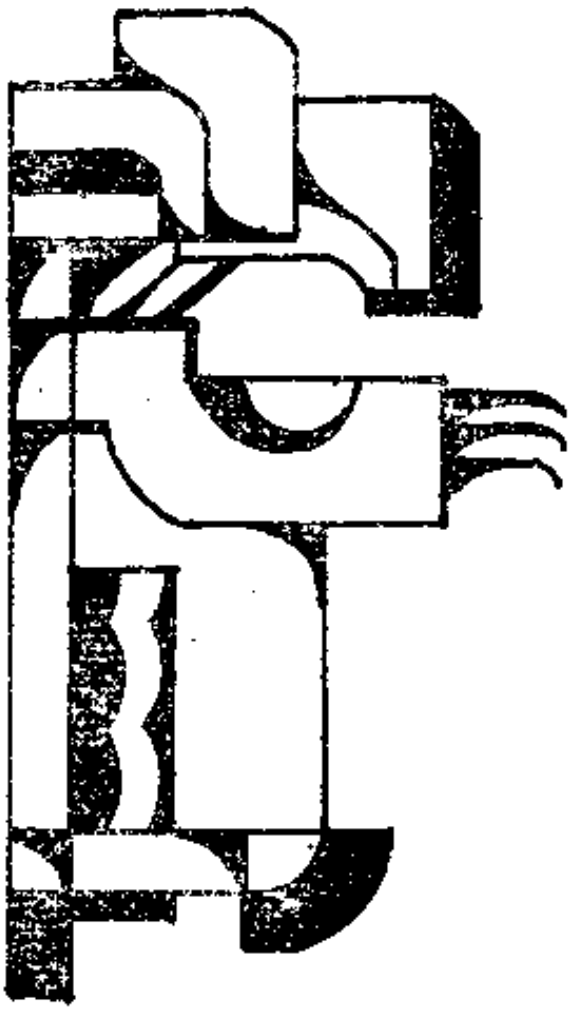
我们常常能够发现政府的财政政策往往选择救济、补贴、福利性质的举债支出而不愿意举债投资和消费。中国这种现象特别普遍。城市居民60%的个人收入是由国家暗贴的福利，住宅成为福利分配给职工，而不愿意把福利转为等量的住宅消费基金；宁可给农业发放救济款，也不愿意用这笔钱购买农村劳务，兴办公共事业。这是一种恶性的支出，对增加就业和提高社会总所得毫无用处。

政治家往往把战争看成大量举债支出的正当途径，在战争消费中，达到充分就业和发展。虽然战争本身并不增加社会财富，反而破坏了大量财富，但战争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凯恩斯认为古埃及建造金字塔和开采黄金的活动给国家经济带来双重好处：这些活动的产物不能作为人类消费之用，因此这种努力不会有止境和缘多的时候（因为不会出现

边际效用下降的情况）。法老的修华和财富，就是在举债购买奴隶劳务中创造出来的。举债买劳务会增加社会财富的原因是：消费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起点，而消费与投资又密不可分。人们失业却不丧失消费能力，从而耗损了投资。国家举债购买劳务，既保住了消费，又实现了投资。两者的差别看起来并不大，由于存在投资的乘数原理的作用，对经济的影响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凯恩斯曾举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政府认为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失业的就业问题，财政部就把一罐钞票埋在一个废矿坑中，再用垃圾把坑填上，然后把埋钱区域的开采权出租给私人，不再过问，让私人企业把钞票开采出来。私人企业会为此吸收劳力就业，并购置资本设备，在乘数原理的作用下，由一个“虚”的企业活动放大成数倍“实”的社会增长，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就业。采用这个办法，有许多人会认为愚蠢，但和这性质一样的采金业，却是自古以来都认为是正当的聪明的经济活动。一个挖的是钞票，另一个挖的是黄金。他认为，战争与采金在经济学意义上说，都是对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经济活动。现代的经济学者，可能不会学习埃及法老和中国的秦始皇（建长城、阿房宫、运河、皇陵）。每作一件事总要先考虑本身的节约和收益，好象这就是全部的经济学真谛。

正是因为这种“小算盘”打得太精了，却造成不可避免的失业和萧条。

凯恩斯说：“私人致富之道，应用于国家行为上，失业乃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真可谓妙语良言。中国农村集结了全国80%劳动力，靠十多亿亩的耕地，是无法满足就业的。依靠国家投资建厂吸收劳动力数量受投资量的限制，这种就业是极有限的。除了建厂，还要建设城市和住宅，更是国家财政力量无法承受的。学秦始皇修长城当然没有必要，战争与我们制度的本性和目标是不相容的(除非自卫战争)，那么又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呢？有如下方案可供选择：1.国家举债购买农民劳务修筑中国高速公路网、机场和开挖运河；2.把大部分国营矿山租给农民开采；3.敞开城门，让农民进城办服务业和建筑业；4.组织劳务训练和出口；5.鼓励向西部及世界移民；6.大力发展出口产品加工业，从贸易中赚取好处。以上有些方案已经被发达国家采用并证明是有效的，应用于中国，将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



第十一章
资本的边际效率

1. 资本的边际效率

工程经济中对投资作效益评价时，采取如下方法：

设投资购买资本资产的经济寿命为n年，在n年中，各年可生产的产品价值扣除为生产此产品所支付的价值，得到一组在n年中分布的未来收益（prospective yields）。这一组未来收益是付出投资代价购买来的权利，对收益按预期收益率进行贴现处理求得收益现值之和，与投资（包括投资成本）相比较，如果比投资高，此项投资有利可图；两者相等则无得无失；投资大于现值时，将亏空。

影响投资未来收益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supply price)。这里所指的资本资产供给价格，是投资者所能接受并能引起其购置这

笔资产的兴趣的价格。这是投资者对未来收益进行预期后，结合当前市场资产、资金价格而确定的价格，有的称此价格为该资产的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

以上实际上已经给出了资本的边际效率的说明。要而言之，按一定利率将该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贴现为现值，恰使现值等于该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的贴现率，就叫该资本的边际效率。用同样方法可以计算各种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其中最大者，称一般资本的边际效率。资本边际效率是预期的报酬率，而不是期末结算的真实报酬率，是前瞻而不是回顾，它是为了决策当前投资的谋算，是经济预期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种行为。

在任何一个时期中，对某类资本投资的增加，一方面会引起近期该类资本资产需求的增加，提高了供给价格；另一方面从远期看来，该资产的产品供应量增加，供给价格下降，使投资未来的收益下降，因而导致该类资本的边际效率的下降。利用这种关系可以建立总投资量与其对应的一般资本的边际效率关系的总表，此表称投资需求表或资本边际效率表。表列的一般资本边际效率是各类资本边际效率的最高边际效率。我们总可以查到一个与当时总投资量相对应的一般资本的边际效率，确定预期报酬

率。但这只是引起投资(引诱投资)的内因，还需要了解投资的市场利率这个外因与预期报酬率作比较，把使用投资的成本考虑在内，才能作出最后判断。

2. 边际分析方法

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是经常被采用的方法之一。这是动态分析法的一种。经济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因素的变化，都要引起与之相关的（有函数关系）另一因素的相应变化。以上各章提到的边际生产力、边际报酬、边际效率、边际效用，都是采用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具体经济问题中建立起的概念。

边际分析要有明确的对象。一般这个对象经过简化处理，只研究其中两个参数的关系。其中一个是变量，另一个是因变量。这两个参数发生的数量关系，欲求得增量相对值，就要求统一量纲（或单位），经济学的最科学最通用的量纲是货币价值。

边际是前沿界线，是经济变化趋势的轨迹线，是经济运动学的基本概念。边际观念是追踪活跃经济问题的骏马。特别是现代经济在空间上有更大的流动性，在时间上节奏加快，边际观念就显得更加

重要了。

3. 预期与资本的边际效率

资本边际效率本身是与预期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经济学概念，它不仅与资本的现在收益有关，更与资本的未来收益有关。

人们预期未来的资本品，由于生产条件的进步和新技术的采用，生产效率将较目前有很大提高，相对劳动力成本将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未来资本品价格较目前低，由于需求的扩大和成本的节约，仍然有利可图。只有当雇主认为预期价格降低了新资本品所能获得的利润时，这种预期将减低今日所产资本的边际效率。

对价格的预期，是通过对货币购买力的预期实现的。当预期中的货币购买力（币值）下降时，可以刺激投资，增加一般就业，从而提高资本边际效率表；反之，预期币值上涨，将抑制当前投资和就业，降低资本的边际效率表。

对现有资产的估价和新资本品的供应，常随人们对未来币值的预期改变而调整。有人认为对未来币值的预期改变不是对资本的边际效率发生影响，

而只对利率起作用，这是一种误解。利率只影响投资和对资本的购买，而不能影响新资产的生产。只有对资产价格的预期，才能直接影响资本的边际效率和新资产的供给。这里所谈的预期，都是指资本品生产者的预期。对利率的预期改变，当然会对资本的边际效率发生影响。利率是货币的供需价格，不等于是资本品的预期价格。利率高，降低了预期的资本边际效率，抑制投资，从而抑制了新资产的需求，也减少了资产的生产。这种机制与价格作用是不同的。

预期是可以改变的，它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修正。因此，一特定量资本的边际效率，处于变化过程中。社会预期心理变化是资本边际效率发生运动的动力，是经济周期性发展的原因。

4. 投资风险

雇主利用自有资金或借贷进行投资时，投资者主要担心这笔资金的投入能否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未来收益。得不到的可能性(几率)有多大，就是这笔投资的风险程度。这类风险称做雇主或借者的风险。

利用贷款进行投资时，银行是否贷款，决定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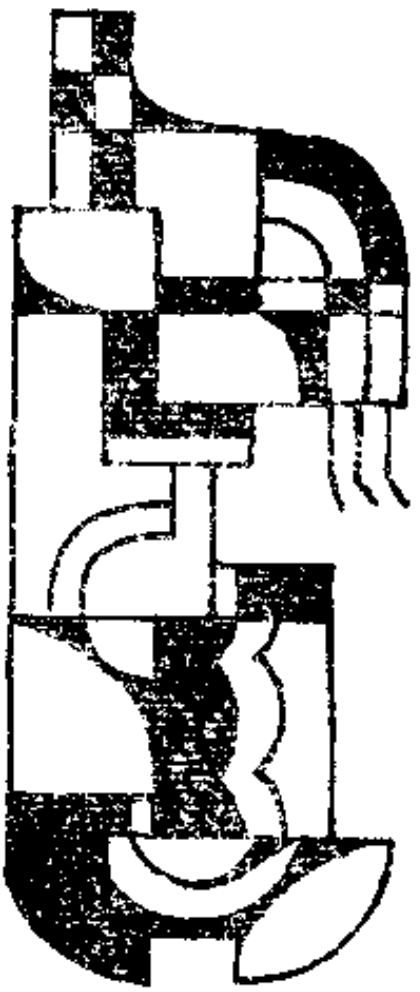
款人的信用度、资产担保和币值的变动。这些条件的意外变化（失信、逃避和担保品不足），成了投资的第二类风险（贷者的风险）。

第一类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减弱)，是投资者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或称社会成本real social cost）。第二类风险因在借贷双方的交相作用下，包括了第一类风险的影响，往往被大大加强了。对冒风险的投资，投资者必须在较高的预期资本收益率的情况下才敢向银行借钱。借者对风险的估计，不能代替贷者对风险的估计。银行在同样原因下，必须在有较大的实际利率与纯利率差额情况下，才能下决心放款，使投资风险被计算两次。不能低估这种“强化风险”的现象对经济的影响。

5. 资本边际效率的力量

资本的边际效率，是维系现在与将来的强大力量，它比利率的影响要大得多。只顾眼前不顾未来的静止观点，只重视资本设备的目前收益，对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重视。同样在僵化的经济社会里，几十年一贯制，资本设备经济寿命任意确定，每一年的收益恒等不变，价格是冻结的，资金没有时间价

值，投资不承担责任，也没有明确的经济目的，企业之间没有竞争，也不存在投资风险，在这种社会里，资本边际效率这个力量将等于零，是毫无意义的概念。中国今天的改革，最重要的莫过于恢复资本边际效率的力量，依靠它的作用，把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不少人习惯于凭空设计经济的未来，认为主观有力量对未来作出安排。我们不少计划、规划和政策大量体现了这种自信，事实说明这种自信是盲目自负。管理者的自信，应建立在千百万生产经营者对未来预期和当前行动的基础上。没有充满竞争与风险的经济气候，没有适应商品经济的社会结构，没有追求利益的观念，任何计划都只能是官僚主义的空想。《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其中商品经济部分将生长出资本边际效率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政府的宏观计划管理才具有必要的条件。



第十二章
利　率　通　论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资本的边际效率表是借款者愿付的代价；利率是贷款者所要求的代价。

利率是代价这个命题，揭示了利率是货币的市场价格的本质。市场问题归结为供需的均衡问题，利率是货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货币供给来源于储蓄，不同利率有不同的社会储蓄倾向。储蓄等于投资，与市场对货币的需求相关联。利率也影响对货币的需求，两者互相较量，达到均衡，恰使储蓄等于投资。这时的利率，才是市场上实现的货币价格。

1. 灵活偏好与利率

人们对储蓄在时间上的支配行为表现为：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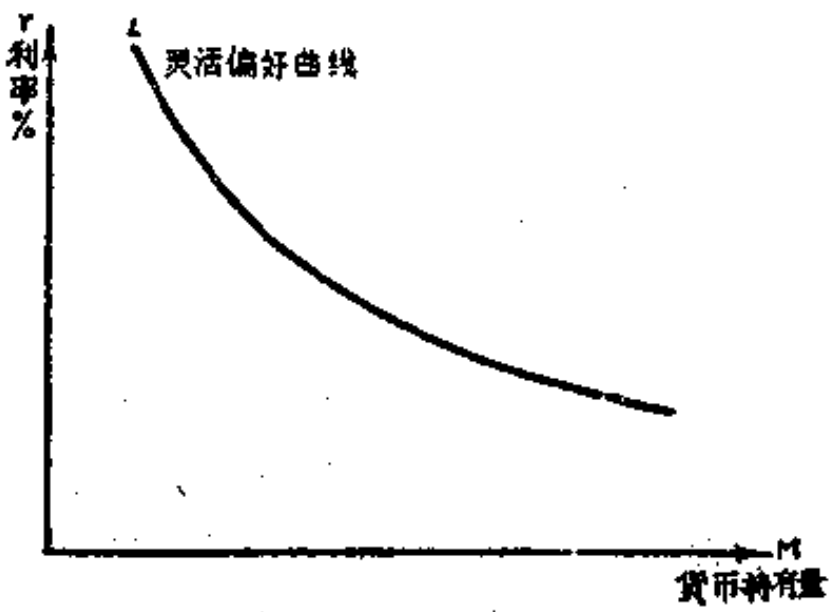
是即期的流动的方式；有的是随机的（听任市场发展情况决定）方式；有的是定期的方式。采取何种方式，对个人而言，有很大的灵活偏好（liqu idity preference）。

对货币的使用权的控制是有代价的。如果采用手持待用的方式储蓄，储蓄人对货币拥有最大的控制权，但得不到利息；如果储蓄采用买债券的方式，在一定期限内存款人将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权力转让给债务人。为此，债务人将给债权人支付利息，作为得到货币控制权的代价（也是债权人放弃灵活周转权的报酬）。利率成为衡量公众对货币灵活控制程度的指标。当利率低于均衡值时，人们就要扩大对货币灵活控制权，减少了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在利率上升时，市场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货币持有量与利率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这个函数是公众愿意持有货币量的倾向。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中建立起的一个重要概念——灵活偏好。这是一个社会的心理现象。尽管储蓄有利息可得，人们还是或多或少为保持对货币灵活周转的权力而甘愿牺牲利息。

产生灵活偏好的动机有三个：1.交易动机——为当前交易准备现金；2.谨慎动机——因对利率前途的不确定性缺乏信心，为了保持未来现金的价值

而手持现金；3.投机动机——自信对市场利率变化趋向的预期，保持现金能够从一笔投机买卖中得利。前两种动机对利率的变动不敏感。投机所需现金量成为灵活偏好的最值得讨论的动机。债券市场的债券价格上升时，人们愿意购买股票(空头抛出)，增加了货币供应量，货币为多头吸进。

货币持有量与利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编成一个灵活偏好表。在货币与利率坐标系中，它是货币持有量随利率下降而增大的曲线，如下图示：



利率下降，表示保持货币周转灵活的权力所付出的代价小，因而愿意保持更多的货币。此外，利

率下降，总所得增加，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上涨，交易动机所需货币也增加。利率下降还会动摇对利率前途的信心，从而增加货币持有量。

在货币数量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利率对货币持有量的上述作用变得很不确定了。货币数量大量增加，使货币持有者有一种不安全感，即使利率不变，也会大量增加货币持有量；利率如有变动（哪怕上升），也会触发大批人加强对灵活的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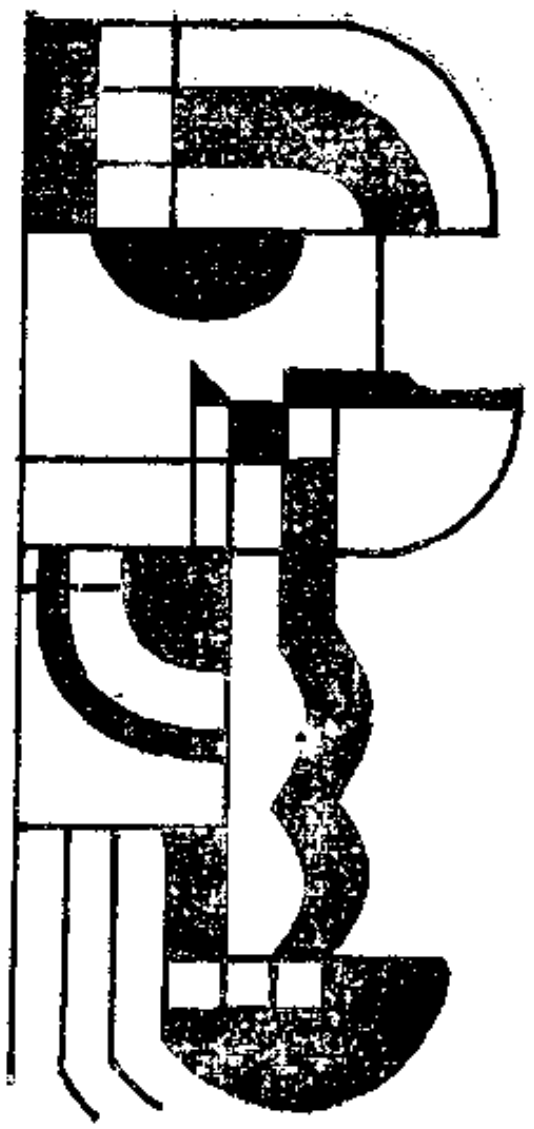
政府是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控制经济体系的。它的基础是国民存在灵活偏好。弗里德曼在这方面大大发展了凯恩斯的这个思想，创立了货币学派。

2. 反常现象

并不是增加货币数量就一定会降低利率。当公众灵活偏好比货币数量增加得更快，利率就降不下来。同样理由：资本的边际效率比利率降低得更快，利率下降未必引起投资的增加；投资增加引起通货膨胀，就业量就不会随投资增加而相应增加。在宏观的货币政策中，必须考虑到这些反常现象，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3. 利息是对不贮钱的报酬

灵活偏好可以近似看作“贮钱”(hoarding)。贮钱与否，是在权衡放弃周转灵活性利弊后的行动。在每个具体人看来，贮钱数量可由主观决定；在全社会看来，每个人却无力改变总贮钱的数量。总贮钱量必等于货币量。人们贮钱倾向只能决定利率，使人们愿贮之数恰等于现有货币量。利息并不是对人们不消费的报酬，而是对不贮钱的报酬。这个道理颇为费解和深奥。在世人眼中，利息明明是对贮钱的报酬(存款者得到利息)，怎么能说是“对不贮钱的报酬”？我们受世俗的偏见愚弄，看到的是微观的存款者的报酬。不要忘记，凯恩斯在这里探讨的是宏观经济问题。当总贮钱量等于货币量时，不贮钱的灵活性和好处恰等于利息率。贮钱是让渡货币的灵活性给借钱的，利息是借钱人——让钱“就业”者（不贮钱人）得到的报酬，再转让给贮钱人。因此，宏观上应该把利息看作“对不贮钱的报酬”。



第十三章
灵活偏好的动机

1. 灵活偏好的动机

上章已简述了灵活偏好的交易、谨慎和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又可以分为所得动机和业务动机。兹分别讨论如下：

（一）所得动机，在于渡过从所得的收入转入支出这段间歇而持有的货币。决定这一动机强度的因素主要是所得的多少和间歇的长短。间歇长短与货币所得流通速度是同义的。通常所指的货币所得流通速度，就是指这种动机所持有的货币投入支出的速度。

（二）业务动机，是经营者从投入至产出期间间隔所持有的货币。这个间隔与经营周期有关。此动机的强度决定于产出量、产出过程的长度。

（三）谨慎动机，在于应付未可预料的支出和利用意外出现的好机会。

上述三动机的强度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是否容易及时获得现款（暂借、透支）。如果在实际需要现款时，很方便即可获得现款，动机强度就会削弱；二是持有现款的成本（起码等于银行存款的利息）比将要购买资产的收益高还是低。如果持款损失大，动机强度就会加强。

（四）投机动机，这是对货币数量和经济体系有重大影响，而多数人对此又较其他动机陌生的一种动机，需要对它作深入探究。

前三种动机对货币数量的影响，一般只受经济体系景气程度及货币所得大小的影响。投机动机却对经济体系有很大的反作用。经验告诉我们，投机动机对货币的需求量随可用短期债票的价格作连续变化。当银行体系把债票价格降低时，投机对货币的需求量就越多，用以从市场购进债票。当然，这必须有一个由公众和银行参加的债票市场，进行债票公开市场交易(open market operations)。债票价格的变化，就是短期债票利率的变化。银行体系通过控制利率的升降，调节债票的价格高低，从而调节投机动机持有货币数量的多寡。债票价格的变化原因有二，一是在灵活偏好函数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了

货币供给（用于投机动机）量；二是因预期在某种信息（情报—news）下发生了改变，影响灵活偏好函数本身。债票交易市场兼有以上两种原因的复合作用。特别是以信息为起因的利率改变比较突然，是不连续的突变。就每个人而言，同样环境的信息对持有货币的反应各不相同；从统计意义上看，反应相同的多，离异者少。因此，债票价格的变化与市场货币交易量是不成比例的，而是反趋向的。

2. 货币数量与动机

持有货币总量（M）可分解为：以满足交易和谨慎动机所持现金量（M_1）和满足投机动机所持有的现金量（M_2）。M_1是所得水准（Y）的函数〔$M_1 = L_1(Y)$〕；M_2是当前利率(r)（包括预期状态）的函数〔$M_2 = L_2(r)$〕

即　　$M = M_1 + M_2 = L_1(Y) + L_2(r)$

讨论如下：

（一）M与Y、r的关系。

M是所得的量度，货币是根据所得数量发行的。M的增加，必起源于投资，也与$L_2(r)$有直接

关系。因此，M的增加，先是r的降低后，M_2增加引起Y的增加，从而M_1也增加，直至$M = M_1 + M_2$的均衡实现为止。新增现款在M_1与M_2间的分配，决定于投资对降低利率的反应和所得对投资的反应。利率在这个机制中，是起先导作用的因素。

利率⇄投资⇄所得（M）

（二）货币流通速度（V）

货币流通速度与下列因素有关：

1．社会习惯；

2．所得在各阶层的分配；

3．现金呆滞的代价；

4．金融、工商的体制和组织。

在短期内，上述因素对一个确定的经济体系都有一个可测量的确定值，则货币流通速度V是一个常数。

（三）M_2与r的关系：

对人们持有M_2（灵活偏好）动机的解释是：由于人们对利率的前途感到不确定而诱发的。如前所述，M_2与r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人们并不追求r的绝对水准，而是r的尽可能合理的相对水准。人们心里存在一个r的安全水准。r的绝对水准与安全水准的差别程度，是影响M_2的原因。在预期状态不变的条件下，r降低，则M_2增加。因

为：r降低将使r接近安全水准，保持货币的周转灵活性的风险变小；从另一方面看r下降加大了放弃周转灵活性的风险，为了得到补偿，M_2增加。这些都与心理作用相联系。在均衡状态下，如果在充分就业的利率水平上再增加利率，就会出现M的增加，$\Delta M_2 \approx O$，Y不变，这就是真正的通货膨胀。银行有控制利率的力量，但其基础是公众对金融政策的信用感和安全感。当利率降到一个水准以下时，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金融政策的推测，觉得不安全和失去对金融政策的信用，这时金融当局便失去了控制利率的能力。银行控制利率是有限度的，不是随心所欲的。金融政策有随机变动的灵活性，以适应公众心理，加强对政策的信心，使政策奏效。因此，公众的心理倾向构成了利率的内在规律性。当大多数人认为某一利率将继续维持下去，那末这个利率果然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尤其是长期利率具有相对稳定性。

资本的边际效率是不稳定的，与相对稳定的长期利率共处一体时，就会舍弃一部分资本边际效率低的投资，出现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出现不充分就业的常规局面。

宏观的货币政策本身就不可能是长期稳定的，这与利率的上述稳定性是有矛盾的。政府可以通过

宣传和经济措施与公众心理倾向作斗争，强行推进某一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两者互相接近，实现了新的均衡。

3. 金融当局的影响

利息问题归结为人们持有现款的动机问题。设预期状态不变，除了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以外，在公众心目中，还有一种潜在势力对持有货币有重大影响；影响强度主要取决于金融当局愿意创造现款的意愿。灵活偏好函数L_2是这种潜在势力的概括。因此，利息问题可简化为：金融当局愿意创造的货币数量与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数量的均衡。这是两条函数曲线的交点。因为这两个函数是互相影响和变动的，曲线在移动中，交点的利率也就变成一个利率体系。

当然，货币问题是经济问题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利率与经济体系的许多因素都有关系。为什么可以把利率归结为货币问题呢？自从把货币看作一种特殊商品，并由银行体系和金融当局加以经营以来，货币与利率的关系显得特殊而密切，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但不自成体系）的理论问

题。利率体系成了银行体系愿意买卖债务的条件，货币数量只是个人所愿意持有现款的数量。这里的两个“愿意”合成利率体系，就是主观客观统一后的总倾向，是分力的合力。银行对利率有自己的行为，对不同期限与风险的各种债务票据建立一个特定的利率体系，受到下列条件限制：

1，金融当局业务的局限性（如不愿经营长期债票）；

2，过低的利率，公众有不愿持有债票的倾向，使金融当局失去了对利率的控制能力；

3，因灵活偏好函数变成一条直线，利率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变动，失去了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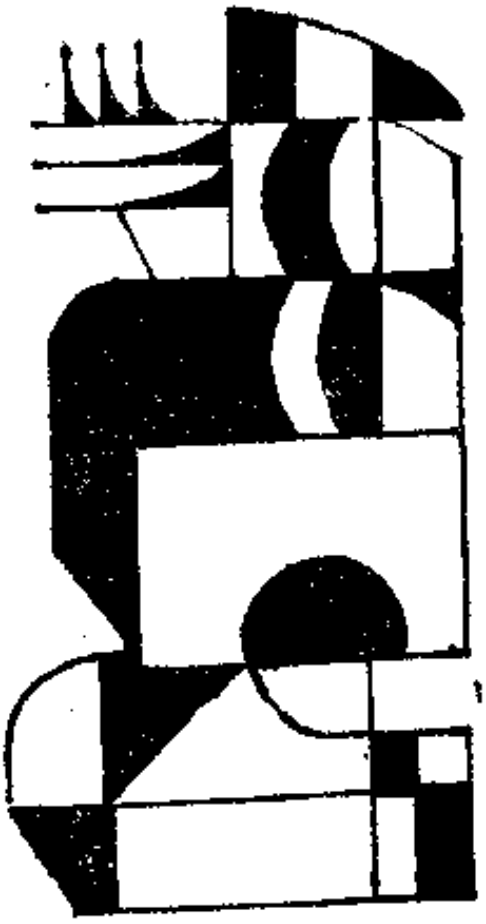
4，金融中介环节多、费用高。

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落后社会，或在一个抑制个人投机货币需要，没有投资（债券）市场存在的社会中，$M_2=O$，$M=M_1$，故有$M_1V=Y$的简单关系。

〔Y＝产品数量(O)×产品的价格(P)〕

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的货币数量与流通速度的积等于物价与产量的乘积（$MV=OP$），这是通式。（$M=M_1+M_2$）M_2与利率联系在一起，M_1与Y（OP）联系在一起，使货币数量与经济体系贯通融汇在一起。

金融当局参加货币经营，要同时兼顾货币持有者与需求者双方在安全、机动、收益方面的不同要求，要有适应金融市场需要的丰富的金融资产商品品种，吸引各种动机的货币持有者和需求者。银行经营金融资产商品的多寡与一国经济社会化程度及金融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日本金融当局与银行体系经营的存款、邮政储蓄、信托投资、生命保险、债券、股票、证券投资信托等近百种之多。相比之下，中国目前金融资产品目就少得可怜。就存款者的动机与借款者的需求而言，中国与日本并没有多大差别。关键是中国在过去关闭了金融市场，货币成为金融当局统制的资源，按计划分配给需求者。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银行体系，改革金融管理体制，开放金融市场，才可能实现金融当局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第十四章
资本的性质

历来的经济学者，往往都相信下述论点：将持有财富的愿望看作是持有投资的愿望，从而增加了对投资的需求和资本资产的生产。并认为：当个人储蓄时，当前的投资增加量恰等于现在消费的减少量，两者有因果关系。

上述论点似是而非。最主要的错误是：把人们持有财富与持有资本资产等同起来。人们持有财富是已经到手的现实财富，可以转变成消费品，也可以是资产。储蓄并非要变成资产后，才称为储蓄。人们持有资本资产是牺牲当前的消费，为了未来的所得。持有资产的真意是资产的未来收益。而未来收益是由预期的未来有效需求与未来的供给情况决定的，与储蓄没有必然的联系。

现代社会，财富与资本的分离，使得人们对储

蓄与投资的认识更加困难了。简单社会，储蓄产生消费性债权，也创造了同样数量的债务。这是消费的强迫转移现象，它不需要有新的财富产生。投资就变成“对未来生产新的财富”问题，它发生于未来。拥有未来财富，只是一个抽象的财富，不需要有具体的预期需求作基础；增加财富的愿望并不是增加财富本身。

总而言之，当今社会，并不要求每一个想持有现有财富的人，都一定变为投资者。储蓄可以用购买债券的方式实现。投资者则是带着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进入投资市场筹措资金，购买资本资产，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取得未来的收益。储蓄与投资之间隔了一层。把投资的增加归结为储蓄和消费的减少，尽管从宏观上看，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并非因果间的必然联系。

1. 资本是现实的生产力

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这个事实基础上的。对增加所得的愿望可以超前，但总不是如愿以偿的。因为“稀缺”，又要多获得，只好把各种预期投入市场进行较量，以求得对资源的最优分配，获

得当时条件下的资源最大效率的使用。

资本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体，是现实的生产力。资本资产是有一定服役期的（经济寿命）。在服役期内，扣除所付出的代价——资本成本后，会产生一个收益。货币利率是衡量这个收益大小的尺度。正因为资源稀缺，在货币利率的衡量下，把资源组织到收益最大的方向上去。“收益最大”不是人造的或数学推导的结果，是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结果。某一社会在某一时期，在总体上存在一个“基准收益率”，各行各业的投资收益率与之比较，等于及高于此限者为合理投资，否则称不经济投资。正因为投资者人人都想获得最大的资本效益，本来效益高的行业竞争者就会越多，引起资本供给价格的上涨，从而降低了投资收益率。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利润平均化现象。凯恩斯所采用的概念与范畴与马克思有很大的不同，这里不做具体比较。

资本的技术先进性、适用性与经济性的统一，是投资者在预期行为中的重要内容。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都在影响未来的收益，如：环境质量，风险的几率，工团的活动，世界贸易和政治的影响，政府政策的变更，投资市场的变化，价格的变化，新技术因素的变化，劳动与闲暇时间的分配……。

2. 均衡资本量小于充分就业的资本量

从宏观上看，各种有利可图的投资都实现以后，各行各业的投资收益率都降到同一个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再发生投资时，资本边际效率就会降到零点。又因为货币利率无论如何不会降到零点，因此在实际上，均衡状态下使边际效率等于零的资本数量，并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必小于充分就业的资本数量。这就是凯恩斯有名的论断：现实经济是在不充分就业情况下实现均衡。这是与“供给自己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经典理论的最根本差别。利润大于零，而边际效率等于零，这个差值表示有资本闲置，发生不自愿的失业现象，社会积累财富的欲望也不能得到满足，生活水准也无法达到“充分”的程度。

当不充分就业程度极端自发地发展时，社会经济出现的问题愈难解决，出现了饱和态的畸多畸缺现象。劳动力多、资金多、价格贵、需求不振、信心不足、边际效率崩溃。在有政府政策的作用时，可以从宏观上影响消费倾向及投资量，缓和和解决一部分紧迫问题。不充分就业是对稀缺资源的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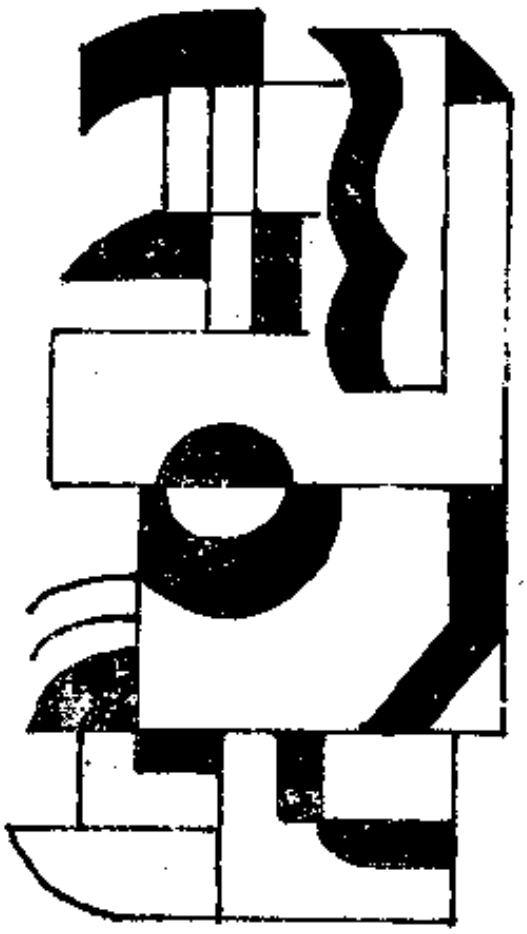
费。如果能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就业，哪怕是修金字塔和长城这些不产生直接效益的工程，也可以增加真实的国民所得。乘数原理是对就业而言的，就业增加等于是所得的增加，这个道理是十分浅显的。

3. 新技术革命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

经济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都面临就业问题。前者的发展，技术、人口因素都不会发生突变，社会财富和资本已大量积累，处于资本边际效率趋近零的均衡状态（准静态）。这并不排斥在生产技术发生重大突破情况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都在议论和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引起的产业革命。这种趋势不是单纯的发展愿望。近期的经济，发达国家传统工业的衰落，大量经济难题的堆积，这些迹象已经预示了新的经济形态的诞生。象美国的新兴产业——电子、光通讯、能源、航天、海洋、生物工程、新材料工业已经崛起，这些企业提供的就业与财富不仅弥补了传统工业的衰退，而且把美国总就业和经济发展水平推向新的高度。有人称这种转变为蜕变，要脱去一层皮，旧资

本资产要加速淘汰。这种非物质性质的折旧（精神磨损），从财富上也是一种不得不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劳动力等要素也要有转变代价，要在新的需求下发生转移，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结构。

发展中国家也在议论如何跳过常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新技术革命阶段。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发展中国家与未来的新发展阶段有许多共通之处，可以跳跃进入未来。我想，技术是在经济与需求召唤下产生的，是立足已有经济基础上的生产要素之一，但不是要素全体。资本从来是技术、物质和管理的复合体，它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孤立地把技术革命当作资本革命是不符合实际的。文明社会可以在一个奴隶制或原始部落中创造一个近代文明社会，但这是搬运式的，并不是跳跃式的。被动的依靠外部改变经济发展过程，不等于是主动地依靠自己建设一个未来的美好社会。



第十五章
利息与货币的特性

就业理论中，货币利率对就业水准的特殊影响，是与货币和利息的特性相联系的。

如前所述，在一定的货币利率下，新的投资活动的边际效率必须等于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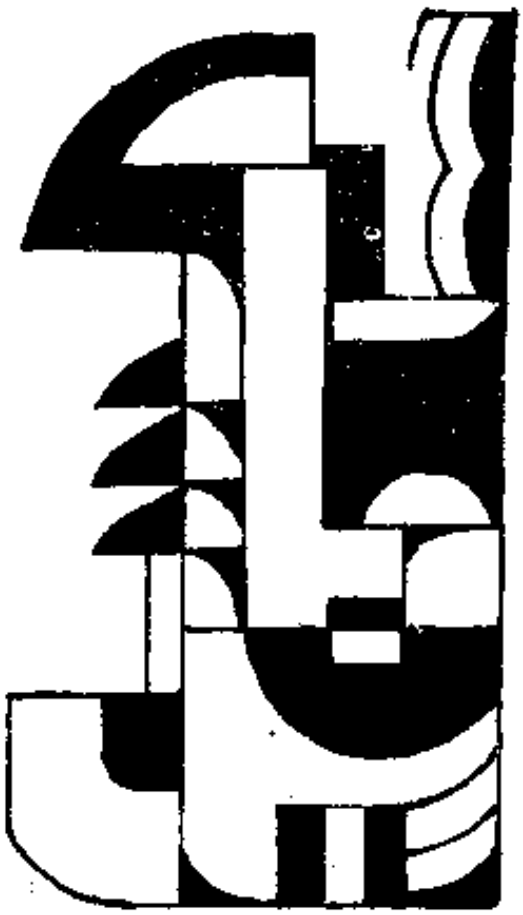
$$\text{货币利率} = \frac{\text{一笔将来（如一年）交付的货币} - \text{货币现在价格}}{\text{货币现在价格}}$$

任何能在时间中增值的资本资产都有它的利息，如钢铁厂利率、房屋利率等。此外，任何商品的未来价值与现在价值也不会相同，未来的一定商品量可交换的现在的同类商品量不会是相等的，因此，任何商品也具有它的利率。这些利率照理说，是可以作为标准去衡量资本的边际效率的（设两者的未来价值相对不变）。事实上，商品交换数量变

化是各式各样、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很难找到一种商品作为"复合商品"以其利率为标准对资本边际效率进行唯一的衡量。而货币就是这种意义的"复合商品"，它本身的价值量就是通过利率表现出来的。货币利率是货物利息之王。用货币衡量货物价值，当货物数量增加引起本身利率（货物数量计算的利率）下降时，货币利率不会随着作同幅度下降。原因是货币数量的生产不受生产要素（资源）的变化影响，而是受整个经济体系活动的影响；货币的交换价值上涨时，人们不能象商品那样作出替代性选择，这是货币有别于一般商品的"不可替代"特性。黄金与纸币都是通货，发展到信用卡，也是通货；活期存款单据等都属于通货范畴，它们之间的转移变化不属于"替代"性质。当货币的需求增加时，货币可以无限制地容纳购买力。此外，货币周转灵活，便于流通和保存，并适于满足人们灵活偏好动机需要等。以上，就是货币的特性。货币利率的特性，就是货币特性联合作用的结果。货币利率之所以称货物利率之王，原因是：1.因为有灵活偏好动机，当货币数量比其他财富相对增加时，利率反应不敏感；2.人们对资产的需求，就是表现为对货币的需求，生产要素不能用来增产货币，其他商品无法替代，使货币利率具有很大的稳

定性和相对（商品）的独立性。货币的这种生产弹性与替换弹性皆等于零的特性，决定了货币利率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因此，只有货币利率可以作为唯一的资本资产边际效率的量度。

货币与时间是经济学的基本单位。前面提到的另一个单位是劳动力单位。经济活动往往是契约关系和劳动力单位的工资运动。唯有货币才能稳定地表达契约与工资。货币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比一般商品更高的刚性（稳定性）。现代信息论的观点认为：信息是世界普遍联系与发展的“力”。货币就是一种经济的联系力，是经济关系和发展的重要信息。信息的生产、交换（传递）、保存，有其自身的规律。“信息是资源”，也是特殊的商品，是经济学中高度抽象的基本概念。信息论与货币论的结合，将大大发展和完善传统的货币论，希望有人去做这项工作，就象凯恩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一样，一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第十六章
就业通论提要

1. 几个假定与就业自变量

以上各章已经为建立“就业通论”准备了基础。为了把上述各种概念科学地加以组织，首先要分辨清楚：经济体系中，哪些是已知的因素（或假定不变的因素），哪些是自变量和因变量。

就业通论假定以下各因素不变：

1. 现有劳动力的数量和技巧；
2. 现有资本资产的质与量；
3. 现有生产技术；
4. 竞争程度；
5. 消费者的偏好（嗜尚）与习惯；
6. 各种劳务（包括政府公职人员）的负效用；
7. 社会结构，体制。

并不是说上述因素是不变的，只是为了简化讨论，引出复杂经济体系的就业理论原则，把这些因素的变化引起的后果予以忽略（或作一个总的背景处理）。

经济体系中的自变量，是经济中相对活跃的基本参数，主要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率。

因变量就是本书的中心问题——就业量与以工资单位计算的国民所得。后者决定于前者。

三种参数之间，在不同研究对象中，有不同的组合，揭示不同的规律。比如，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把对某物的有效需求（以工资单位计算）为自变数，从事该物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为因变量，就可以建立某物的总供给函数。

自变量可以认为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1．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这是引起经济运动的主观因素。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是产生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不充分就业理论）、利率论和投资理论的基础；

2．工资单位构成工资理论基础，由劳务市场劳资双方议价，达到劳务供求对工资单位的均衡；

3．银行体系的决定，产生货币数量理论。

三个自变量构成了整个就业理论体系。宏观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管理几个变数为内容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标。

2. 就业通论提要

就业通论要点如下：

1. 影响投资量的因素有：资本品工业的生产情况，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信心，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货币数量。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或是在这些力量推动下），随着投资的增长，使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甚至等于货币利率为止，实现了投资对利率——资本边际效率均衡。

2. 投资增加引起所得的增加，所得增加又引起消费量的增加。投资与所得间的数量关系服从乘数原理；所得与消费间的关系由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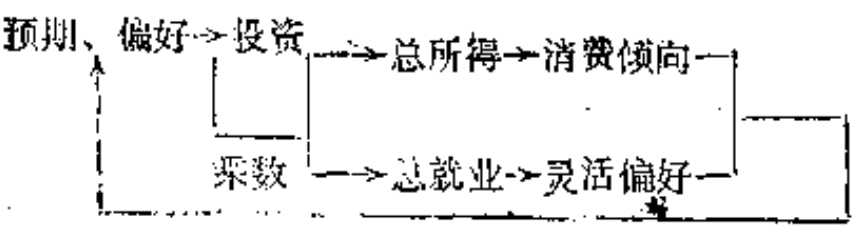
3. 投资工业中的就业量增加，引起总就业量的增加，两者也服从乘数原理。

4. 就业量增加将提高社会总所得，提高工资单位和物价（主要是成本上升），从而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提高灵活偏好表。

5．灵活偏好重新影响投资，进入新的运动和均衡。

以上是简单化的叙述，在实际运行中要复杂得多。不管多么复杂，有了以上的要点为基底和背景，以此出发讨论复杂问题就成为可能的了。不然，面对纷纭复杂的问题，将手足无措，无从下手。

就业通论的结构层次如下：



3．经济体系的亚稳态

一个经济体系许多参数在扰动时，不一定体现出就业量的明显起伏。象气体系统一样，内能的变化（熵、焓）并不一定都带来系统状态的相应起伏，表现出系统的亚稳定状态和承受能力。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充分就业”这一极限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愈趋近这个极限，各种参数变得愈不确定，诱发出强大的阻尼力量，阻止进一步扩张，结果实现在不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就象物价在经过一度骚扰以后，在一个水准上暂时稳定下来一样。因

为这种均衡是亚稳定均衡，一旦影响了社会心理，经济体系就会跌落下来，在一个萧条的起点上重新向上爬。这就是市场经济周期性发展的规律（称商业循环理论）。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世界上许多事物一样，经济体系也有自己的节律。

实现经济体系的亚稳态，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就业人数增加引起所得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又趋近零，或是投资乘数大于1（又不大太多）。有自动抑制投资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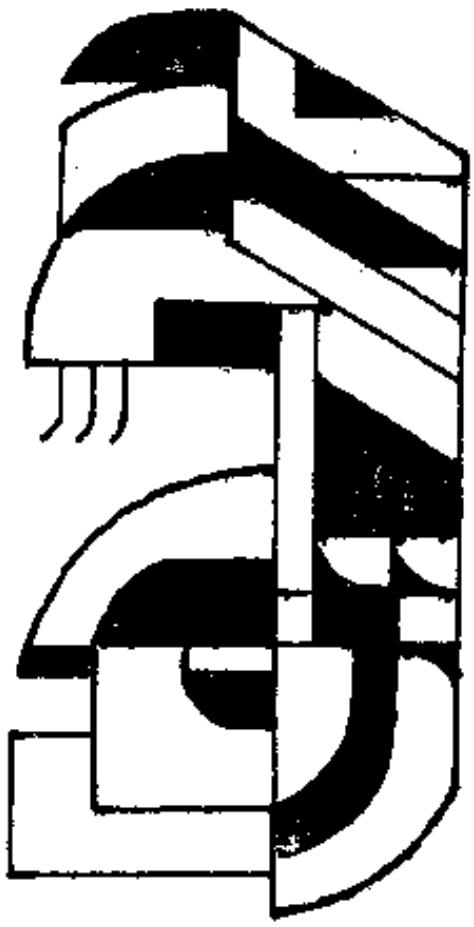
2．未来收益和利率不能作大幅度变化，投资量改变也不能太突然。

3．就业量增加引起工资增加是适度的，不致引起物价大的膨胀（通货膨胀）。

4．长期扩张趋势必然会降低资本的边际效率。这种降低要不致严重影响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信心。

上述四个条件都对平衡起作用，特别是第四个条件。如果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第四个条件的逆命题——长期收缩趋势必然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也是成立的。这说明萧条经济必然走向复苏和繁荣，没有永久的萧条，也没有永久的繁荣。

社会心理作用起“阻尼效应”。既不让充分就业，也不让最低限度的失业；收入的增加既不使消费作同量增加，收入减少又不使消费作同量减少；投资增加时将自动抑制投资，投资减少时，又阻滞这种减少。总是逆经济运动方向在起作用。



第十七章
物　价　论

1．影响物价的因素

物价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

1．供需情况；

2．边际成本；

3．短期供给弹性。

很多人往往把物价看作与货币数量、货币流通速度、流通速度与交易额之比、囤积行为，强迫储蓄，通货膨胀和紧缩相关的神秘莫测的怪物。

以上两种观点，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是动态均衡论与静态均衡论的差别。

凯恩斯说“我们有新见之处，都在需求方面——我们讨论总需求，而不是单独一种商品的需求。”三个因素都是宏观的因素。如边际成本考虑

的是社会总的生产原素价格和总生产规模。很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总是用时间的观念看变化和均衡，看各种因素的变化率。在长时期内，物价变化主要决定于成本与生产效率变化间的关系。当成本上涨超过生产效率的提高，物价就要上涨。

经济体系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种因素都不能孤立地起作用。不能说货币数量与流通速度等与价格没有关系。凯恩斯用大量的篇幅讨论货币与价格的关系问题。但货币往往不是径直影响价格，而是通过利率影响有效需求反射到价格上来的。简单化的办法无法说清事实上很复杂的事。如灵活偏好表本身和所得与业务两种动机将吸收新货币；到底将吸收多少又与有效需求增加多少有关，并与这个有效需求增量在物价、工资、产量（就业）间的分配有关。直到这个层次，才使货币与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关系。有效需求量与货币数量之比，有人把它称为“货币流通速度”，但有效需求不是真实所得，而是预期的所得，是毛所得。预期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如果把它与货币数量之比称做速度，这个速度是“毛”速度和不确定的速度。

一般情况下，在一定量的设备上增加产量，供给价格也随着增加，物价上涨。随着产量增加一些商品或劳务的供给弹性趋近零时，出现瓶颈。价格

上涨到这一点后，由于替代效应，引起需求转移，停止了继续上涨。当宏观上出现总供给“瓶颈”时，则会出现一系列商品（劳务）价格的急剧上涨。相反，在失业普遍存在的时候，如果有效需求作缓慢增加，可选择性大，供给弹性大，价格不会出现大的变化，需求增加主要表现在增加就业量上；需求增长较猛时，就会引起暂时的某些商品与劳务的供给瓶颈现象，使需求增加主要作用于价格的上涨上。

在达到充分就业以前，工资单位有上涨的趋势，这种趋势将抵消一部分有效需求的增加。实际上，并不是工资单位一定会随有效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或称两者函数关系不连续。所以出现充分就业前的异常，主要是工人的心理与企业、工会的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国际化的今天，一国的工资单位改变，必然会影响各国之间工资成本的相对变动；当前的工资单位变化，必然会影响预期工资成本作相对变化。当有效需求增加到不再对产量有影响的极点时（充分就业），供给弹性降到零，成本单位随有效需求一起增加，这就是真正的、绝对的通货膨胀（成本单位cost-unit——对边际直接成本中各生产原素报酬求加权平均值）。充分就业是这样演变来的：因短期内有报酬递减现象，因此，在产量

增加时，物价上涨率大于成本单位上升率，报酬率下降。当成本单位中生产原素边际产物等于要求的最低真实报酬时，就达到了“充分就业”的境界。

要纠正一种说法，任何货币数量的增加都称作通货膨胀。因为这是经典学派的观点，它的前提是：当生产原素的真实报酬减低时，与其相应的供给量也必然减少。凯恩斯认为，恰恰是产量增加时，造成真实报酬率下降的现象。他认为从物价上涨上不能就断定是否通货膨胀。在达到临界线前，都不能称通货膨胀。

2. 货币数量与物价

货币数量的改变对物价的影响，在长时期中的规律，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长期的灵活偏好是相当有规则的。利率在长期中调节着国民所得与货币数量间的关系，因为利率是群众心理的反映，也表现一定的稳定性。如果长期货币数量不足，可以用提高币值（本位和制度）办法，以提高货币数量，而不采取压低工资单位的办法。物价上升趋势是个客观规律。可调节的办法是：当货币数量丰裕时，采取工资单位上涨的办法，因为工人不会反抗这种

上涨；当货币数量不足时，则采用增加货币数量的办法。而工资单位的上涨率要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不然，就会使物价上涨。

第十八章 其它

1. 商业循环论

“商业循环”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和实际现象。商品经济的晴雨表是商业的盛衰，故用商业循环代替周期性的经济运动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商业循环牵涉整个经济体系的运动，因此所有有关的因素都在起作用。关键的因素是：消费倾向、灵活偏好状态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其中，影响商业循环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边际效率具有循环变动的特性。

当经济进入繁荣的后期时，往往引起人们对未来的不信任和恐慌心理，认为繁荣期的预期基础非常脆弱，导致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灵活偏好大增，利率上涨，从两面打击投资。投资的收缩，使经济系统作乘数倍的下跌，进入了衰退（萧条）

时期。资本边际效率一旦崩溃，某些补救性的宏观政策一般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资本边际效率是不受控制和管理的市场心理。为什么商品经济最重视信用与公众信心，就是这个道理。行政当局对这个客观力量和影响总是估计过低，对行政政策的力量总是估计过高，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要使经济从衰退中走出来，就要恢复和医治崩溃了的资本边际效率和公众对未来的信心。时间是医治信心的特效药。在衰退期中，具有一定经济寿命的资本随时间在消耗；人口在时间中增加；过剩存货保管费迫使负投资扩大；产出减少，可运用资本也在时间中减少；衰退使消费倾向受到不利影响；投资市场债券市价下跌。以上种种变化，都从反面逐渐加强了公众对未来的信心。这段恢复期的长短，表现得比较稳定。我们一直在宣传："资本主义危机一次比一次短，危机程度一次比一次深"的提法，就是说商业循环节律加快了。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一现象，但他们认为这是新技术革命到来的征兆，是资本资产寿命缩短、经济节奏加快的表现。总之，资本边际效率是随时代而运动的。

有人认为，抑制过度的投资，避免繁荣，就可以逃避衰退。似乎高利率政策是打破循环的法宝。这是一种误解。什么叫做过度投资？如果是指不计

预期收益（无预期行为）的投资，这种盲目投资只有傻瓜才这样做；如果指重置成本大于收益的投资，虽可因一时迷惑，稍有发生，但会立即意识到上当。“过度投资”实在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

如前所述，周期性的经济运动规律源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周期运动规律。并不是出现资本饱和至再容纳新的一点点就显得绝对多余的情况，而是从事投资的环境不稳定，投资者的信心崩溃，再不愿意投资。从这一点出发，提高利率不仅无法鼓励投资，而且抑制投资，使衰退来得更早些。相反，降低利率也许可能延长繁荣时期。

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造成商业循环的原因是消费不足，是因为社会习惯和财富分配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造成的。

如果投资不能再增加，为了增加就业，就只有提高消费这一条路可走了。如果轻视投资，把投资的一部分转入消费，这种政策显然是愚蠢的。谁都知道，投资存在乘数效应，对就业有乘数倍的作用。投资增加，即使在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消费也会随着增加；何况在投资增加时，消费倾向也会增加，更促使经济的繁荣。

此外，还有人认为让更多的人少工作，从减少工作时间中调节就业量，也可以解决商业循环难

题。凯恩斯很有远见地认为采用这个办法还“嫌太早”，而不是不可行（不等于有效）。因为，在经济水准不高的国家，多数人愿意选择所得的增加，而不选择闲暇增加。经过四十年历史进程，已经在经济发达国家实行周工作40小时的变革了。但商业循环规律并不因此消失，只能讲有所缓解。

补充说明一点：投资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事后证明有些投资是完全错误的，但这种错误投资引起乘数效应，对社会财富的增长是有好处的。错误投资也比抑制投资强许多倍。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增加投资，都是天然合理的（包括货币数量的增加；利率降低所增加的投资）。人类的本性在于创造和发展，表现在经济上的行为，就是投资。投资停止了，社会就会崩溃。

2.对重商主义等几个古老的经济问题的讨论

数百年来，随国际间的贸易发展，一个封闭的社会逐渐开放了。贸易促进了国际分工，使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就业，减少了小范围带来的局限和困难，使经济体系变得更有效率，更有发展余地了。

国际贸易的结果无非是顺差或逆差。传统的观点认为顺差是好事，而逆差则有严重危险。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家都认为，无须为逆顺差担心和兴奋。国际市场机制将自动调节各种暂时的偏差，使贸易国家得到实惠。企图干预这种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者，不仅将劳而无功，而且还使本国贫乏。传统观点即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经济学家的观点称自由贸易（Free Trade）。

在经典学派看来，重商主义只是一派胡言乱语，由重商主义引出的保护政策则是“最荒唐、最赤裸裸的谬误”。

凯恩斯不那么绝对化看待上述两种观点。我们知道投资在就业理论中的地位。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内投资与利率有关，而向国外输出资本量则与贸易顺差额有关。从就业的观点看问题，国家当局在国内投资问题上，能够作主的和施加影响的实在有限。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操纵国内投资的其他引诱。如果这时国际贸易顺差增加，不仅将间接增加国内投资动机，而且是向国外投资的必要条件。

国内的投资活动，对国外投资有间接影响。特别是出口物资的成本上升，将改变商品向外流动势头，失去顺差优势。国内货币利息降低到比国外还

要低时，会引起资金外流。当外流量超过顺差时，顺差优势便消失了。贸易量越大，上述两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也就越大。

贸易顺差既然成为各国所追求的目标，于是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将有利于顺差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越是设法限制贸易，越走向反面。自由贸易是实现顺差的明智政策。如果不是政治和非经济的原因，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保护落后，削弱国际化市场的调节力量，失去国际贸易带来的巨大好处。人们往往忽视国际化给各国经济所创造的好处，以为一国的好处必然以牺牲对方的好处为前提。这是一种误解。从国际各国的就业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把一国范围内没有出路的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就业，是世界总就业与总财富的增加。比起那种不作任何投资的闲置，是无量的功德。凡参加正常国际贸易的各国，都会从中得到好处。

经院学派的禁止高利贷法，是一种提高资本边际效率表的对策。用法令、风俗习惯和道义制裁的手段，压低利率。因为经院学派认定利率往往偏高而无法自我调节，只好借助外力了。经典学派斥此论为幼稚。凯恩斯却认几千年来的这种对策，是符合经济增长原理的高明政策，应加以尊敬。“灵活偏好过度，以致摧毁投资引诱，阻碍财富生长，这

种弊端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已经很显著；因为当时有种种生活上的风险，一方面减低资本的边际效率，另一方面增加灵活偏好。故设在社会之中，人人都觉得不安全，则除非该社会用尽各种办法抑制利率，否则利率总是太高，投资引诱不会充分。”

盖赛尔（Gesell）提出“加印”货币方案来降低利率，实现资本的顺利扩张。他认为要减低货币利率，就要想办法减少灵活偏好。于是他想出一个对通货每月加贴印花的办法，人为地把保藏费用强加在通货上，以能保持其流通价值。因“加印”手续，使持有货币的费用额外增加，从而影响灵活偏好，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使利率下降。这个想法是健全的，但却难于实施。因为货币最大的优点在于保藏费用低廉，又能较其他货物更灵活升值。一旦“加印”之后，这些优点就不再存在了，人们就会放弃货币而转向宝石、金银、外币或土地。

“崇奢”理论在中国也出现过。这种“奢侈有利，节俭有弊”的理论，本质是消费决定就业程度的原因。巴邦（Barbon）在1690年说过：“挥霍这个缺点，对于个人虽然不利，对于商业倒不然。……贪得这个缺点，则对于个人与商业都不利。”加莱(Cary)1695年说：“假使每个人都多花一些，则每个人之所得都要大些，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生活

得舒服一些。”这就是近代所说的消费不足说。凯恩斯从来不反对消费，也认为消费倾向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但“消费不足说”仅仅抓住消费这一因素，而把影响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抛在一边，当然无法取得理论上的成功。

3. 对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的讨论

——《通论》的几个推论

一、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以国家征税的方式（如所得税、超额所得税和遗产税）来改善财富分配的不合理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办法在执行中，如何控制“适度”，是很不容易的。普遍认为税收的增加从三方面影响就业和投资：一是企业家和投资者所得下降，边际资本效率恶化；二是政府的社会福利转移支付，削弱了负担风险动机；三是政府在运用财力时，往往排挤私人的投资，降低乘数，降低投资效率。

政府税收占国民财富的比重越大，国家的消费倾向与投资倾向对经济体系影响也就越大。国家集权的物质基础，在于财富分配的国家集中分额扩大。这对政府进行主动的宏观控制，无疑是有帮助

的。税收具有经济系统的内稳定作用，可以削弱市场心理对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衰退期与充分就业期的影响。

凯恩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财富分配过度不均这个事实出发的。他认为“在当代情形下，财富之生长不仅不系乎富人之节约（象普通所想象的那样），反之，恐反遭此种节约之阻挠。”因此，他认为征遗产税不仅不是一国资本财富的减少，而且对增加消费倾向，引诱投资有利。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财产环境与发财的动机，诱发了许多有价值的活动，也产生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自大狂。财富的分配不均，是政治上出现异常的原因。用税收等办法，既可以满足竞争和发展的心理需要，又可以对过分发展的异常人性进行抑制和管理。

凯恩斯说：“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的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可见，凯恩斯理论主张在经济上加强国家的宏观控制，发展经济，目的还在于改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资本不再稀缺与食利阶级的消亡

资本主义存在食利者和资本的压迫力量。在凯恩斯看来，这是可以解决的历史问题。之所以有坐收利息阶级，那是因为社会存在对资本的需求，使货

币具有利率。他认为社会对资本的需求是有严格限度的。随着资本数量的增加，其边际效率下降，一直降到除抵补折旧外，只剩下负担风险、行使技巧与判断等功能所必需的代价。这些基本代价归企业家所得，而不归投资者所得。这样，食利者因无利可食而逐渐消亡。利息与地租的性质相同，并不是货币与土地真正牺牲的代价，而是由于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出现货币与资本稀缺造成的“优先使用代价”。在经济发达的社会，有大量累积的财富，通过国家努力有条件达到资本不再稀缺这种境界。在理论上看来，如果这种境界实现，食利者就不再存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就可以避免了。

三、政府的宏观控制与限度

凯恩斯理论是力主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的理论。他认为“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由社会来综揽；但这也不是毫无妥协折衷余地，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的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为若干；(b)持有此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而且，

实行社会化之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逐渐引进，不必打断社会上的一般传统。”

中国是经过三十多年国家统制投资实践的国家，并没有象凯恩斯预计的那样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相反，越走越远，带来了一系列比私人投资更严重的问题。有一点，凯恩斯已经预见到了：国家即使为了增加就业而加强宏观控制，也不能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的权限以内。要注意国家权威与私人策动力量的合作。国家不能管得太多、太细。他认为政府管住了总投资规模及投资基准收益率两件事，就已经尽责尽职了。总结我国过去的教训，主要也是三条：一是太过看重生产工具的国有化，把国有与国营混为一谈；二是包揽太多，企业失去赚钱的意愿和发展的动力；三是市场机制失去作用。现在的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开放市场，简政放权，政企分开，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经济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理论产生于经济发达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在那里，私人策动力量已经无法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他认为：“为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是避免现行经济形态全部毁灭，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的唯一切实办法”。凯恩斯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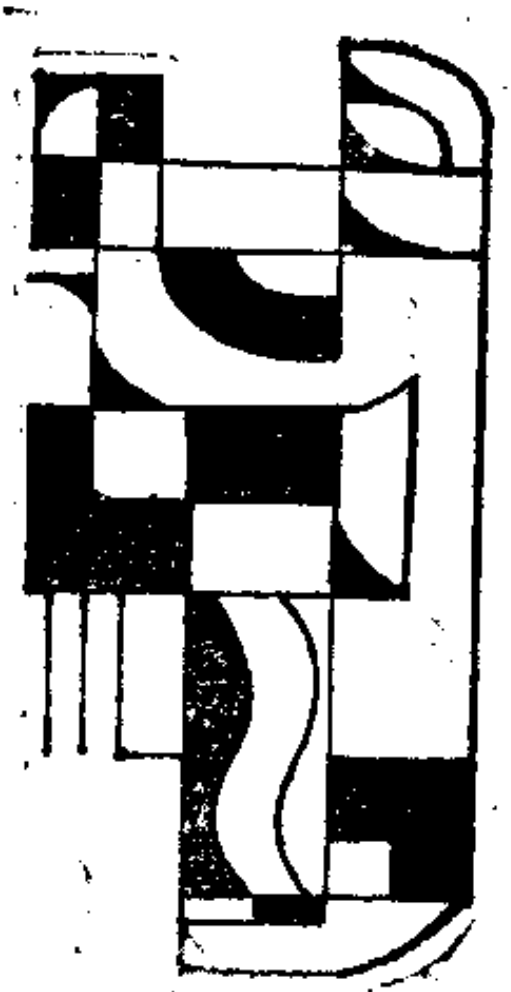
认，“失业现象是和今日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的。”但他认为，政府宏观的经济政策，也许可以“医治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和自由。”我们有社会主义形态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公有制基础上如何进行适度的宏观控制，创造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四、就业理论与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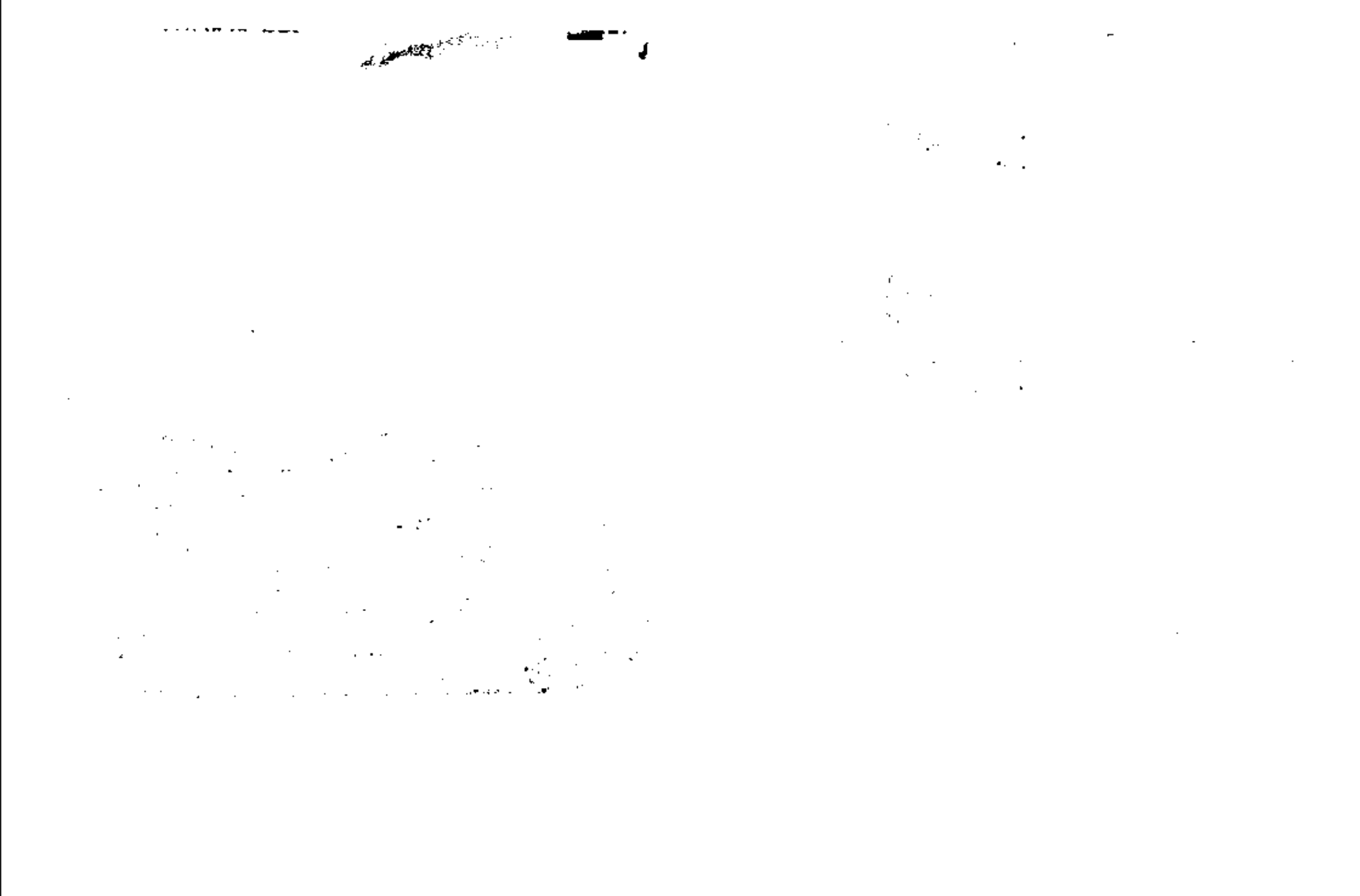
凯恩斯的理论，在讨论国际贸易问题时，将就业问题变成了国内的政策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无需向外争夺市场和向国外转嫁失业之苦。他认为国际贸易将在互利条件下，自愿不加阻挠地进行商品与劳役交换。因此，就可以减少为争夺“生存空间”和市场的战争的危险。

下　篇

宏观商品经济问题探讨



第一部分 引论



为了讨论宏观经济的现实问题，需要借助某些微观经济的理论和方法。本丛书的《看不见的手》一书详尽地介绍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本部分仅就有关的内容作扼要介绍。

第一章
市场与价格

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承认商品经济，同时也就承认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就市场而言，不论是在什么样的制度下的市场，其本质都是商品买卖的场所。为了研究市场，本章采用科学研究经常采用的“分离”方法，把市场从复杂的外部作用下分离出来，从简单模型入手，探索市场的本质和规律；在简单模型基础上，再讨论各种因素对市场的影响。

1. 纯粹竞争市场模型

纯粹竞争市场有如下特点：一、开放性：在众

多市场网络中，每一个市场（任一整个区域）都有很多买者和卖者，双方进出市场完全自由。二、消费者主权性：消费者的买方决策占支配地位，而商品生产者只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进行生产。消费者充分了解市场行情，不受生产者宣传的迷惑。三、生产能力刚性：在市场中，任何一个商品产量的增加，必然以减少另一种商品产量为代价而实现。这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四、自由竞争性：生产者在消费者面前接受评判，自由竞争，没有垄断和寡头力量支配市场，也没有政府的干预和对市场物品的购买。五、不考虑环境保护等对市场供、求双方的影响。

具有上述特点的纯粹竞争模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很罕见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阶段可能曾经出现过，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纯粹竞争的市场早已被垄断、寡头和国家力量所破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之所以在今天重提这个模型，是因为实际的经济特征，可以在这个标准模型的比较下（衬托下）清晰地显现出来，成为研究现实市场的有力工具。同样，也可以成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的有力工具。

2. 市场机制

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引起的经济运动。市场机制可概括为如下内容：

1.一个市场，一个价格

在纯粹竞争市场中，一个具体的商品只能有一个价格。卖者可能会因为不了解行情而叫高价，但买者是了解行情的，就不会买高价的商品。由于买、卖双方人数很多，而且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在广泛的比较与选择中，迫使一种商品（同质的、标准化的）在一个市场的价格趋向同一水平。不同市场由于运费等差别，同一种商品具有不同的价格。市场机制既是供求双方的互相作用，也是不同市场组成价格网达到的平衡。

2.供给和需求决定价格

用数学语言描述供求与价格的关系是：供求关系是价格的单值函数。价格在市场中同时受到两个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商品供给者在低价格条件下，不愿意生产和供应商品；另一方面是需求的（消费者）一方，在高价格的条件下，就会停止购买商品（因为可以选择和替代的机会是很多的）。

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这些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着商品数量和价格。

不要忘记，我们讨论的是“纯粹竞争”市场的机制问题。现实市场的价格受到卖方的欺骗宣传，受垄断力量的左右，受政府和消费者联合力量的干预，供求关系并不一定表现为价格的单值函数。

3.市场的局部均衡与总的均衡

法国经济学家古诺说过：“……任一整个区域，在这里买者和卖者彼此之间的交往非常自由，所以同一物品的价格容易和迅速趋于相等。”市场的“任一区域”相对不同商品而言，其范围是不同的。稀贵资源、黄金、钻石等商品的市场范围是世界性的。在供需双方的作用下，这些商品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趋向均衡。纽约、伦敦、香港的黄金市场局部均衡与总的均衡是一致的。证券市场也大致如此。有些时鲜低值的商品和笨重低值商品，在较狭窄的区域中保持均衡，这是地区性的市场。总均衡是在局部均衡的市场网络中，通过价格的较量后实现的。不同市场的价格不同并不影响总的均衡，因为开放的市场网，买卖者趋利而逐，各自作出边际决策。在频繁的进出不同市场过程中，就把市场联结成真正的均衡的价格网络。

总括上述三点，市场机制是通过价格调节供求关系实现的，价格是市场的灵魂。所谓“行情”，就是指商品价格涨落的信息所包含的供求信息。

市场调节供求的过程是一个自调节过程，是一个连续的灵敏的自稳定过程。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个调节呢？关键在于“有很多买者与卖者”，在于自由进出市场，在于市场的开放。千千万万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每时每刻、每地每区活跃地较量，互相达到妥协，实现了统计意义的均衡。市场机制好象一个精密的自调节装置，价格参数的反馈和输入，很快就放大成强力的执行信号同时作用于供求双方，使双方协调一致，达到均衡。因为市场调节是一个微调节过程，供求双方即使在初期处于盲目状态，也会很快纠正过来。越是偏离常态的盲目，遭到的市场作用就越强烈，逼迫它较快地认识行情，恢复常态。有人认为，市场机制是通过千万个小的盲目性换得宏观的自觉性，通过一时的不协调，换得长期的稳定和均衡。纯粹市场调节与纯粹的主观计划调节相比，前者的代价与风险要比后者小得多。市场调节比主观计划调节有力得多，合理得多，有效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理论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基础之前，“市场力量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但德、英等国还不时怀念纯粹竞争市场一统

天下的年代，力图排除寡头和国家力量对市场的作用，恢复“自由市场”。市场的形态是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复古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过自由市场，而是封闭的自给性社会统一分配。自由市场在中国还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如果非要在主观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之间作出抉择，现在的答案只能选择后者。因为市场调节对发展商品经济有利，所冒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要比主观计划调节小得多。

3. 价格——市价与官价

自由市场（即纯粹竞争市场）只存在市价，只存在与供求相联系的市场价格。如前所述，市价是市场的灵魂。市价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价值规律的体现。任何人为规定的价格，都要受到市场检验与修正。供给一方总是力图卖高的价格，需求一方总是希望买价廉物美的商品，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罢了，双方都无法实现，都只好互相让步，求得均衡。

中国在过去，实行的是官价代替市价政策，价格几十年一贯制，讲的是价格管制和稳定。这种官价

称不上是真正的“价格”，只是行政命令的代名词或产品分配的计量单位。因此，市场的灵魂被摄去，供求双方脱节，一切通过政府加以分配。这不是经济范畴的价格问题，而是政治、行政对经济的强制和干预。由于官价对市价的严重畸变和扭曲，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畸变和扭曲。

真正的官价还是存在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商品规定保护价和最高限价就是一种官价。我们的改革，已经对农村的农副产品价格作了革命性的变革：取消统派购，实行保护价和议购政策。这里的保护价，就叫官价。官价无疑地会强制影响供求关系，使经济沿官方所希望的方向运行，从而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供需的某一方利益。价格的影响远远超出市场范围，任何主观价格的微小变动其力度也是强烈的。国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动用官价这根“可怕”的魔棍。

4. 价格的功能

凡在市场上实现了的价格，就是天然合理的价格。市民抱怨价格“太高”，是因为市民仅仅是消费者，并不了解价格的全面功能。价格的功能主要是：

调节商品的生产，调节生产因素的合理使用（建设），调节财富的分配，调节财富的消费，调节经济各部分的结构和关系，影响宏观经济决策。

一、调节商品的生产

价格对生产的调节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当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的商品生产经营法人后，市场就变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市场反馈给企业的信息中，最具权威的是企业所生产商品的价格。市场价格高，等于向企业发出“增加生产”的信号，以便扩大批量，赚更多的钱。价格信息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如产品质量、式样、颜色、地域、季节、服务、偏好以及一些非经济信息。这些都在具体地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作出调节生产的明确反应。价格是指挥企业行动的无声命令，它比行政性指令灵得多，有效得多。过去的包揽式企业管理体制，主管部门天天讲调整，讲平衡，讲计划任务，讲质量，讲管管，讲效益，讲技术进步，但这是一种非经济语言，企业无法听懂。“三令五申”也无可奈何。一旦放开搞活企业，让企业听命于市场，上述问题，就会自动解决。社会主义市场价格还是消费者对企业的公正评语，它调节着一切企图偏离“生产目

的”的行为。

二、调节生产因素的合理使用

价格的这一功能，在我国叫做调节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功能。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稀缺”是一个基本事实：原材料、能源不足，运力不足，资金不足，熟练劳动力和高级科技管理人才不足，土地不足，劳务不足等等。如何合理使用这些稀缺的生产因素，国家计划部门可以指出一个投资方向，甚至规定一批指令性的重点项目，但这种投资决策不能够解决市场的问题，也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对供求形势作出反应，不可能合理利用一切生产因素和发展的机会。有了价格这个东西，加上开放的、平等的、人人都可以利用机会发展生产的投资环境，搞什么产品是市场需要的，能够赚较多的钱，各种生产因素就会组织到这个方向上来。比如资金稀缺，不可能用它搞不赚钱或赚钱不多的项目，而优先投向那些赚钱最多的项目。中国过去整个价格体系不合理，赚不赚钱是无法量度的，加上各种生产因素被政府牢牢控制在手中，根本不能自由流动，价格对扩大再生产的调节功能无法发挥出来。目前的物价改革如果不配合以资金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基建管理体制、劳力管理体制的改

革，价格的这一功能仍然无法发挥作用。经济上的合理，就是合算，投入少，产出多。非经济意义的合理，不是本书所讨论的内容。

三、调节财富的分配

财富就是剩余价值。萨伊的政治经济学观点认为，商品价格与生产商品的费用是相等的，并不存在"剩余价值"。财富是按投入的人力、资金、自然力等要素加以分配的，在纯粹竞争市场模型下，企业使用资金的报酬——利润，劳动力报酬——工资，都包括在生产费用之内。投资者所得的报酬，与商品在市场中实现的价格关系极大。谁抓住了机会，谁顺应了市场的需要，谁就获得生产经营的成功，得到较多的财富。相反，经营失败者就可能失去财富。物价就是这样调节着财富的分配。

过去，用行政办法，平均财富分配，实质是劫富济贫。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对经济的腐蚀作用是最严重不过的了。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放开商品价格，开放市场，把价格调节财富分配的功能发挥出来，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件大事。放开价格后，有的企业要破产，这是经济的正常现象，毋须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企业学会了生产经营之道，适应了竞争的环境成

长壮大起来。

四、调节财富的消费

消费分生活消费和生产性消费两类。生产性消费就是扩大再生产问题，前面已作叙述，不再重复。生活消费受价格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消费者对价格的反应是：价格越高，购买量越少；价格越低，购买量越多。中国有句古语："一个便宜三个爱"。大拍卖，大减价，处理品特价之所以吸引消费者，主要是价格因素在影响消费，调节消费。价格还可以引导消费，开拓市场，如新产品试销价、渗透价等。不过，这种价格已经从自由价变质为卖方策略价，从卖方影响消费，不属简化模型的现象。

五、调节经济各部分的结构和关系

商品在价格调节下，改变了商品结构，同时也改变着宏观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行业结构。比如美国传统工业的衰落和新兴产业的崛起，除了技术因素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价格因素。传统产业越来越不赚钱，新产业却有很高的利润，生产者的决策是赚更多的钱的原则没有变，生产因素沿赚更多钱的产业流动的规律没有变，这一切的综合效应，就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有一股顽强的势力，总是

企图用行政办法来改变经济结构，建立一个合理的人工经济体系。但是，行政办法不管多么有力，还是不能动摇老体系的一分一毫。比如要加强电力、煤炭业，搞了许多重点项目，花了许多钱，收效甚微。如果把电价、煤价放开，把电厂、煤矿放开，把资金市场放开，让供求关系来决定电价、煤价，缺电、缺煤，电、煤价上涨，使办电办煤有大利可图，资金、人力等因素就会自然流入这个行业，使行业壮大起来。要从迷信权力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去，学会用经济办法来管理宏观商品经济的本领。

六、影响宏观决策

这里讲的不是纯粹的竞争市场问题，而是我国采取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型中的问题。计划要反映和利用价值规律，首先就要接受来自市场的价格信息（不仅指国内市场，还包括国外市场）。当然，宏观价格信息，还包括工资、利息等价格信息。如果不存在市场价格，或市场价格不完整，人为的价格就不能作为宏观决策的信号和依据。本来宏观决策就属于主观范畴，加上采用的依据也是主观的，结果只能是更加主观。结论是明显的：市价是实行宏观决策的基础和依据，改革的任务，就是

要造成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否则，宏观决策只能是一种官僚主义空想。

5. 价格上涨趋势

纯粹竞争市场在一个时期内，供应与需求都在较量中起变化，价格也在起变化。首先，竞争反映到供应一方的，是刺激生产者作更大的节约，以便在一定价格条件下赚更多的钱。另一方是消费者，他们的消费能力是从生产费用中的劳动力部分得到报酬。为了在一定价格条件下，多买一些商品，要求提高工资的趋势成为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与商品生产者降低生产费用的努力相比，工资上涨是刚性的，上涨速度比节约的费用要快，造成绝对工资上涨的后果。更多的消费资金，改变了消费的边际抉择，使消费者愿意在较高的价格下购买原来未涨价的同一商品。这就是价格上涨趋势的主要原因。近代的科技和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商品包含的软劳动越来越多，其中的劳务价格也越来越高，商品在发生质的变化，商品的效用（特别是精神效用）提高，这是商品价格上涨趋势的又一新原因。

商品价格上涨趋势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史实。因

为商品的生产是供人们消费的，人们不能接受降低工资来降低消费的政策（哪怕是同步的下降），但却可以接受提高工资，也提高价格（哪怕是降低实际消费水平）的政策。这是一种消费者心理因素在起作用。生产者的心理也是希望本厂产品价格上涨以抵消工资上涨对利润的影响，甚至还能稍许多赚些钱。“总需求不足”规律，使供给能力大于需求能力，形成生产能力的部分闲置，更加剧了物价上涨趋势。这是因为在闲置生产能力情况下，减少货币工资，首先会遭到工人的强烈反对，带来政治冲突。即使减少工资是可行的，这样做反而抑制了需求能力，从而抵消了降低工资的有利作用。所以，工资上涨趋势维持不变，价格上涨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了。

6. 广义价格—利润、工资、利息、租金及劳务支付

凡进入市场进行买卖的商品和商品形态的劳务，都存在供给与需求的双方较量，都会有与供求相对应的价格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姑且不论，但生产商品需要消耗活劳动这一

点却是没有疑问的。把工资看成消耗了的活劳动的价格，也是顺理成章的。社会主义市场包括资金市场。资金稀缺和供求的矛盾，必然要反映到利率上来，利息就成为资金这个特殊商品的价格。如果这些资金形成固定资产，就成为资本，利润则是资本的价格（是通过股票交易表现出来的）。租金，包括土地、设备的租金，也是一种价格形态。购买设计、科研、咨询服务等劳务支付的费用，也是这些劳务的价格。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的范围将日渐扩大，劳务价格问题也会逐渐变成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正处在转变观念的初期，许多商品经济学概念还很生疏，很不习惯，一时还难于接受下来。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价值规律本身会通过活生生的事实教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不要太久，一切不适应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旧观念会随价值规律席卷而去。

7. 市场原理

纯粹竞争市场具有内在的规律，可归结为：引力原理，竞争原理，边际原理。

一、引力原理

推动商品流通的势能在于两个市场的价差。甲市场相对乙市场等效价格（包括乙⟶甲运费）越高，甲市场的吸引力也就越大。设吸力为F，J为价格，$F_{甲-乙}=K(J_{甲}-J_{乙})$；K是一个与路程运费有关的系数。

当$F>0$　即$J_{甲}-J_{乙}>0$　商品从乙流向甲；

当$F=0$　即$J_{甲}-J_{乙}=0$　商品不发生流动；

当$F<0$　即$J_{甲}-J_{乙}<0$　商品从甲流向乙。

这个原理与牛顿万有引力原理有些相似。

$$(f=G\frac{m_1 m_2}{r^2})$$

过去，我们在流通管理体制改革上做了不少文章，如下放二级批发站，政企分开，建立贸易中心，农民进城经商，个体、集体、国营商业一起上，搞多种经营和联营等，但总是无法实现根本性的突破，流通还是搞不活。根据引力原理，抓流通改革的关键在于抓价格改革，要开放市场，放开价格，拉开价差，流通才能够真正活起来。没有价差的流通只能是行政的调拨与分配，不是自发的流通。几年前湖南的鱼、鳖、鸡、蛋、猪等源源流入广东市场，主要是广东市场这些副食品价格高于湖南，具

有很大的吸引力。现在广东鱼价与湖南拉平了，鱼的流动也就停止了。吸引作用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际市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真正的开放，是价格的开放（货币也要融通），使国内市场网络和国际市场网络联结起来，按供求关系决定商品流通，由价格差决定商品的进出（辐射与吸引）。

二、竞争原理

市场机制讲到底，就是通过竞争推动经济运行。只要有市场存在，只要是搞商品经济，竞争原理就要起作用。谁与谁争？争什么？市场竞争是商品生产经营者间的竞争。争顾客，争市场，争机会，争好价格，争实现更多利润。当然，也是技术竞争、管理竞争、人才竞争、效益竞争。但这些竞争不是问题的本质，实质是争名争利。搞商品经济，最重要的是赢得顾客信誉，顾客至上，顾客是皇帝、神仙。信誉就是“名”。争名是为了把商品以更好的价钱和更大的数量卖出去，以便获得更多利润，这就是争“利”。如果不把竞争的这个核心问题讲清楚，貌似清高，不闻“铜臭”，对深刻理解商品经济概念是没有好处的。发展商品经济，资本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毛孔都滴血那种可怕的东西了，它是

人们亲自创造的特殊财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神妙机器。让社会主义企业在法律范围内追求最大利润，这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头号目标。“唯利是图”是理所当然的。企业不逐利而动，就不成为企业了。

现在远远没有造成一个自由的竞争环境，市场机制就不能正常运行。抑制竞争的最大因素是“指令性计划”。市场机制，竞争与指令性计划是不相容的。要么搞自由竞争，要么搞指令性计划。企业要么在市场环境下生存发展，要么在国家包揽下度日。国家把企业生存必需的资金、劳力、市场、电力、铁路运输、国际贸易的种种要素都紧紧捏在手里，企业的权益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竞争就是一句空话。《决定》指出，要把搞活企业当作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改革，唯有竞争主体——企业活了，竞争原理才能起作用。考察企业间竞争问题时，可以发现，企业间竞争可以归结为厂长、经理间在决策和管理方面的竞争。中国的企业的多数厂长没有象松下一样的事业心和热忱，还不是与企业同命运共呼吸，而是站在企业利益圈以外管理企业。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无法开展企业间的真正的高水平的竞争。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厂长拉进企业的利益圈内来，让厂长参加利润分配。企业利润越多，厂长所得也就越多。

企业越发展，经营项目越多，规模越大，分厂越多，厂长所得也就越多。相反，企业不景气遭到破产，厂长要倾家荡产。只有这样把企业的喜怒哀乐转变成厂长的喜怒哀乐，厂长才可能一天只睡四小时，为企业绞精惮虑，绞尽心机把企业办好。目前的厂长负责制解决了“权与责”的问题，并没全面解决“权、责、利”结合问题。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利”，才是经济责任制的核心问题。没有勇气正视这一点，就不可能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家庭工厂和集资办的工厂的厂长和股东是中国新一代真正的企业家，只有他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商品经济，懂得市场和竞争原理。

三、边际原理

供求双方对市场作出反应之前，都会审慎掂量自己将要采取的行动的利与弊。他们力图作出利大于弊的决策。在非利决策中，是选择损失最小的行动方案。

边际是一系列动态判断的轨迹。没有经济的变化和运动，就没有边际的概念存在。生产者在某一规模下生产，当生产量作微小变动时，都会引起供给的变化，从而引起产品价格和收益的变化。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供给引起收益的变化，就称供给的边

际收益。在一定范围内，边际收益是大于零的，增加供给都会给生产者带来好处。一旦供给量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再有利可图了，生产扩张的行为就会停止。

消费者也有相应的边际。凡是进入市场的一切要素（劳力、劳务、资金、技术），都有自己的边际。

各种边际，不是一条固定不变的界标，而是随着参加市场人们的心理变化而浮动的指示灯。

除以上三个主要原理以外，还有价值原理。这是供求双方在效用与价格之间的选择原理。买卖双方都力求效用与价格之间的统一。供方不愿意多花成本生产多余的（卖不出价钱的）效用；需方也不愿意多出钱买那些多余的效用。价值工程就是根据这一原理建立起来的。

8. 市场决策

市场决策，主要是对供给一方而言的。上一节在讨论市场原理时，提出的边际原理，是市场决策的基本依据。决策内容无非是应该在什么时候生产什么商品，生产多少，如何定价，如何服务等。

商品在市场中存在一个“寿命期”，几乎每一种商品，都经历一个试销、旺销、滞销直到退出市场的四部曲。用数学方法分析商品销售量与时间关系时，可以绘制出每一种商品的寿命曲线。人们需求的发展与更新节奏越来越快了，需求的内涵越来越包括精神消费。在需求的推动下，商品生产者同步地缩短了新商品的开发周期，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商品，商品的寿命期也越来越短了。为了顺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越来越重视市场的决策工作。因为这种决策属微观决策范畴，这里不作专门讨论。宏观的市场决策主要是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运用税收、货币政策，影响市场运行过程。这些内容，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重点，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逐步展开。

9. 城市的经济作用

城市是从商品集散地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从供给一头开始的，而是从需求一端出发的。城市开始是消费聚集地，各类消费品从四面八方向这里集结。商品的集结引起资金、劳务、信息的集结。于是城市便成

为局围区域的经济集结点。哲学中有一个基本规律——量变引起质变，高密度集结的经济产生了奇异的“聚合效应”，表现出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功能，使各种生产要素发挥最高效能。城市成为一个具有生命的经济有机体。

市场机制是这个经济有机体的生命表现。经济细胞在市场机制下协调一致，使经济不断成长、壮大。丧失市场机制的城市，便丧失了生命。

城市成为供给基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就地制造，具有十分优越的环境，企业在这里结成群体，要比分散独立存在有力量得多。

城市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形形色色的需求，这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城市进行劳动力、资本的再生产，不断组成新的生产力。城市与城市之间结成网络，使生产因素在更大范围内综合，产生着巨大的社会效益。

10. 关于价格的其他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的价格问题包括如下几个问题：

1.扭曲价格问题

在过分相信行政经济控制能力情况下，官价成

为一种主观的、强制推行的价格。与市价相比，这是一种严重扭曲的价格形态。价值规律在客观上的存在和不可抗拒，扭曲的价格必然造就扭曲的经济结构。扭曲引起的应力，要靠整个管理体系，用上千万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计划指标与之抗衡，以维持经济运转。

在进行价格改革时，价格要复元，就要产生反弹和引起震荡。如果害怕这种震荡，采取“迈小步”的慢慢回弹策略，势必要保持与之适应的管理体制，这将影响整个体制改革的进程。对一个体制而言，要发挥100%作用和发挥20%的作用并不是重要的，只要它还在起作用，它就要100%地存在下去。此外，被扭曲的价格一旦松动，其进程是很难控制的，市场的力量将冲击旧的体制，把旧秩序搅得乱七八糟。政府在宏观上，要因势利导，采取相应的货币、财政、工资、外贸政策与之配套，以保证对价格改革的顺利实现。

2、价格控制问题

市场价可分解成三个组成部分：一是供给成本；二是税收及对企业的转移支付；三是企业利润。工人工资、原材料动力、资本价格的增长将影响第一部分，引起价格在费用推动下的上涨。税收及转移支付可以成为重要的影响价格的杠杆。企业

利润将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直接影响供给规模，决不可忽视这一重要部分。我们说物价控制，决不是指用行政办法对物价的直接控制，而是通过调节三个价格组成部分的具体政策，使价格朝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运动。

3.对每一种物品价格的改革都将牵动整个价格体系

有人设想物价改革难度大，风险大，为慎重起见，先从某些商品（如农副产品、煤炭、生产资料等）“放开”起步，“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价格的运动在宏观上表现为“链式反应”，一个物品价格的放开，就象点燃了一根导火线，会向整个经济体系蔓延；一个地区的价格放开，就会席卷周围地区和全国；商品价格的开放，将传递到劳务价格、货币价格和汇率，引起广义价格的开放。对价格改革而言，不改则已，改则牵动全局，“迈小步”的策略是很难实施的。

4.价格改革的时机问题

价格对国家、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关系极大，但选择价格改革时机的依据不是考虑既得利益的分配问题，而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从增加供给角度看，目前越是匮乏的物品和劳务，越说明控制价低得不合理，已经严重影响供给的增长。这是价格改

革的最好时机。这时放开价格，虽会引起市价的跃升，但正是这种跃升，才能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从调整经济结构角度看，放开价格会使过剩商品跌价，抑制这部分企业的生产，甚至造成有些企业破产。这种变化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因此，无论从发展生产，或改变经济结构使之合理化角度看，尽早放开价格管制，就是我们可选择的时机。任何犹豫和拖延，都得付出重大经济代价。

第二章
供给和需求

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的精髓。十九世纪西方流行一句妙语："教会鹦鹉说'供给和需求'，也就教会了它经济学。"老实说，我们大多数的经济工作者并没有领悟到这一点。这不能够责怪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由于理论和体制的缺陷，把经济从属于阶级斗争并为阶级斗争服务，抑制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也不可能对"供给和需求"作郑重的研究。如果说，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那么"供给和需求"则是最具权威的教授。我们还很不熟悉商品经济。因此，要老老实实向这位"教授"请教。

1. 如何看待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决定》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它决定消费，而消费的增长又是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开拓广阔的市场，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又决定生产"。这种叙述澄清了纷纭的争论，把消费与供给的关系理顺了。以《决定》精神为依据，可以作如下引伸：

一、供给是需求的物质基础

这是一个"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没有可供消费的商品，就谈不上消费本身。因此，供给是"起点"。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堕入了唯心主义泥淖。

二、供给是在需求的指导下活动的

商品经济已经把供给物质性的第一性让位给市场的需求了。商品是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而生产的，市场上无人问津的物品，谁也不会去生产它。需求在商品经济阶段，无疑是决定和影响供给的主导方

面。马克思在这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消费"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

三、"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商品生产者是诚心信仰"消费者主权"论的。他们从来不为如何组织生产，能否生产出合格产品发愁，倒是经常为自己的产品能否在市场上适销畅销着急。只要市场需要，供给一方就会千方百计生产出来。萨伊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定律早已被颠倒过来了。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需求不振，刺激需求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见上篇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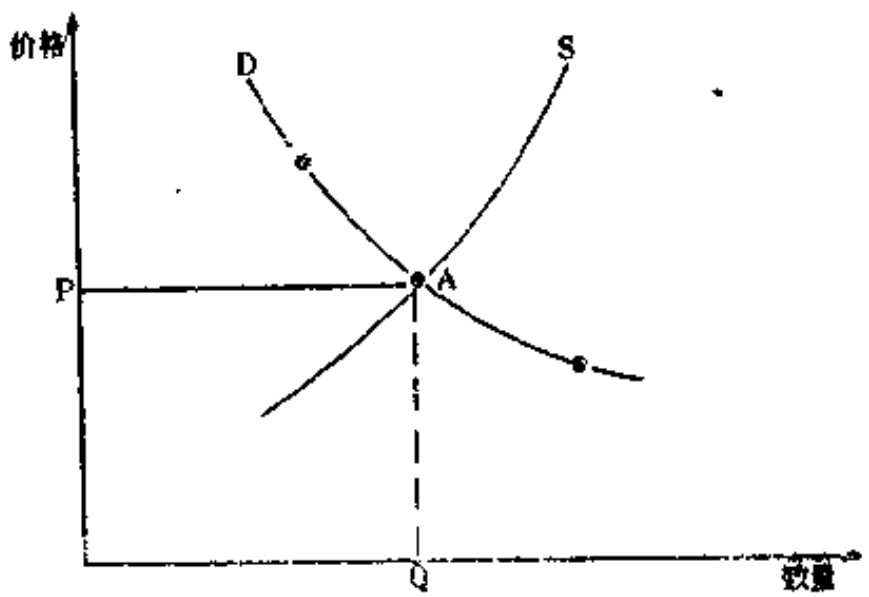
四、市场问题一般可以归结为供给和需求问题

市场问题，就是买卖问题。要想揭示买卖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就要讨教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方法。

2. 市场供给—需求分析方法

在纯粹竞争市场中，供给、需求与价格联结成

有机的体系，它们之间在数量上的关系及变化规律，可以用坐标和曲线表达如下：



曲线D称市场需求曲线。这条曲线是指某一时刻的某一市场，需求与价格之间相对应的关系。曲线上所有的点，在同一时刻都是有效的。这条曲线并不反映市场的需求变化，一条曲线只反映一种确定的需求倾向。这种倾向是：需求量随价格的下降沿曲线方向增加商品的购买量。为了测量价格变化对数量变化的关系，常常使用需求价格弹性这一指标（e），

$$e = \frac{\Delta Q}{Q} \div \frac{\Delta P}{P}$$

$$= \frac{\text{数量的相对变化率}}{\text{价格的相对变化率}}$$

当e＜1时，称需求刚性，需求对价格的反应不敏感；

e＝1时，需求与价格变化同步，称需求是单位弹性；

e＞1时，需求对价格变化敏感，称这种需求是弹性的。

e越大，弹性也就越大。

由于需求对价格呈曲线关系，每一点的e是连续变化的，因此不应把一整条曲线说成是“弹性”的或“刚性”的。

曲线S是市场供给曲线。有关定义和条件，与曲线D是一致的。但S的变化倾向与D相反，当价格提高时，供给沿曲线S增加数量。也可以用弹性和刚性来描述供给对价格变化关系的特性。

曲线D和曲线S绘在同一坐标上时，两曲线由于走向相反的原因，必然会相交于A点。与A点相对应的数量Q和价格P是实现市场供求均衡的数量与价格。在确定的D和S下，只能有一个A点。在这一点上，供给一方要卖的数量与需求一方要买的数量刚好相等。在同一市场的一个短时间内，价格偏离P时，将同时影响供给和需求双方沿着D、S作方向相反的运动，直到达到A点为止。这正是市场机制的几何形象。“均衡”将意味着上述反向运动的中止。市场在ΔP（价差）下运行，ΔP＝0时，推动力也降为零，便达到了A点。

现实市场的需求与消费者的偏好有很大关系，供给与生产费用也很密切。这些都在影响D与S曲

线。我们仅仅把纯粹竞争市场的供给—需求分析当作揭示现实市场的工具加以应用，并不是市场现实本身。事实证明，供给—需求分析是简便、形象、有效的方法，对我们学懂商品经济许多复杂的问题很有帮助。

3. 利用供给—需求分析方法分析几个现实的经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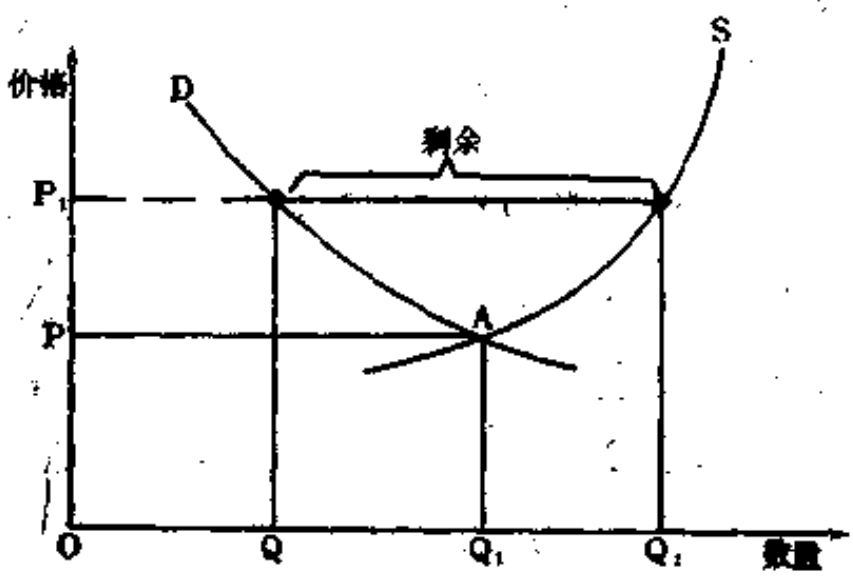
为了掌握供给—需求分析方法，兹举如下例题：

一、煤炭支持价问题的讨论

《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关键。普遍舆论认为：煤炭价格“偏低”（非经济学语言），已经严重影响煤炭生产的发展。过去所谓偏低的价格，是主观价（官价），是几十年不变价，也是与生产、消费无关的“行政”价格。如果是市价，就不能称“偏低”，它应是天然合理的水平。价格改革的本质是把价格放开，让市场机制起作用。在放开价格的基础上，才可能实行“支持价”（又称保护价）的宏观价格管

制政策。

假定在煤炭价格放开后，某市场煤炭供给需求达到了如图的均衡，这时P低于支持价P_1。



供给在P_1的刺激下，多开采了Q_2-Q的煤炭，而需求在P_1条件下，把消费量减少了$Q-Q_1$；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造成了Q_2-Q_1的剩余。这部分煤炭或由国家用支持价购买下来，积压在煤场；或下一道行政命令，限制煤矿生产；再就是积压在生产部门。不管是采取哪一种办法，都需要为这一政策付出代价。支持价越是偏离均衡价，这种代价就越大。有些地方在执行支持价后引起了煤炭积压，感到疑惑不解，对一贯缺煤的地方出现了卖煤难的现象议论纷纷。缺煤是一件伤脑筋的事，煤炭积压也是一个恼人的难题。于是，市场机制便起了作用，迫使一些地方煤炭降价。那些为提价而欢欣鼓舞的

煤矿终于明白了，价格并不是一厢情愿所能决定的。能不能执行支持价主要听命于市场，而不听命于政府。事实上，在去年规定支持价以后，有的地方反而降价，有的地方维持原价不变，这些都是依据市场情况作出的正确抉择。

二、钢材的黑市价格问题分析

钢材的供求双方矛盾很大，市场可供量大大少于需求量。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钢材黑市价格比计划（指令性）价格高2～3倍。计划价实际是政府强制推行的管制价，由于它过大地偏离市价（表现为黑市价格），强大的价差产生的推力，冲破各种行政管制，直到实现市价为止。管制价是和计划分配指标配套存在的，“指标”本身就包含了诱人的价差。于是“指标”变成有价的东西，可以倒卖。掌握指标的人，就可以以权谋利。尽管“三令五申”，还是无法避免“不正之风”的发生。这里可以看出，“指令性”计划与市场是多么不相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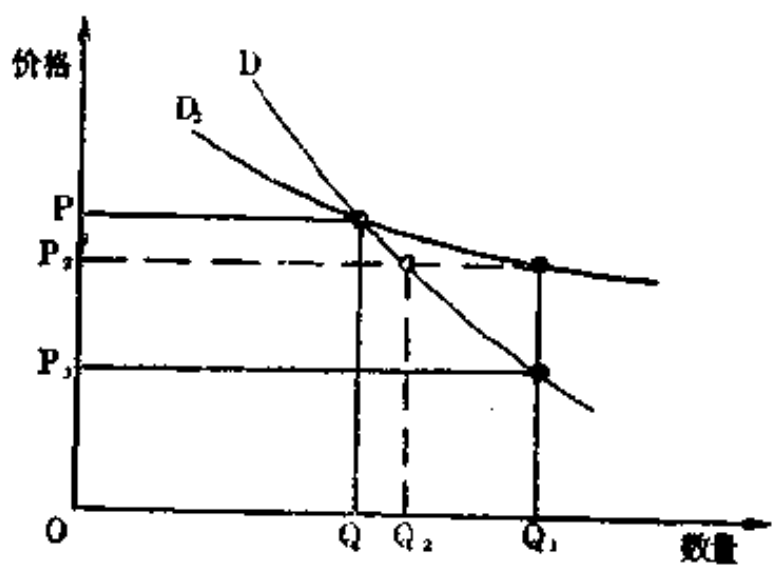
黑市是商品经济的正常行为，无须大惊小怪。明智的做法是，开放钢材市场，取消指令性指标，让供求双方见面，把黑市的起点从政府部门这一端转移到钢材生产企业上来，把高价的好处从倒卖环节中转给企业，以增强对供给者的良性反馈，增加

供给，缓和供求矛盾。附带的好处是可以杜绝倒卖指标的不正之风。

三、粮食投机和对粮食市场的作用

近几年来，许多产粮区粮食丰收，出现严重的卖粮难的问题。这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开放粮食市场，取消统派购，把粮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二是需要有粮食投机活动。

“投机”一词名声并不好。同黑市一样，投机也是商品经济的正常行为。



在粮食投机活动参加下，粮食某市场的需求D将改变为D_2。P是正常的均衡价格。丰收后粮食供给量为Q_1，较正常需求量多Q_1-Q。如果没有投机活动参加，市场粮价就要下跌到P_1，这种暴跌将损害农民利益，或影响来年的产量，或将迫使农

民销毁剩余粮食以维持均衡价P。投机活动加入市场后，将以比P稍低的价格购买一部分过剩的（Q_1-Q_2）粮食，而在P_2价格下，消费者也愿意多消费剩余的另一部分（Q_2-Q）。这样，保持了市价的相对稳定，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带来好处。在同一个市场同一时期内，投机商并没有好处。只有在其他市场或歉收年，投机商吞进的粮食重新进入另一个市场，才有利可图。做这种生意需要精明的决策，要有远见和灵通的信息，不是一般商人所能胜任的。精明的粮食投机商，削平了粮食价格的波幅，做到以丰补歉，稳定市场，是搞活粮食不可缺少的力量。

四、生猪、蔬菜价格放开后的变化趋势

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副产品价格改革迈出了重要而且关键的一步。生猪、蔬菜取消统派购，由供求决定价格。各地决策者对突如其来的巨变有许多顾虑。如何估计放开价格后的变化趋势？

在猪源、菜源丰足的地区，市场虽处在官价控制下，但供给和需求基本处于均衡状态。初放开时，有可能会出现供方盲目涨价的现象，但供给后备大，好价格立即招来更多的供应量。在需求刚性情况下，市价很快就会沿供给曲线回归到均衡点上

来。在货源不足地区，将是另一种情况。放开价格后，很快在供求的作用下，使价格上升到均衡价（比官价高），好价格起的第一个作用是，吸引四邻市场的货源，使市场上有价也有货；第二个作用是，好价格刺激本区的生产者增加生产和市场供应。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主要是供给的变化），货源充足了，市场供应量增加了，均衡价就会降下来。从以上分析可见，放开农副产品价格，即使是对货源不足的地区，也是有利无害的。放开价格的种种疑虑是没有根据的。市场上越是缺少某种商品，越是说明这种商品价格控制太死、太低，越控制东西就越少（最后只好发票证分配）。唯有大胆放开，东西才会越放越多。

4．广义的供给与需求问题

以上讨论的是一般商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广义的供给与需求，是包括一切进入市场交易的各种生产因素。如资金，劳务，信息，技术产品，科技成果，文艺作品，设计图纸文件，可行性研究，医疗服务，法律服务及各种生产生活服务等等。每一种因素都是一种特殊商品，都遵守价值规律，都是

供求与价格组成的有机体系，都可以采用市场的供给—需求分析方法研究各自的现实问题。

放开对商品的人为控制尚且阻力重重，要放开对资金、劳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控制，就将更加困难。光有对一般商品的放开，靠市场调节，而没有全部的特殊商品市场的开放，市场机制是无法发挥作用的，而一般商品市场的开放也终究是不能实现的。各种生产因素的市场相贯通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比如对某一般商品的供给需求分析结果，某商品供应量不足，价格有吸引力，供应者决定扩大生产能力以增加供应量。可是扩大生产能力的决策，受到各级“审批”的阻难，一拖就是几个月，机会便错过了；受到资金管制的制约，无法及时得到足够的资金；还有扩大生产所需的劳力、技术、设备、原材料、电力、各种生产性劳务，随便哪一种都无法从市场上购买到，靠国家计划分配又不能得到满足，任何正确的市场决策都将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决策的落空，需求与供给就要脱节，市价也只好退回到僵化的主观价。上例说明，我们面临的价格改革应该是广义的价格改革。什么时候把价格改革完成了，广义的供给和需求才具有实质内容，真正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模式才算建立起来。

第三章
国民经济的统计

我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有经验有效率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统计体系是搞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基础。统计体系是与国民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过去，我们搞的是单纯的指令计划经济，而现在搞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民经济体制变了，许多经济观念也变了。有关国民经济统计的体系、内容、原则也跟着发生革命性变化。我们过去熟悉的、司空见惯的东西要被新的、陌生的东西所代替。这些新的东西就新在“商品经济”上。商品经济统计原理是本章所要研究的内容。

1. 国民经济统计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基础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任务，在于调节社会总需求，达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和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高速地增长。因此，国民经济统计的任务在于准确及时地统计各个层次的，不同区域的，各种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信息。宏观调节的本质，是国家对商品经济市场反馈讯号的积极反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力量不是万能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宏观调节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化的产物，对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有重大作用。我们反对主观盲目的指令性计划调节，因为这种调节违背了价值规律，阻碍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本性不相容。但我们不反对在市场机制无能为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时，发挥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职能，对市场进行科学地调节。做好宏观管理的基础就在于搞好国民经济统计工作。统计系统是信息系统，是传感器，是宏观经济决策中枢的神经。这个系统在正确的统计原理指导下，有效地开展国民经济统计工作。

2. 国民财富的统计

我国过去是用工农业总产值作为计量国民财富指标的。因此，在规划2000年经济发展翻两番的目标时，也是采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这个指标相对商品经济而言，有两个缺陷。一是不确切。产值是产品数量乘以价格（不变价），其中包含了半成品的转移价值，并不是全部新创的可供消费的财富。二是不全面。建立“工农业总产值”指标的理论依据是，只承认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才创造财富，第三产业（包括商业、建筑业、运输业和一切劳务性产业）的收入不能计入国民财富之内。这种理论不仅不符合商品经济本性，也不符合我国经济实际。我们要采用国际通用的国民总产值(GNP)作为统计我国的国民财富计量指标。任一生产经营者和劳务提供者创造的财富，是在扣除从别的生产经营（服务）者那里购买来的价值后的增值部分。全社会的增值总和，就是国民总产值（GNP）。对一个企业而言，新创财富包括：工资、利息、利润、税收和租金。这些项目的总和恰恰等于工厂总产值扣除购自外界的原料、半成品和劳务后的增值

（我国又叫净产值）。这里体现了“收入等于产出”的重要统计原理。一个企业如此，全社会也是如此，每有一元钱的产出，就创造了一元钱的收入。全社会国民财富的统计，根据这一原理，只要统计：全社会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国家各种税收总和；利息、股息和租金总计；利润。搞好以上项目的统计，就搞好了国民财富的统计（外贸的收入计算在企业收入之内，不另列项）。

3. 国民财富分配的统计

根据“产出等于收入”原理，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是同处在一个不可分的体系之中。上一节就是从收入角度统计国民总产值的。读者可以发现本书所采用的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理论，是萨伊的“三位一体”理论。这种与生产因素相联系的分配体系，国家（包括地方）的税收，是公有资金和社会服务的报酬。劳动者要想安居乐业，必须依靠国家的保护、协调和服务，因而必须付出代价。在这个分配体系中，国家一般不从事直接的经济生产经营活动，也不包办任何“重点能源交通工程”（国防工程除外）。国家的税收主要用来购买

物品和劳务，用于公共福利（救济），国家工作人员工资，军队、警察费用，消防、教育、外交等等。国家向劳动者取多少与国家的任务关系极大。国家想包办的事越多，必然要向下面索取越多，财富分配就可能出现上重下轻的不稳定结构。企业缺乏足够的财力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不仅如此，财富集中必然导致权力的集中，形成高度集权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可见，国民财富的分配原则，是决定不同经济体制的基础。“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古训仍然有现实意义。要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这是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键所在。

对国民财富分配的统计原则是：严格按生产因素进行分配统计。这个原则，对外国独资、合资企业也是适用的。不管资金、设备、技术、管理劳务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应按同一原则，平等地参加分配。国家不包办外贸活动，外贸由企业直接进行，外贸的收益，也是按生产因素进行分配的。

4. 国民财富消费的统计

消费分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两大部分。创

造出来的国民财富，按生产因素分配开来后，就开始了消费。主要讨论劳动者消费与政府消费两部分内容。

劳动者的收入（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净收入）有三种消费方式：一是买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二是储蓄；三是参加开发性投资，买股票或集资办厂。中国的资金市场开放，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可能平等地利用机会，从事开发性的经济活动。劳动者的这种消费行为是社会经济充满活力的泉源。千百万企业家活跃在投资开发领域，使新的产业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国家不必投资，也不必为企业承担风险，负担亏损，凡是成功的，国家就可以收税。劳动者通过开发性的劳动，收入增加了，新的开发性消费又发展了。这象滚雪球一样，越滚，国民财富就越多；国民富了，国家也就富了。储蓄是一种待消费行为。如果储蓄在银行，这笔财富将进入开发领域；如果取出来买生活消费品，就进入生活消费领域。生活消费不会创造新的财富，而是减少财富。有人就因此看轻生活消费，进而主张抑制消费。这是一种产品经济的偏见。中国有句时髦的经济学谚语："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勒紧裤带搞建设，建设又是为了什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目的是为了消费，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

化生活水准。失去这些，就没有幸福，就失去劳动追求的目标，从而也就失去了建设的积极性和热情。另外，在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一节中，已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消费决定生产，指导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买，生产过程也就中断了。可见，我们没有理由鄙薄消费，相反要高度重视消费，引导消费，刺激消费。消费与生产好比经济机体的两条腿，缺一不可，一长一短也不行。

政府消费有两种方式：一是向市场购买劳务，以工资方式付给政府工作人员；二是购买各种所需商品。这些消费的结果，维持了国家安全、稳定和社会福利。也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马克思称社会主义的税收是“必要的社会扣除”。严格讲来，政府工作人员也是在从事劳务转让。只是不针对哪一个人或企业转让，而是向全社会转让。税收则是社会这个主体的购买力。由于政府不参加生产、经营与开发，这方面的消费全部转入民间。

有关原来的国民财富消费的统计指标体系，必须按上述原则进行改造。

5. 关于价格指数问题

国民经济统计为了考察经济的动态过程，都强调“可比性”。因此，“价格指数”便成为统计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价格指数”是同样数量的货币，在不同年度买同一商品量的比数。

经济学意义的物价，只要在一个市场中实现了，就是客观的合理价格。把不同时间、不同市场的物价加以比较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物价包含了全部商品本身和商品经济信息，不是简单的数量比较就可以说清楚问题本质的。抽象的“不变价”能不能作为量度经济变化的尺度？过去的答案是可以的，以1970年不变价换算1980年的国民财富数量，再与1970—1980年间任意一年的换算财富比较，就可以得出变化数值来。过去的价格，并不是与供求相联系的客观价格，仅仅是一个计划指令符号，带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即使在价格上有变化，也是人为的调整。在产品生产与分配都实行管制的情况下，价值指标不具有实质意义。在没有意义的基础上，作些数学上的处理，就象做算术题一样，答案可能是正确的，至于实际则是另一回事了。在市场

上，物价千差万别，瞬息万变，灵活反映着商品品种在更新、扩大，质量在改进，服务性价值在增加等信息。统计某一种商品的全国年平均价几乎是不可能的，用它与不同年度的商品比较也是不可比的。但对某一具体市场、具体商品的价格变化是可以加以考察的。比如香港的黄金、钻石价格，伦敦纽约的钨砂价格，都可以通过行情发布，算出价格的涨落程度，也可以采用“价格指数”这个数值衡量物价相对变化量。这不是用来作国民经济统计，而是用于指导商品买卖。对一个具体区域，为了保证居民收入不因物价（主要生活消费品）变动而降低，对一组特定的生活消费品价格作连续记录，算出某一段时间的物价变化率（又称生活指数），用以修正工资发放额。这也不是属于国民经济统计范围内的应用。

我们正处在一个从纯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时期。有人担心开放市场，放开价格以后，物价会飞涨，以产值计量的国民经济财富会出现“膨胀”，主张以1980年不变价加以校正。这个主张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放开价格，不会出现所有物价都大幅度上涨的危局。价格只与供求发生关系：供过于求的商品，开放市场后，会降价；供应不足的商品会涨价；供求均衡的商品则价

格不变。不顾市场情况，强行提价的商品，将无人问津，自找苦吃。第二、1980年不变价是一个旧体制下的主观价，无法量度市场上实现的价格。比较体系变了，强调“可比”已经失去了基础。

总之，国民经济统计必须按现实市价和收入计量，不必用某年的“不变价”加以校正，更不能以旧体制下的不变价“校正”新体制下的数值。每一年按现价（市价）计算的国民财富，都是可比的。2000年国民总产值翻两番也必须以现价计算。

附：对“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讨论

从上述的商品经济统计原理可知：国民收入是指已经实现的、可供分配和消费的实物、劳务的总价格。国民收入是实物、劳务与价格的统一体。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可供实物量才算是实实在在可供分配和消费的财富，这是产品经济观念。在商品经济体系中，实物与价格是如影随形，密不可分。既不存在抽象的价格，也不存在没有价格的实物（包括劳务）。有人认为：1985年钢材、汽车等涨价，在实物量没有明显增长的情况下，收入有了大幅度上升，造成了国民收入的虚收现象。国民收入超分配现象与国民收入虚收现象是互为因果关系的。这些人把眼睛盯在实物上，对价格视而不见，正是传

统统计学的特征。旧体制的指令性计划管的是实物量的生产、分配，而不是价值量的收入分配。但是，在财政收支、工资总额、市场交易等具体经济活动中，人们又不得不采用价值量这个概念。很明显，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国民收入“虚收”说法，是产品经济观念的幻觉，并不是客观存在。

在对已经实现了的国民收入进行分配，一般不会出现“超分配”现象。在对政府、企业、居民的分配中，如果企业、居民多分了，政府就会少分；同样，政府多分，必然会减少企业和居民的所得。在“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导下，1985年居民和企业的分配增长较快，相比之下，政府收入增长要慢些。这是对传统分配结构的改革，对搞活企业、发展生产起积极作用。没有理由把企业、居民多分配看作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

在具体经济活动中，出现向银行透支，财政赤字，引进外资，以及个人、企业借债等现象。这些现象是不是“超分配”呢？不是的。以国家财政赤字为例：国家支出超出预算出现赤字时，就要向银行透支或发行公债以补亏空。银行的钱是企业和居民消费结余的存款，向银行透支，就是国家向企业和居民借债（债券亦然）。国家每创造一元钱的债务，就相应创造了企业、居民的一元钱债权。这是

属于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不会出现“超分配”现象。同样，企业多发奖金，发实物，是与减少企业留利和上交国家财政联系在一起的。采取控制消费基金、限制企业消费的办法，不可能纠正本来就不存在的“超分配”倾向，只是对国家、企业、居民间的分配比例加以调整。控制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政策，在于把一部分居民所得调向国家财政，增加国家收入。

6. 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

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守如下原则：

1. 国民总产值（GNP）≡个人消费（C）+国内总投资（I）+政府的物品和劳务购买（G）+物品与服务的净出口（X－M）；
2. 国民总产值（GNP）≡个人消费（C）+居民、企业储蓄（S_Σ）+居民与企业纳税（T）

   即：

   $C+I+G+(X-M)=C+S_\Sigma+T$

   $I+G+(X-M)=S_\Sigma+T$

兹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统计指标说明如下：

国民财富总计指标采用与世界经济统计可比的国民总产值计算。我国曾经设想用工农业净产值这个指标计量。国际上的净产值是扣除折旧后的国民总产值，与我们的净产值有很大差别。为了避免与国际通行方法的矛盾，应取消原拟议中的"净产值"指标。

折旧是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磨损，是资本的消费行为，是作为生产费用转移到商品中去的补偿。我国统计这笔费用时，把它当作预算外资金，并通过行政办法将其中一部分集中到主管部门统一使用，留给企业的也要受"规模"和"用途"控制。商品经济意义的折旧有两重意思：一承认折旧是新创财富的组成部分；二折旧是不参加按生产要素（包括国家税收）分配的特别财富，是维持社会"老本"的神圣费用。这笔财富是属于企业的。"老本"不是静态意义的"冻结技术""复制古董"，而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和市场指导下，不断更新陈旧过时的固定资产。技术进步和商品更新的节奏加快，要求折旧率也要随着提高，以改造和更新国民财富生产的基础和素质，使社会经济发展青春常在，充满活力。

税收是以企业和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净产值计征的。社会主义税收是对新创财富的必要的社会扣

除。税收与所得共存，无所得，就没有税收。存在企业与劳动者两级分配的情况下，税收也分企业税与个人所得税。企业税只对企业利润计征。作为生产要素分配的工资、分红、利息和租金所得，由各自另行纳税。

国民收入是国民净产值扣除企业税金、环保、技术开发、职工培训费、保险金、养老金及部分职工福利支出，再扣除企业利润（税后）、利息、租金，加上政府从税收等收入中支付给劳动者的失业补助金、养老金以及企业分给职工的“转移支付”。国民收入作上述调整后，等于个人收入。

个人可支配收入，是个人收入依法纳税后的剩余。

据以上内容，可建立如下指标体系模型：

国民总产值－折旧＝国民净产值；

国民净产值－企业所得税－其他社会扣除（地方税）＋国家对企业的转移支付（如补贴）＝国民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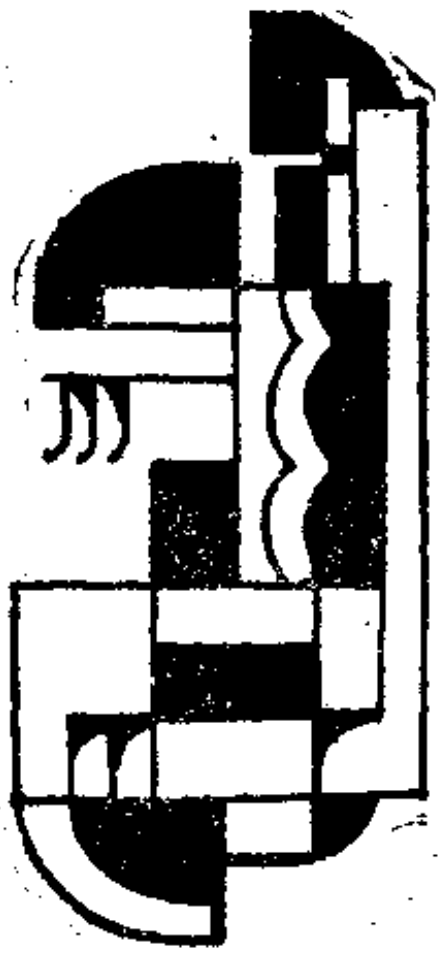
国民收入＝企业利润（税后）＋工资＋利息＋租金＋企业其他机动财力（摊入成本的某些费用补贴）；

个人收入＝工资＋政府转移支付（失业补助金、养老金等）＋企业转移支付（奖励、保险、补助等）；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收入－个人所得税；

个人可支配收入＝生活消费支出（商品零售额）＋储蓄（银行存款）＋开发性投资（集资、买股票、债券）。

按照这个模型，不仅要彻底改造国民经济统计体系，还要建立一整套与这个模型相适应的生产管理体制，流通体制，税制，金融体制，分配体制，投资体制等。更主要的是要在观念上改变单一主观计划观念，代之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观念。表面看来，统计只是数字工作，但产生数字的是整个庞大的活的经济机体，没有这个机体，统计工作便失去依据和基础。



第二部分
对国民产出的总需求分析

第一章 国民产出总需求的均衡

社会主义宏观控制的总任务，可以概括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单一的市场机制，在一定时期，可以自动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中国在往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市场力量也许仍然能够解决大部分经济问题。那种认为商品经济发展一定带有“盲目性”的观点是片面的。商品经济具有战胜自然经济和主观产品经济的自发性和有效性；价值规律具有克服僵化的官僚主义、激活生产力的威力。过去，行政控制经济的老一套，总的说是不成功的。现在有一些迷恋过去用权力控制经济的人，既没有认识市场的力量，又从来没有表现出比市场更有力量。要在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基础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用宏观

政策以补充市场的不足。只要我们善于学习，了解对国民产出的总需求规律，搞好宏观经济指导就可以少犯错误。

1．只有居民和企业情况下的均衡

研究复杂问题，往往先从简单问题着手。要研究国民产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问题，先把只包括居民和企业的假想体系作为考察对象，探讨此种简单情况下，国民产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规律。为了便于研究以下问题，假定：当产出变化时，价格水平保持不变（货币购买力不变）；经济体系不包括政府和外贸；只有居民储蓄，不计企业储蓄；居民只作生活消费，企业则利用居民储蓄和借贷作开发性消费（企业收入全部分配给居民）。

我们暂时避开到底是“需求自动创造供给”，还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样的辩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要维持国民总产值于一定水平，总是同时要维持与之相对应的总量需求。总需求减少，国民产出就要下降，总需求增加，国民产出就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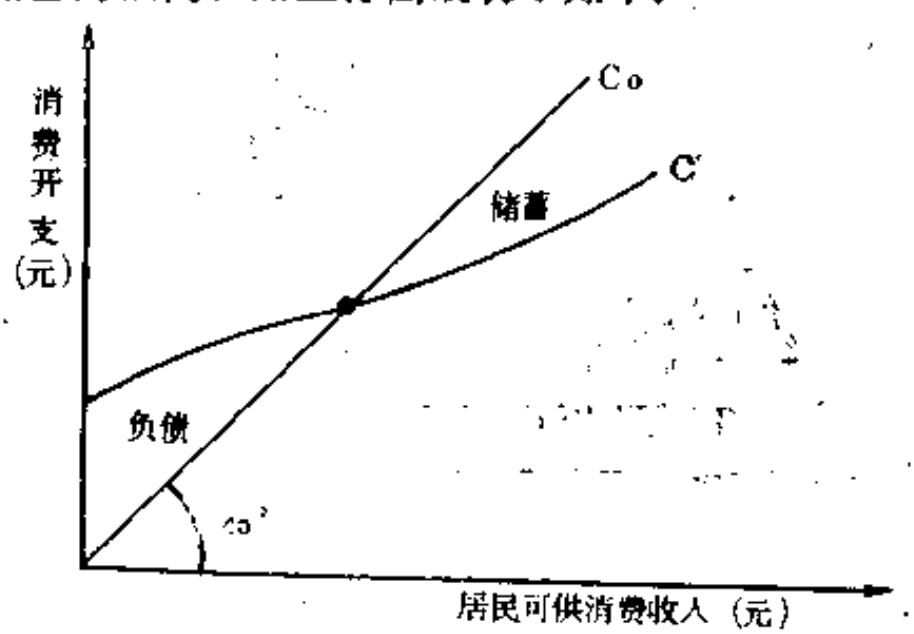
在简化体系中，总需求只包括居民的生活消费（C），居民储蓄(S)（资本消费—折旧被忽略）。

即　　$GNP = C + S$

居民在支配自己的收入时，并不是把额外（相对）收入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总是把其中一部分储蓄起来。凯恩斯研究居民对收入增量支配行为时，提出“边际消费倾向（MPC）（或边际储蓄倾向MPS）概念加以概括，这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了。

一、居民消费曲线（短期消费行为）

居民消费在不同收入水平下的行为是不同的。一般只在一个特定的点上，消费水平才与收入水平相等。居民在低于这一点水平的收入情况下，往往采取“赤字”消费，靠借债维持一定水平的消费；收入高于这一点的水平时，则出现节约消费、用于储蓄的倾向。用坐标曲线表示如下：



C_1为居民消费曲线。

Co是收支相等的比较线。

在C的不同点上，可以求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或储蓄占收入的比重），这叫做“平均消费倾向”（或平均储蓄倾向）。正是亿万居民的这种倾向，决定着国民消费总倾向。

二、国民消费讨论

国民消费曲线与居民消费曲线相似。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消费倾向并不会因为收入的增长而发生明显改变。（库兹涅茨发现美国按人口平均的消费倾向自1870年以来，并不因为实际收入增长几倍而发生变化。）有人认为这是消费随时间增加了新的内容和种类的结果。J·杜森伯里和早年的T·凡布伦认为，全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在居民消费竞争力量的作用下，使相对消费水平保持不变。F·莫迪利阿尼和A·安多认为，收入增加的同时，对未来的期望责任也同步增加，从而保持了原来的储蓄倾向。M·弗里德曼认为，居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可靠稳定收入，另一部分是暂时性收入。居民消费决策取决于前者。就国民总收入而言，在逐年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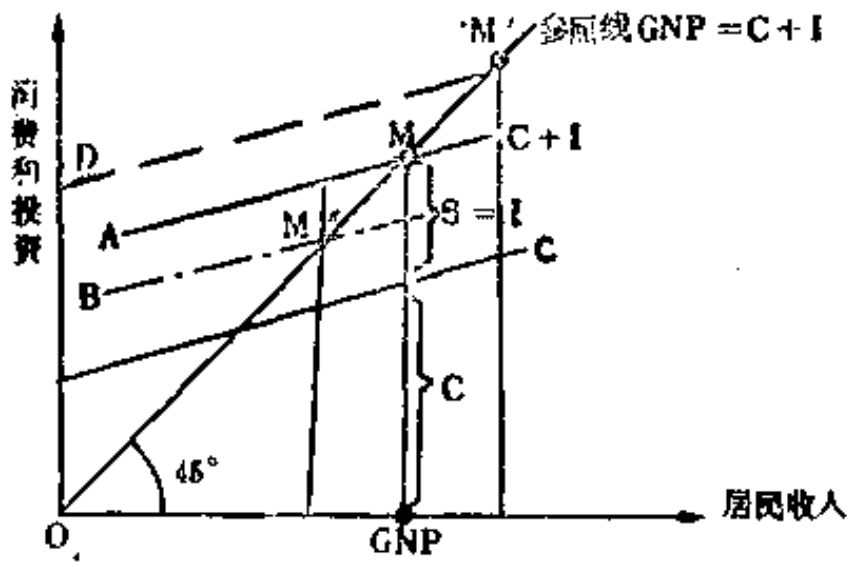
也随着同步增长，达到消费倾向的稳定。中国过去实行的是长期低工资政策，收入变化不大，消费倾向处在冻结状态，因此，产出也处于凝滞状态。现在，中央提出要改革工资制度，把职工工资同生产产出挂钩。可以预料，随着产出的增加，职工收入也会增加，消费支出跟着同步增加，形成消费促生产的良性循环。依我看，生活消费是发展生产的动力，产出的增加是预期消费增长的结果，两者保持同步是理所当然的。

三、只有居民和企业情况下的均衡

在这个体系中的国民总产值（GNP），只包括了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全部分配给居民），居民收入只用于消费和储蓄。从上面讨论中可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恒定的，在一系列不断增加收入的年序中，增加的收入用于储蓄也是一个恒定的比数。

当居民收入中用于储蓄的资金恰恰等于企业为扩大产出所进行的投资时，生活消费加上开发性消费与收入均衡。均衡以外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投资超过居民的储蓄，称作经济扩张运动；一种是投资小于居民的储蓄，称作经济收缩运动。均衡状态是这两种方向相反经济运动的分界点。用坐标曲线

表示如下：



A线是包括投资在内的总量需求曲线，投资（I）＝储蓄（S），使GNP＝C＋I，M点为经济均衡点，国民总产值保持不变。

B线I＜S，经济收缩，国民总产值下降。

D线I＞S，经济扩张，国民总产值上升。

总量需求曲线是在特定时刻，一系列不同居民总收入（等于产出）下对产出的总需求。

对A线而言，如果GNP增加，M′点落在A线以上，产出大于总量消费，产品积压，迫使企业减产，使产出退沿A线回到均衡点M；如果GNP减少，M″点落在A线下方，产出小于总需求，刺激企业增加供给，提高产出，恢复到均衡状态。

2. 税收对均衡的影响

对只有居民和企业的简化模型分析结果，为探讨现实经济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一块“粗琢的坯料”。只要一个侧面又一个侧面的雕琢，总是可以刻出一个接近实际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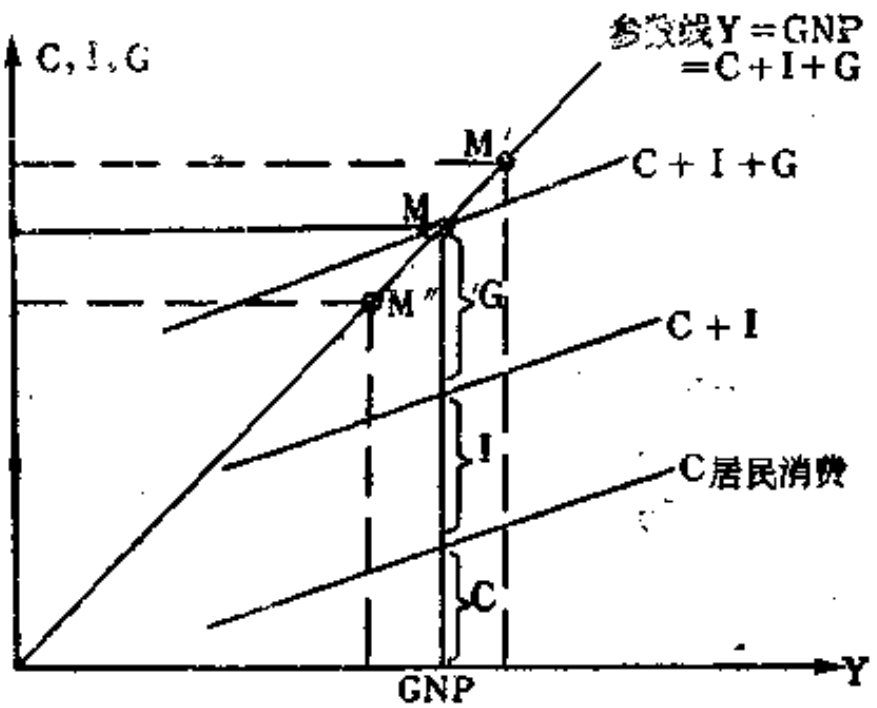
在只有居民和企业的情况下，把产出的一部分以纯税收的形式交给国家（国家返还或转移支付给居民的除外），国家则利用税收购买市场上的物品和劳务，其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诚然，国民总产值分配中多了纯税收这一项后，分给居民的可供支配的收入相应会减少。纯税收增加越多，可支配的收入就越少，也就是消费需求越下降。消费需求减少数量等于纯税收乘以纳税后的边际消费倾向。对消费曲线的影响，是平行向下移动所减少的消费量。

如果对国民总产值的总量需求处于均衡状态，GNP = 总量需求（Y）= 消费需求（C）+ 投资需求（I）+ 政府需求（G）。GNP = 居民消费（C）+ 居民储蓄（S）+ 政府纯税收（Tn）。

以上两式合并后得

$$I + G = S + Tn$$

即：投资与政府需求的和等于居民储蓄加政府纯税收时，经济便实现了均衡。如下图所示：



M为均衡点，在这一点上GNP=C+I+G。

同样，可以进行GNP变化的讨论：

总产出增加，M′在总需求曲线上方，总需求小于总产出，无法维持均衡，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减少产出，恢复平衡。总产出减少时，M″在总需求曲线下方，总需求大于总产出，引起产出增加，上升到平衡状态。

政府在纯税收和政府需求上的改变，都将影响总需求，最终影响国民总产值。增加税收，必然减少居民消费，使M点下移，GNP下降；减少政府支出（削减行政开支），也使M点下移，GNP下降。

政府因素加入简单体系后，经济运动已经失去了自然特性，越来越受制于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学正是建立在这个客观现实基础上的。

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常为适应经济变化的需要，调节税收政策和政府消费规模来调节总量需求，达到调节产出的目标。经常采用的是减税（或增加转移支付），以增加居民消费（C）；或增加政府支出（如拨款搞公共工程和增加国防开支），提高总需求，刺激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增加政府支出），对经济影响更为直接与有效。原因是减税的好处有一部分化为居民的储蓄，并没有全部转化为需求，而增加政府开支则全部转化成需求。

现实经济要比上述讨论的更复杂。西方经济经常为“巨额赤字”所袭扰。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作出增税和紧缩政府开支的政策调整，用降低经济发展速度的代价，去削平赤字。一旦赤字降为次要矛盾，经济停滞成为中心问题时，新的相应经济政策便被制定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计划性”，主要就表现在这里。决不是要国家去制定生产多少吨钢材、水泥、硫酸或饲养多少头猪这类产品计划。

税收除了影响总消费外，也对GNP产生影响。在固定的税率和税种情况下，GNP越高，国家税收也就越多；在GNP减少时，国家税收收入转移支付给居民的越多（失业补贴），纯税收也就减少。GNP增量中，只有在扣除纯税收后的剩余部分才转化成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加上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反映到总需求上的数量（经过税率与消费边际倾向两重折扣）已经削减了。

3. 外贸、折旧和企业利润留存对均衡的影响

外贸是影响现实经济均衡不可忽视的因素。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国策，净出口将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

包括净出口在内的总量需求 $= C + I + G + (X - M)$，

X——出口需求，M——进口需求，

$(X - M) > 0$ 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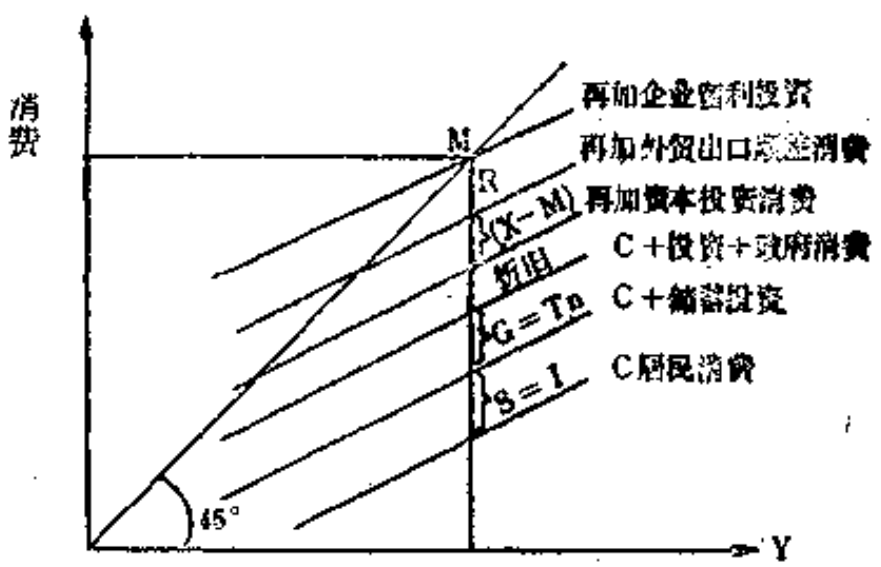
$(X - M) < 0$ 逆差。

折旧是从国民总产值中提出来的一项补偿性收入，又是资本消费费用，同样可以计入总收入与总

消费关系式内加以分析讨论。

企业参加利润分配是我国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特点。它是决定企业的活力、生存和发展命运的关键所在。留利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企业留利包括在国民总产值内，也是用于投资性消费的资金。

对折旧、企业留利、净出口收入消费的不足、均衡或过量，都会直接影响国民产出的下降、不变和增长。（如图示）



很明显，所有的收入全部被消费掉时，国民经济就实现了均衡。事实上，均衡只是一个特例，国民总产值总是在均衡状态上下运动着。大多数情况是需求不足影响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在于引导增加需求。具体地讲，要用好出口结余外汇，提高政府在财政收入范围内的消费（购买劳务进行公益性事业的开发），引导居民消费，用

好银行资金，用好企业折旧和留利，融通游资用于扩大消费和建设，必要时采用赤字策略刺激消费。在中央和各级政府不再包办开发性消费后，要及时调整税率，避免过多地把国民收入集中到国家手中，导致居民和企业消费能力下降，影响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后十五年，中国应采取低税收的休养生息财政政策，造成上虚下实的消费结构。企业富起来了，职工收入明显增长了，生活消费和开发性投资就会趋向活跃，中国的现有经济基础才会得到改造和提高，为下一世纪的经济腾飞打好基础。

4. 支出乘数及代数推导

真实的商品经济体系，对国民总产值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Cy）与下列三个因素密切相关：

1.边际消费可支配收入倾向（Cyd）。这种倾向不是任意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可以从对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统计数字中得到这个系数。

2.边际税率（ty）。是每一元国民总产值的变化的纯税收值。也是统计得到的数值，它与政府确定的税种、税率及转移支付政策有密切关系。

3.边际企业储蓄率（by）。经济实体的企业，

象居民那样，也有自己的边际消费（储蓄）倾向。这是商品经济的客观现象。通过对有关统计数据的分析，不难找到by这个系数。

乘数通式是：$\frac{1}{1-Cy}$

真实体系的自发支出乘数$\frac{1}{1-Cy}=\frac{1}{1-Cyd(1-ty-by)}$

Cy越大，乘数也越大，说明均衡国民总产值对自发支出变化的反应敏感，经济体系不稳定，起伏大。Cy越小，乘数也越小，均衡国民总产值对自发支出变化反应迟钝，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好。

$$Cy=Cyd(1-ty-by)$$

当ty不变时，by越大，Cy越小，对经济体系起稳定作用。

当by不变时，ty越大，Cy越小，可见税收对经济也有“稳定器”的作用。

第二章　税收、赤字与通货膨胀

现实的经济体系并不是如上一章后面讨论模型那样单纯，因此，前面所说的“现实体系”，实际只是更接近现实一些的约略模型。现实经济的税收、赤字与通货膨胀问题，同样在影响着经济的运行轨道。

1．税收的两种功能

我国正在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旨在建立一个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税制。由于对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缺乏充分的准备，以前过渡性的改革都保留了单一主观计划经济的残余。前面讨论已经触及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问题。为了把财政体制改

革搞得更好，有必要了解税收的两种功能。

税收的第一种功能是国家参加国民财富的分配。国家承担了商品生产经营者和全体居民的公共安全、秩序、福利的责任，还有执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能。实现这些职能的物质基础是税收。如果确认居民、企业可以执行开发性投资活动，国家税收就不应该包括生产、经营和开发性的费用。这一功能还说明：税收是以国民财富（国民净产值）为基础，国家（包括地方）对企业和职工进行分配。因此，税种主要应是“所得税”（而不是产品税）。税率也不是主观任意决定的，它取决于政府的任务、目标所对应的支出量，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得税率是多少，我国也应是多少。税率也要对不同收入水平体现差别，实行最低限以上的累进税率。生产经营者和财富所有者纳税，实际上是对安全、秩序、福利和劳务的购买，没有这些购买，企业和居民就不可能安居乐业。不过，这种购买是能者多劳，按所得的多少合理负担。新创财富是按生产因素进行第一次分配后，分别再由劳力、资金、土地、资本所有者按所得的分额纳税。对劳动者征所得税（累进），资金所有者征利息税，资本拥有者征利润税。这种以所得税为主要税种的税制，不必控制企业成本，也不限制工

资总额，更不必因市场供求和价格问题调整税率，是与商品经济相配套的简便易行的科学税制。在设计我国税制时，切切不可脱离商品经济这个巨大的事实，另搞一套别出心裁的税制。税率也不能太高，特别是在今后十五年内，要执行“休养生息”政策，生产因素可支配所得要达到80%左右。一个主要困难是：国家包办形成的固定资本所有权属于国家。如果国家以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参加财富分配（资本利润率），就不必再采用纳税的方式进入分配领域了。依我看，国家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并不妙。国家的存在，主要在于公共服务。陷在财产和利益圈内，就不可能是公正的。国家权力与企业利益连锁后，必然产生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把企业管死。倒不如进行一次性处理，无偿交给企业使用，国家只享有法学意义的所有权，向企业利润征税。这就是《决定》所说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税收的第二个功能是，政府通过改变税率和支出率调节总量需求，达到调节宏观经济的目的。这一功能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经济杠杆”功能。在乘数讨论时，已经将纯税收对均衡国民产值的影响作过分析。据P·艾尔博特对1948—1960年间的美国经济衰退和扩张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当前美国税收制度能够减少国民产出的下降约50%，减少扩

张约40%。凯恩斯提出的“相机行动”的财政政策，其要点是：为了增加产出，通过提高政府的消费或削减税收增加总量需求；生产过热或通货膨胀时，则通过削减政府预算或提高税率来降低总量需求。

2. 赤字

宏观经济调节在采用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政策时，有可能超出财力承受范围。这时，财政就出现出超的赤字现象。出超部分的需求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政府缺钱花，只好靠发行公债、国库券，把它卖给银行、保险公司、企业和居民，把一部分社会储蓄资金借过来，由国家支配。国家需求可以借钱，企业和居民的需求也要借钱，三只手都伸向资金市场。货币的供给少于需求时，货币价格就要上涨，利率就要提高，迫使一部分企业和居民退出需求（这现象称作“置换效应”）。国家借钱，就产生“公共债务”。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不同，它是挂账债务，用不着国家付款，只须由国家为买债券者付息。就是讲，国家只用很少的钱就可以调动大量的钱。即使是付息这部分的钱，政府也

只能靠提高税收来弥补。原意是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去影响总量需求，结果又不得不增加税收，产生“税收摩擦。”

单一的主观计划经济很忌讳“赤字”，讲的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把“财政平衡”看成是成功执行计划的标志，甚至把“收支大致平衡，略有节余”看成更大的成功。从商品经济角度看问题，赤字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也是政府、企业和居民经常采取的发展策略。要发展又缺乏资金就要借钱，借钱就是赤字。如果不想借钱，那就只好等到自己攒足了钱再发展了，结果是发展机会错过了，经济节奏放慢了，该办的事都无法办成。问题不在于赤字，而是通过“小赤字”创造“大盈余”，通过短期的赤字保持长期的发展，用很小的代价取得很大的报酬。怕“赤字”的观念与中国自然经济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怕欠债，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把盈余的钱借出去，以“窖金之富”自得其乐。从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原则看待财政结余、外汇结存，都是一种政策上的失败。我国守财型的财政观念在财政政策上有很深的烙印，与搞商品经济的开拓型财政观念格格不入。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不是宣传美国巨额赤字如何如何，而是改革旧观念，敢于借钱生钱，敢于打破消极平衡，以相

对的不平衡创造高水平的平衡。一个既定的经济体系，根据它的产出能力和增长水平，可以计算出一个合理的负债水平，只要不超出这一水平，赤字就不会成为一个经济问题。宏观管理的技巧，就在于控制这个“合理的限度”。

3. 工资、价格与通货膨胀

一、工资

当前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工资改革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说明工资对经济的影响，分如下几点讨论：

几个观念问题：商品经济理论认为，工资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在充满竞争的商品经济运动中，劳动力成为竞争的第一对象。如何实现稀缺的熟练和高技能、高知识的劳动力合理分配？一般情况下，谁愿意出好价格（包括生活待遇），就流向谁那里。提倡人才流动不解决价格差别问题，流动难以实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单是一个社会风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知识不值钱，叫社会如何凭空去

尊重知识？劳动力在这里是一个“生产力因素”，不是指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企业是劳动因素的组合体，是为商品生产经营服务的，而不是政治因素组合体为政治服务的。不适用的劳动力，企业有权拒绝使用，但企业不能剥夺这些人的社会的主人翁地位。商品生产费用中，包括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如果用活劳动价值这个概念描述工资的性质，和劳动力的价格是一致的。抽象劳动力是无法量度其效用和价值的，只有进入市场，由需求一方加以比较和衡量，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无论从哪一角度讨论，工资都应该是劳动力的价格。

工资不是企业和国家对职工的恩赐。工资是劳动力因素的成本，是为了产出的投入，与资本、土地、资源相结合，共同创造效用和财富。工资是作为这种联合劳动的劳动力因素的相应报酬，是通过投入劳动量、质、时间后的分配。

经济学中的价格只与供求关系有关。工资高低不是由国家和企业决定的，而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实现的。中国不熟练劳动力过剩，熟练劳力不足，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将压低前者的价格，抬高后者的价格。

企业厂长对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能任意确定，特别不能吝啬。精明的厂长会发现：工资的增加在

某一限度以前，对提高生产率、节约成本中的物化劳动创造的价值，不仅可以补偿工资的增长，还可以为企业创造新的财富。厂长会看到，光有好的设备、厂房、充足的动力和原料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相应素质的人，以很强的责任感、热情和创造性去推动资本进行商品生产。工资对企业而言是一项活的投资，是效益最高的最关键的投资。如果在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生产力因素上舍不得投资，就会给生产力造成灾难性的破坏。过去，我们一部分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是国际经济竞争一大优势。殊不知，由于低工资的工人不情愿努力劳动，造成资源、资本的大量浪费，创造的利润大大减少。与产出相比，尽管投入是少的，投入产出率还是大大下降，利润工资含量上升，劳动力形式上的低工资变成实质上的高工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为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生产率，如果不改变对工资的旧观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生产率就上不去。

从上面对需求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总需求主要部分是职工的工资（扣除储蓄）。低工资政策抑制了社会总需求，造成经济停滞不前的后果。

增加职工工资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体现。只要不是靠银行发票子发工资，工资的增加就不会对

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工资是从实现的价值中分配的，工资越多，表示市场上可供产品量也越多。目前许多人对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表现出严重的不安和忧虑，这是没有必要的。经济高速度增长是建立在高速增长总需求基础上的。退一万步而言，为了启动低效率的经济，在有较大的供给弹性基础上，采取赤字策略，借债发工资都是可取的。短期内工资高了，物价也会高，这是正常经济现象。需求—供给分析告诉我们，正是高价格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生产上去了，物价就会降下来，“轮番涨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二、关于企业工资的改革

劳动力参加新创财富的分配，过去所依据的原则是“按劳分配”。衡量“劳”的尺子是一把“橡皮尺”，长期以来一直为这个难题伤脑筋，始终也没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

企业愿意给职工多少工资，国家不必过问太多。只要有劳动市场的存在，给多给少由市场来决定。为了保证职工就业后能得到起码的收入，国家应仿照西方国家规定“道德工资限”，对不熟练新工人规定一个最低限工资标准（国家保护价）。

企业内部的分配，是企业自己的事。不管工资

水平如何，理应全部进入成本，由国家对职工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只对折旧办法作法律规定，不必对成本进行管制。目前试行的“百元工资含量”、“单位产品工资含量”、“利税工资率”等办法，对冲破“大锅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但这些办法还只是过渡性的，它必将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向市场决定工资的方向变化。市场包括国际市场。现在应该预见到这种变化趋势，并在税法、企业法、折旧法、社会救济法等方面做好准备，与之配套。

三、物价与工资

低工资政策必须有低物价管制与之相配套，社会才可能实现稳定。低物价管制表面上看好象管住了，实际上国家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产出，不得不从“暗道”给企业和生产经营者以补贴。因此，国民经济的低水平均衡，是靠低物价＋财政补贴才维持下来的。必须指出的是，财政补贴是脱离市场的转移支付，它并没有转化为社会需求，而是用来填补因低效率、低质量、低水平管理，高物耗、积压滞销等造成的亏空。这无异于是用国民财富购买浪费，鼓励浪费。“冻结价格，增加财政补贴”的政策，是与财政目标相悖的财政政策。

企业自立和物价放开以后，因价格不合理造成的财政暗贴，有相当一部分应该转入居民消费，以便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把增加需求的信息反馈到供给环节上去，促进生产发展。包括企业补贴、亏损补贴、农副产品价差补贴、煤炭亏损和补贴、房租补贴、外贸亏损补贴在内，总补贴支出约占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么大的一笔转移支付如能大部分转化为社会需求，在乘数原理作用下，仅此一项，就可以实现经济大幅度增长。这是当前宏观经济问题中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目前如何搞商品经济？把暗补改明贴就是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的飞跃。

工资能实现的购买力与物价水平关系极大。为了维持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在低工资情况下，引入“生活指数”指标，用以修正工资值是可行的。从长远看，这种修正削弱了价格对消费的调节作用，对市场发挥正常功能不利，不能成为长期稳定的政策。

四、工资与通货膨胀

工资水平是与就业水平相联系的。我们过去很少讨论“就业水平”这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忌讳“失业”这个词儿。宏观经济却无法回避这个问题。长期低工资政策，是与广就业相配套的。我

们对“就业”的理解仅仅是，进入工厂拿到一份与某级工资标准相当的报酬，或端上了铁饭碗。至于出勤不出力，上班没活干这类劳动力闲置，就不包括在就业水平之内了。就业主要是个经济问题。工厂没事干，就要辞退工人，企业是无力养活不干活（或没活干）的劳动力的。（在实行社会保险的国家中，失业工人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失业救济和补贴。）说企业是经济实体，光有辞退不守纪律工人的权力是不全面的，主要是要让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有辞退不称职、多余的劳动力的权力。这是在市场作用下，企业的应变反应，是对生产因素的正常调整，不进行这样的调整，企业就无法维持生存和发展。

工资性通货膨胀是出现在经济扩张时期。在旺盛的总需求刺激下，生产迅速扩展，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趋势（特别是熟练劳动力），导致工资上涨。劳动力费用的增加，引起生产费用的增加，物价跟着上涨。物价上涨的总根子在于生产率的增长低于工资增长，出现了工资的净增长。工资净增率与通货膨胀率是一致的。又因为工资净增率与高就业率是有内在联系的，因此有人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分别坐在翘翘板两端，此长彼消，两者不可兼顾。资本主义国

家，工资是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它敏感地影响着产品的价格，工资与价格之间缺乏弹性，上述结论是成立的。菲利浦斯根据对美国1950～1970年工资、价格和失业率统计资料分析，发现工资、物价变化趋势与失业率变化趋势相反，成相反曲线分布。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我国在近期，由于工资—价格尚有很大弹性，这个规律性还不会很明显。

货币发行量在影响货币实际购买力。通货膨胀是总价格水平上升。这是一个货币供应—需求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经济发达国家近来出现滞胀并存的令人疑惑不解的经济现象。这是因为工资上涨趋势并不因为经济停滞而同步改变。劳动者从来不愿意接受货币工资的下降政策，因此政府总是选择通货膨胀的办法，迫使工资贬值，减少工资的购买力，达到实质上的工资下降。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出现“滞胀”现象，说明凯恩斯理论的弱点，将引起经济学的新革命。我认为滞胀主要是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产物，其次与新技术革命的到来有内在联系。

4. 通货膨胀的后果

通货膨胀将引起国民财富的重新分配。其机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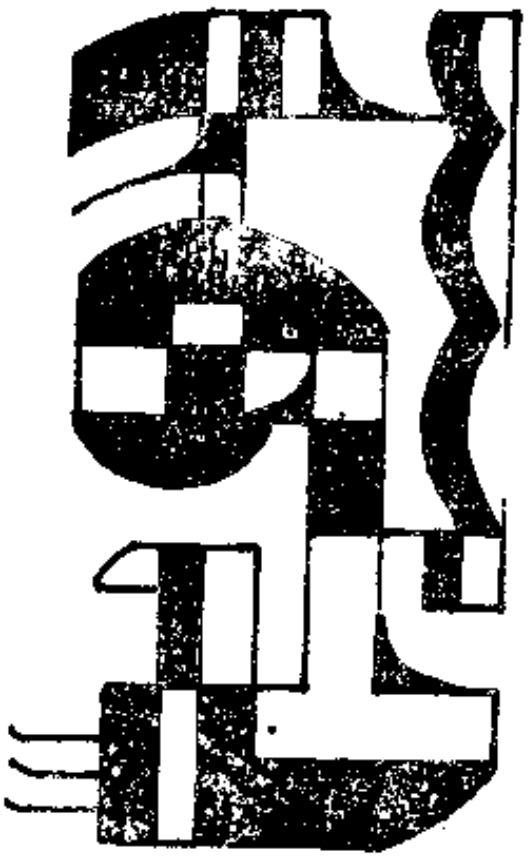
1. 有相对稳定收入的人，将降低有效收入水平；有较通货膨胀率更高收入增加的人，将提高有效收入水平。

2. 在充满债务的商品经济世界里，债权人的利益会因通货膨胀受到打击，而债务人则从债权人那里得到了与损失利益等量的利益，引起财富的转移。

通货膨胀的以上两个机制，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以现价计算的税收增加；大量举借公债的政府、借贷投资者得到了好处；购买国库券和各种债券的居民则受到了损失。食利者及固定收入的个人，也遭到通货膨胀之苦。特别是靠救济金过日子的失业工人，受害最深。政府在选择失业与通货膨胀时，往往更偏爱通货膨胀的原因就在于此。

我国今后也会出现与商品经济相伴随的通货膨胀现象。这是一个伤脑筋的不容易调节的经济难题。要认真研究西方国家对付通货膨胀的种种办

法，结合公有制的特点，制定有自己特色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第三部分
货币供给和需求

第一章
货币供给分析

1．货币及其功能

马克思对货币的产生、发展与功能做过深刻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过去，中国的货币只是在中国范围内具有某些（不完全的）货币功能。在产品经济体制下，指令计划凌驾在价值规律之上，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功能只在某些领域起作用，更多是起计划分配产品结算功能的作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功能，许多也蜕化成计划功能，离开价值范畴在起作用。又由于在理论上否认资金的时间价值，资金流通与储存功能也被抑制。尽管设立了许多银行，但银行是行政意义的管理机构，起管制和分配资金（按指令计划）的作用。直率地讲，过去

我们没有真正的银行。

只要能够起商品的交换媒介、价值尺度、价值支付储存作用的，被社会成员所接受的，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流动的东西，这种东西就称作货币。金属币、纸币是我们所熟悉的流通货币，但并不熟悉与商品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新的支票、信用卡这一类货币。经济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和个人现在都采用支票和信用卡这种形式的货币。它和纸币一样，通行无阻，又简便、安全和灵活，受到全社会的承认。美国有90%以上的支付是采取支票形式的货币。

货币的长期储存，影响了货币其他更重要功能的发挥。因此，把丧失完全流动性的定期存款，看作不完全的货币（准货币）。政府的短期债券在特定范围内可以兑换成通货，但不能直接进入流通，不能用于各种支付。债券可以进行市场自由交易，但那也只是债券与货币间的买卖。由于短期债券也不能完全流动，所以它也只能算作“准货币”。

具有完全流动性的货币，包括社会上所有手持现金和活期存款（以支票、信用卡形式流通）。社会可供给的货币量就是指这部分货币。定期存款和各种债券虽不算可供给货币，但它对货币支出有很大影响。

中医理论谈气与血的关系是："血为气母，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淤"。这种关系，也是商品与货币的关系。资金运动，推动商品运动，从而推动整个商品经济的运行。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也包括生产因素市场，都需要通过货币的运动去带动生产因素的流动。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使用权、劳务、信息等流动，都体现为资金的流动。因此货币可以组织新的生产力。经济机体的生命，是通过资金运动体现出来的。有人把银行比作心脏，把货币比作血液。银行在货币供给一需求力量的作用下，推动货币循环，维持经济机体的生命。

运动特性是货币的最本质特性。运动速度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快了，货币形态便从金属币变为纸币，再变为一张电子计算机能迅速识别和结算的卡片。货币越来越信息化了。比如：职工的收入，直接由企业通知银行，再由计算机系统把信号记在他的卡片上。拿上这张卡片，就可以购物，乘车，兑换货币，比带上一叠纸币或一袋金币方便、安全、准确、迅速。这是货币了不起的飞跃。这一飞跃大大增加了社会可供货币量，大大提高了社会经济运动效率。

2. 商业银行在供给货币中的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称从事货币供给业务的银行为商业银行。银行家是经营特殊商品——货币的商人（又称钱商）。经营的主要业务为寻找合适的货币需求者，把钱借给他，并从中得到利益。商业银行的“商业”内容就是这么来的。并不是说，商业银行只为商品经营者提供货币服务。

钱商从事的货币供应业务都是短期限的服务。前面说过的货币定义，就强调了“完全流动性”这一特点。商业银行吸收的货币，是民间的活期存款和支票货币（也经营大数额的可靠的准货币，以充实银行资产，加大信用和业务规模）。商业银行是靠给货币持有者付利息的代价买到货币短期使用权，从而创造新的货币供应能力。它把货币供应给可靠的借钱人，取得比存款利息高的放款利息，赚取好处。商业银行不是投资银行或公司债券、股票的认购者，一般不经营长期性的贷款业务。

商业银行的业务一般是这样进行的：比如有一位个体户准备从上海向湖南运销一批时装，手边缺这笔数额颇大的资金，怎么办？据市场行情，湖南

的上海时装销路和价格好，不仅能很快脱手，还可以获得40%的利润。这位个体户便向商业银行申请为期两个月的一笔贷款，贷款条件是年息高达15%，并要以全部所购货物作为贷款担保（抵押）。以便在借款人无力偿还本利时，银行把货处理成钱，免遭损失。此人得到这笔款后，搞成了这桩买卖，除偿还商业银行贷款外，还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银行也从中得到利益。商品经济类似这种短期借贷活动十分频繁，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更是如此。因此要允许根据银行规模、经营能力和资金市场的容量，设立多个商业银行。和商店一样，你卖我也卖，大家竞争，在竞争中选择，在竞争中平衡。银行是企业性质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不应该是国营一家垄断，要个体、集体、国家一起上。银行经营不善，就要破产倒闭，还要允许吞并和联合（但不容许垄断）。货币供应包括外汇在内，不是单纯的人民币经营。资金流动和商品一样是没有国界的，国际通行的美元、日元、港币、英镑、马克、法郎等，都要放开管制，进入流通。外国也可以到中国建立银行。只有这样，对外开放才可能真正实现，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站到世界的前列。

3. 商业银行的资产和债务

为了说明问题，以美国商业银行的资料为例。美国商业银行1977年总资产与负债构成如下：

一、资产　总计	100%
（一）准备金	4.06%
1.通 货	1.3%
2.在联邦储备银行存款	2.76%
（二）证券	27%
1.美国政府公债券	14.6%
2.州和地方政府公债券	11.7%
3.其他证券	0.7%
（三）贷款	68.94%
1.工、商、农业贷款	29%
2.房地产抵押贷款	17.1%
3.个人贷款	13.5%
4.其他贷款 5.其他资产	5.74%
二、负债和资本账	100%
（一）资本账	8.6%
（二）活期存款	26.1%
（三）定期存款	55%

（四）其他负债　　10.3%

资本账是属于银行进行经营的垫底自有财产。因为这个本钱占所有财产的比重较小，使经营风险比较大。如果放款项目没看准，占资产8.6%以上的项目资金无法回收，银行就要蚀本（债务超过资产），造成银行破产。

商业银行的“资产”是一个很深奥的经济概念。资产中的准备金占4%，其中可供日常周转的通货仅占资产额的1.3%。凭1.3%的现金支撑了98.7%的资产，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商品经济造就了银行这部微妙的机器，它凭资金运动特性和存款人对银行的信用，巧妙地在时间上运筹，在时间上榨出油水来。信用归根到底，是让存款人相信银行总是有足够的钱，可以保证随时兑现的“取款主动权”。在吃了定心丸后，存款者本身的偏好和支出特性，使得钱可以多留在银行一段时间，由银行加以使用。信用一方面靠国家储备银行大量硬通货储备，还有许多银行向该银行的存款。储备银行成了银行办的银行，虽然每个银行在其中的存款并不多，但总汇一起，却是殷富无比的，足以安定人们对在其成员银行中存款的信心。如果这种信心崩溃，存款人对银行丧失信用，就会出现存款人挤兑现象；大面积的挤兑，把相对分量很小的准备金兑

空后，银行周转资金告罄，造成大批银行破产。这种社会性的挤兑现象在历史上出现过，但却是罕见的。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政府也会采取强制性的非经济办法，抢救金融信用，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历史教训使银行更加注重“信用保险”措施。银行为此向政府购买短期公债券和流动性较强的其他有价证券。这些准货币有利息，又可以方便地出售变为通货，在储备银行外围又修筑了一道卫护信用的墙。有了足够的信用，就可以经营比本钱大得多的贷款业务。有信用，就可以开支票，就可以制造“通货”。因此，银行资产中，有相当大的一笔资产是依靠信用制造出来的。有人计算过，银行可以制造相当最低法定准备金5～10倍的资产。这并不是欺人的障眼术，也不是通货膨胀，是货币的时间和运动特性。在充满生机的经济体系中，少数现通货的高速度流通，本身就会成倍成几倍地增值。马克思说过，一元钱一年流通一次，其作用是一元钱，如果一年流通5～10次，就抵5～10元钱使用。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但在实际中被搅得很糊涂。最低法定准备金数也不是主观任意确定的，它是全社会经济运行节奏的客观反映。美国银行与英国银行，这个数就不一样。我国同样也存在客观的准备金临界值，这个值肯定要比美国高。

从资产结构中，可以看到商业银行也经营长期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长期贷款。这不是与商业银行业务不相称吗？不是的，这种长期贷款多是按月扣还的，是属延期付款办法。

当贷款归还银行时，通货又创造新的更多资产。当存款人提款时，减少的银行通货又几倍地收缩了与现金相对应的财产。

与银行资产相对应的是银行债务。一般是指银行吸收的存款，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我们习惯于传统的思考方法，认为“存”就一定向银行交多少钱，然后银行给存款者一张存折或提款单。在经济学中，现金和存折、提款单都称作通货，存款行为并没给银行增加可供应的通货。那又怎样理解银行债务？存款应体会作存款者把资金使用权让渡给银行。一旦这种让渡实现，资金本身就会在信用支持下，创造新的更多的存款，列入债务与相应的资产平衡起来。上面曾说过，商业银行业务主要是经营货币的，以吸收活期存款为主；而美国商业银行债务中，定期存款比重比活期高得多，怎么解释？这是因为商业银行资产中的证券与中长期贷款比重上升，美国居民储蓄行为的改变，定期储蓄增加，银行顺应这种变化，扩大定期储蓄以吸收更多资金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储蓄是影响有效需求的重

要行为，也影响投资与供给。货币供给是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相联系的经济运动，孤立考察货币运动是无法得出正确答案的。中国经济与美国有很大差别，要充分认识这种差别，才能恰如其分地发挥银行的作用。

4. 金融原则

如何把分散的资金融通，让其发挥最大的效用，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大问题。过去，我们采用行政办法，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居民把暂时不花的或将来才花的钱存到银行里，支援国家建设。现在在金融管理体制改革中，有的人主张发展个体、集体、地区、国家多种形式的金融企业，并提倡企业、国家（包括地方）发行债券、股票，用高利率和产品补偿办法吸引资金，开放股票交易市场，改革现行官办和一家办的金融体制。有的主张按经济区建立金融中心。究竟用何种金融原则指导这项工作？本节作如下探讨：

1. 金融的群体原则和社会原则：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化，资金市场的开放，决定了金融的群体原则和社会原则。金融单位可以是专业性的，也可

以是地区性的，但它们都不应该自成系统，而应该是一个有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彼此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和制约。它们需要自己的储备银行，需要城市的股票交易所和证券交换所，需要与保险、工商的横向联系，还少不了国家的行政支持。所有这些都不能想象当今的银行仍然可以保存远古的钱庄、当铺那样独占一方的古朴形态，金融社会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金融的群体性，是信用扩大的组织基础。

2．金融的竞争原则：金融单位是经营货币的商业性企业，直接根据资金市场的供求情况决定经营方针和策略。金融是丰利企业，很有吸引力，因此遇到的竞争也就很激烈。它们竞争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争取存款；二是比经营规模与效率。

竞争是推动金融体系演进的动力。

3．金融的自律原则：金融扩张和收缩有明显的自律性，象太阳黑子出现的周期一样。这是与居民、企业储蓄行为（心理偏好）相联系的复杂现象，总是会时隔不久交替出现存款热和取款热。

4．金融的寡头垄断倾向

金融的竞争原则导致兼并。金融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越是扩大规模，就越具有信用基础，就越能够承受风险。大企业渗透经济一切方面，在影响和组

织经济，成为非官方的经济管理机构。它的权威和力量影响着政府的重大决策；政府决策也要银行配合行动才能奏效。

5、金融的国际化：商品经济是世界性经济，金融市场也是世界性的。单一的国内资金市场是无法长期维持和存在下去的，活跃的市场力量将突破形形色色封锁，走向世界。

6、金融对财政的独立原则

过去，我们的银行是财政部门的附庸，变成财政的钱柜。因此，有人提出“综合财政”主张，把财政收支与银行存贷捆在一起。这是犯概念性错误的主张。财政的任务是为国家征集、分配收入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不受市场控制（但受市场影响）；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只听命于市场。财政可以作为一个储蓄户向银行存款，也可以把债券（公债）卖给银行，向银行借款。这些都是资金的买卖关系，是银行与存、借方的关系，不是行政的下属和服从关系。作为金融行政管理的政府机构——中央银行，也不能直接用行政办法干预银行的经营业务，只能通过制定中央贴现率，参加公开市场活动，控制货币投放量和吸收货币回笼等经济办法。通过金融法令去管理宏观金融活动。

7、贷款自主原则

银行会审慎地选择货币需求者，不必要谁为此规定什么。因为选择的失当，可能导致经营失败和破产，这种风险，迫使银行小心谨慎。过去，我们的一切贷款项目、贷款额度都是指令性计划，投资规模的调整，利率的决定，如何偿还，都听命政府。这种银行不是经济性质的企业。是企业，就必须有经营自主权。把款贷给谁，贷多少，贷款条件、利率这些都是银行业务范围内的事，应该由银行自己作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贴现率的变化影响银行经营方针。国家还要通过立法途径对银行实行法治。

第二章　国家储备、货币发行和回笼

银行的系统原则，主要是分散的储备引起的信用问题，要求银行结成一个群体，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货币的正常经营活动。国家储备是金融信用的物质基础。国家通过改变储备直接控制市场货币量和货币价格，影响经济运行。因此，国家储备是宏观控制系统的重要部分，是金融活动的中枢。要深刻理解货币运动规律，就要研究国家的储备问题。

1．储备系统的构想和控制机制

储备系统本来是行业组织，是为银行自己服务的机构。所以人们称储备系统是银行外的银行。随

着单一市场经济的瓦解，政府的宏观管理成为保持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宏观的货币管理职能与储备系统合二而一，成为政府政策的杠杆。这时银行自己的储备系统成了国家储备系统，这个系统叫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可以是一个国家设在首都的单一机构，也可以在不同经济中心分别设立几个分区管辖（美国在波士顿、纽约等十二个中心城市设有储备系统）。我国的中国人民总行可以改造成国家货币管理局，起国家储备系统的作用。国家货币管理局是代表国家握有货币调节杠杆的要害部门，除了要执行最高行政当局的金融政策而外，更主要的是要保持与全国各个银行的经济横向联系，能够及时了解货币供求的信息，有效地运用储备金这个手段来控制货币。为此，国家货币管理局必须具有更多的企业特性。管理局实行董事会领导体制，5～7人的董事会成员必须由人大通过，总理任命。为了保持金融独立自主的原则，少犯主观性的政策错误，对董事会成员实行任期制，每人10～14年，每两年期满一个，陆续更换。货币管理局下设高效率的信息系统和研究系统，对货币运动进行跟踪和预测，提出对策供货币管理最高当局决策参考。在商业银行资产中，政府公债券占的比重较大，政府债券公开买卖市场对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

应有重大影响。为此，国家货币管理局下设公债市场管委会，管制公债的供求运动。

国家货币管理局主要通过如下三个手段达到货币控制的目的：（一）在市场上出售或购买政府公债券；（二）对商业银行按规定贴现率（预支）出借准备金，办理贴现业务，通过改变贴现率达到调节商业银行准备金的目的；（三）通过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条件（准备金与存款额的法定比值），影响货币供给规模。前面说过，准备金条件与社会货币流通节奏有内在联系。小额贷款比较灵活，准备金条件要小些，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准备金条件呈分级累进增大。下表是美国1977年12月31日公布的商业银行准备金条件：

净活期存款（万美元）	准备金条件（%）
0～200	7
200～1000	9.5
1000～10000	11.75
10000～40000	12.75
40000～	16.25

准备金一部分是通货，一部分要无息地存入国家储备系统。

货币管理局经常采取的策略有：

1．“零”决策

如果商业银行准备金变化与所希望的货币运动趋势一致，国家储备系统可以不作任何反应，顺其自然，听任发展。

2．逆向决策

希望的货币运动方向和商业银行准备金变化方向相反，国家储备系统就要采取逆向决策，纠正错误的储备金变化趋势。

3．复合决策

先采用逆向决策纠正偏向，再从正常状态情况下，按预测的方向采取积极措施，主动影响下一步货币运动方向。

国家储备系统控制货币运动的机制如下：

证券市场管委会购买证券时，通货便从国家储备系统流入购买者手中，并存入商业银行，从而提高了银行的准备金，扩大货币供给规模；证券市场管委会出售证券时，通货便从社会流入国家储备系统，商业银行准备金随着降低，货币供给规模收缩。在这里，国家储备系统的行为，象开关一样灵巧地控制着货币的运动方向。

商业银行为了向国家储备系统借取准备金，把银行持有的债券转卖给储备系统，或以债券作抵押，储备系统以贴现率向银行贷款。商业银行在储

备系统规定的不同贴现率和借款条件下，或增加或减少准备金，达到控制货币运动的目的。国家储备系统提高贴现率，银根抽紧，传递出宏观反扩张政策信号，迫使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利率，通过商业银行把国家的宏观信号传输到社会的货币需求者那里。

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条件将敏感地改变银行经营规模。比如从20%→10%，营业规模（货币供给）将扩大一倍。这是一种人为的调节，是通过立法手段影响货币运动，因此，这种办法不能被经常采用。

2. 国家储备系统的资产与债务

美国国家储备系统资产与负债构成如下：（1977.12.31）

一、资产构成	100%
1.黄金券	8.5%
2.政府公债券	74.7%
3.贷款、贴现和预付	14.1%
4.其他资产	2.7%
二、负债和资本账	100%
1.联邦储备券	67.7%

2.商业银行存款	19.4%
3.其他存款	6.3%
4.其他负债	5%
5.资本账	1.6%

一、资产说明

1. 黄金券：这是历史货币的陈迹。美国在30年代初期以前，国库发行货币，要以黄金为储备依据，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成金币，金币也是通货。1933年以后，黄金退出了流通领域，由国家以黄金券从持有者手中购买，存入国库。黄金券是政府印制的有价证券，它实际只是国库交给金币交售者的收据。因为黄金不再是通货，黄金券也不再是通货，国家储备系统以联邦储备券购回黄金券，成为政府特殊债券留在国家储备系统的资产项内。这项资产无疑是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的。

2. 政府公债券：从资产构成上，本项比重最大。这是国家储备系统力量所在。这个力量通过证券市场的作用，成为控制货币运动的强大力量。国家储备系统经营联邦证券（主要是短期的），并不主要是为了赢利的目的，而在于体现货币政策。

3. 贷款、贴现和预付：这是商业银行的债务，是商业银行向国家储备系统借来的准备金，是储备

系统的财产。

是不是也可以提出国家储备系统存在一个“准备金”及“创造出来的财产”问题？这是一个有待探索的秘密。国家为了平衡总需求，经常在创造赤字和短期债券，而这些债券通过国家储备系统和商业银行转化成为需求和供给，经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希望”引导着向新水平迈进。市场创造了银行，银行又创造了储备系统，国家与储备系统终于联合起来了，宏观与市场联合起来了，于是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了。

二、负债与资本账

资产与负债相抵后的剩余，就是储备系统的资本账。一部分是系统本身在买卖债券和贷款中赚来的，一部分是商业银行无息缴付的准备金通货得到的好处。

负债中占绝对多数的债务是联邦储备券，这是储备系统自己发行的纸币通货，也是通货的主要形式。多数纸币通货保存在储备系统中，说明居民和商业银行已经更多使用活期存款的提款单和信用卡，而不是纸币。

债务中，有五分之一是商业银行的存款，这是一种支票存款，属于银行资产中的准备金部分。此

外，还有政府存款，外国政府及储备系统的存款，都算是国家储备系统的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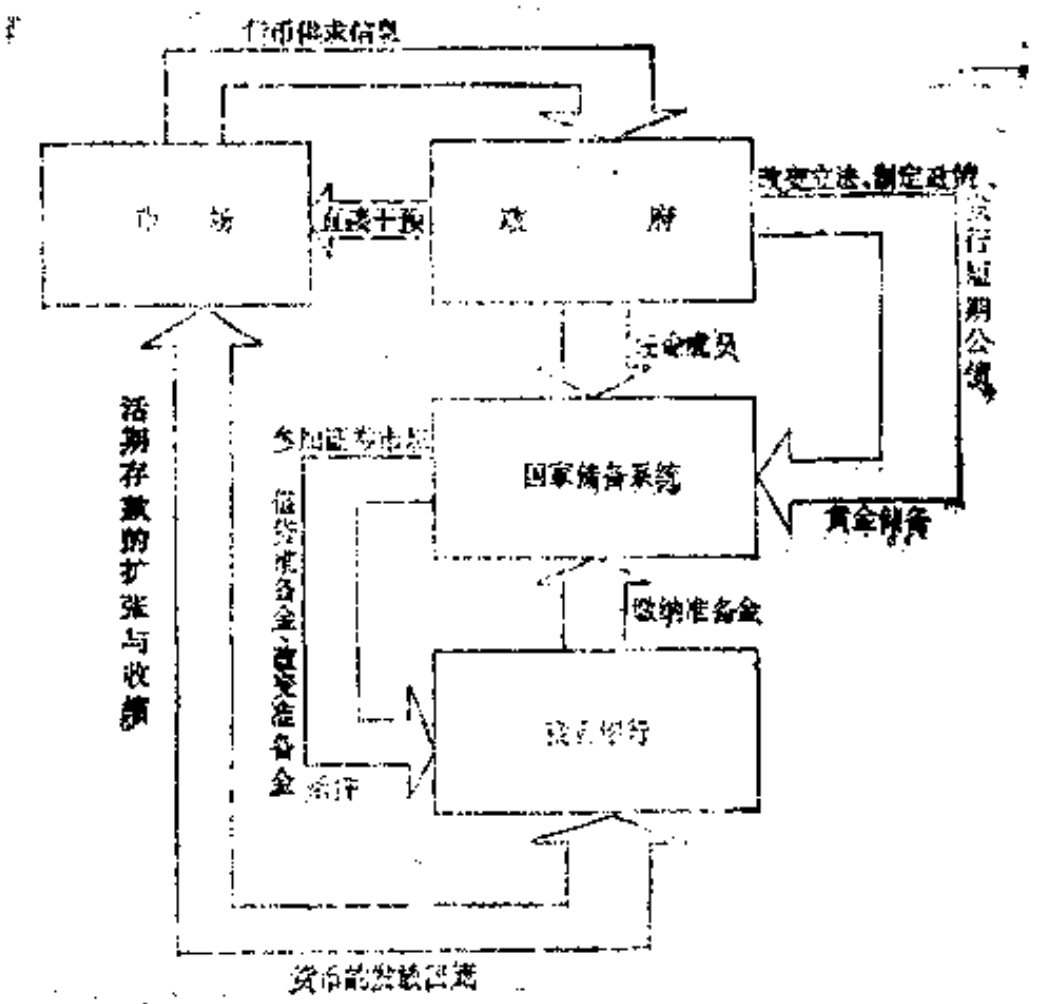
我国还不习惯于赤字预算，还不会娴熟地运用政府债务这个法宝。一方面苦于没有资金，一方面许多急于要办的事又办不成。每年发行的几十亿元国库券（长期），是用于财政平衡目的，不是一种自觉的货币政策。加上国库券不能进入市场（没有造成证券交易市场），丧失了流动性，把居民企业的通货转变成了非通货。象这种债券不仅对增加货币供应无益，而且有害。我们对金融工作不熟悉，对货币政策的运用，无论是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都是不具备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这一杠杆还是慎用为妙。明智可行的选择是改革金融体制，开放金融市场，建立国家储备系统，制定金融法律，商业银行企业化。只有在放开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宏观的货币运动控制。“控制”好比是驾驶机动车，只有在动力机发动起来处于运转状态时，才谈得上控制（驾驶）。我们现在遇到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制造（或恢复）一台性能良好的动力机，把它发动起来，运转起来。

3. 货币控制、发放与回笼

以上陆续将有关货币控制、发放与回笼的问题作了零星说明。货币运动的发端是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为了总需求的均衡，国家经常向储备系统以短期债券形式借钱花，制造了第一轮的货币供给。国家储备系统以债券为资产，建立“信用”，以准备金形式支持商业银行，为银行制造第二轮货币供给创造条件。货币控制中枢在国家储备系统。控制机制已在以前作过说明，不再重复。金融体系的“嘴”是商业银行，在国家储备体系这个中枢的指挥下，吞吐资金。“吐”即货币发放；“吞”即货币回笼。

以上过程可以用下图说明：

我们常用“国家发票子”和“提高商品价格、回笼货币”这些经济术语，其内涵是比较含混和费解的。国家一般不直接对市场发票子，但是我国过去的银行代表国家，银行发票子就等于国家发票子了。国家在货币上，只与国家储备系统打交道，越级无效。另外，票子是通货的一个条件，要变成具体用户的财产或债务。离开对货币供求的实际情



况，盲目印发钞票，那是信用膨胀性质的通货膨胀，货币币值下降，实际购买货物（或劳务）能力下降。这不是金融本身的正常运动。“提高商品价格回笼货币”这种提法也违反金融知识。过去，我们对物价、货币都看成计划的体现，而不是市场的体现。物价涨落是人为的，靠涨价回收货币是有效的。现在我们搞的是商品经济，物价是供求关系的标尺。不顾供求的价格，都要被市场机制纠正过来，都是无法实现的。另外，高价格吸收的通货是

留在工商业界的，虽然也会影响银行存款，但影响货币回笼的只能是资金市场对货币供求引起的利率变化。利率是货币的市场价格，它决定资金的吞吐。把商品价格看成资金价格是错误的。

第三章
货币需求、供给的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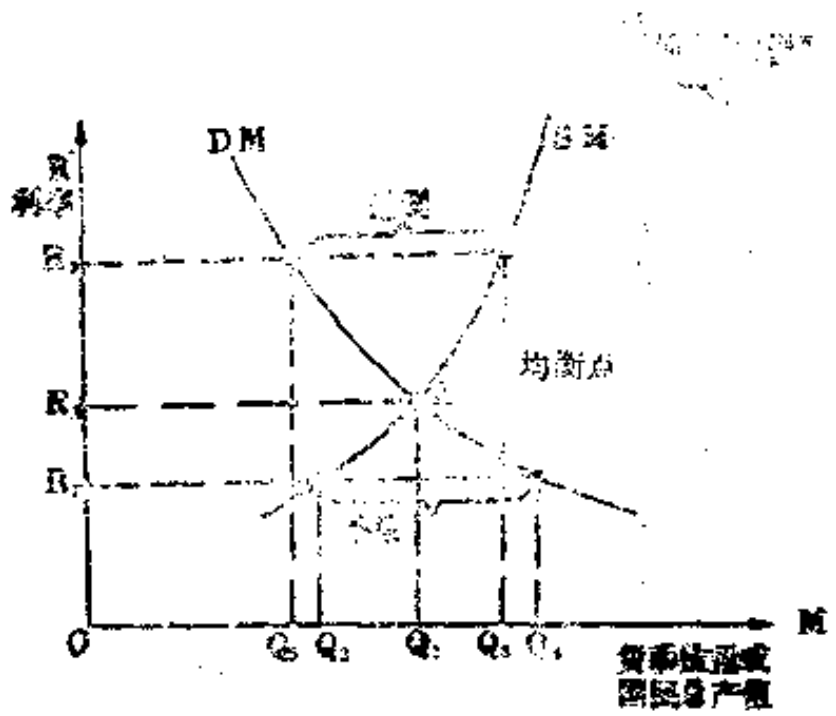
和对商品的需求一样，货币的需求是可以采用供给—需求分析方法加以研究的。货币在需求特性上，也是一种商品，可以用比较方法，节省我们的讨论篇幅。

1．货币的需求—供给分析

国民总产值增长时，分配给居民、企业、资金所有者的收入就要增加，社会对货币的总要求——表现为对现金和支票(信用卡)的需求。如果，国民产出不变，社会对货币需求增长，货币供应不足，货币供应价格——利率就要上涨。由于货币价格上涨，一方

面抑制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一方面对货币（所得）使用产生反馈作用，货币就从生活消费转向开发性消费，把钱用于生息更高的储蓄上去。相反，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下降，利率也随着下降，从而鼓励需求，达到均衡。人们对货币需求的行为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支配个人的财富。有的把钱当作购买生活消费品的交换手段；有的把钱作为未来要实现的购买力暂时储存起来；有的购置不动产和耐用消费品；有的购买企业股票，投资办厂。企业对收入的支配也有自己的行为。

把货币数量看作商品数量，把利率看作价格，可以采用第一篇第三章的供给－需求分析方法绘出货币供给与需求关系曲线：



曲线DM——表示一个纯粹竞争型的货币市场，在某时

刻的货币需求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在同一时刻都同样有效，但一个市场只能实现其中一个。需求变化时，曲线和位置将起变化。

曲线SM——对应DM的货币供给曲线，表示利率上升，供给货币量沿SM曲线增加。（不能讲供给变化，如果供给变化，曲线SM也将改变形状和位置。）

货币供给、需求均衡：当在同一坐标上绘出SM、DM曲线时，它们有一个交汇点，这一点上的利率与货币供给量达到均衡。在均衡点的利率下，货币供给者所供给的货币数量与货币需求者所需要的货币数量相等。只要需求与供给不变，这一点就不会改变。

当利率提高时（$R_1 \rightarrow R_3$），货币需求数量将沿DM下降（$Q_1 \rightarrow Q_5$）；在R_3利率下的货币供给数量沿SM增加（$Q_1 \rightarrow Q_3$），这两个相反的趋向造成了$Q_3 \sim Q_5$的货币过剩，导致利率下降，直到恢复均衡为止。供给和收回过剩货币的，一般是靠银行。

从均衡点A降低利率（$R_1 \rightarrow R_2$）时，货币需求数量增加（$Q_1 \rightarrow Q_4$），同时，货币供给数量下降（$Q_1 \rightarrow Q_2$），出现了货币供给数量不足现象（Q_{4-2}）。在需求刺激下，利率又逐渐回升到

R_1，达到均衡状态。

我国长期实行低的固定利率，对货币供求有什么影响呢？从坐标曲线上可知，利率长期冻结在均衡点以下时，一方面刺激了对货币的需求；一方面又抑制了货币的供给，供求双方脱节，形成资金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这种局面是脱离市场调节的结果。因为资金不足，国家一方面向企业多收以扩大供给，一方面企业拚命争投资争项目，得了“投资饥饿症”。国家为了公平分配投资，只好撒胡椒面，或按次序排队。摊子铺得宽，工期拖得长，大量资金被占用无法发挥作用，投入多，产出少，国民总产值增长慢，可供给资金减少，造成了恶性循环。由此可见，资金市场不开放，上述弊病是无法克服的。货币问题千头万绪，只要把市场放开，把利率放开，一切问题都会理顺和解决。

近年来，有些地方采取“优惠利率”、“差别利率”和“浮动利率”，以示扶持拳头产品、名牌产品、高效益产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措施的用心是好的。但资金市场不开放，这一套只不过是行政分配资金办法的变种，并不是市场意义的“浮动利率”。照理，效益好的企业借钱偿还能力强，敢于使用其他效益差的企业不敢用的高利率贷款，银行也乐意向这些企业贷款以获得更多利益；而我们

的做法恰恰相反，把低息优惠让给效益好的企业，办了一件“锦上添花”的多余好事。国家贴息贷款等于是无价格货币，是把这部分货币从市场中分离出来，成为由政府直接支配的特别资金，对货币流通并没有多少好处。政府不要直接参与金融活动，因为政经之间有很大排斥性和不相容性。政府的货币意愿，只有通过国家储备系统去影响商业银行，才能做到“如愿以偿”。

有的地方准备由财政部门建立地方投资银行，这种设想也是不恰当的。财政部门是地方聚财用财的行政管理部门，诚然有很多钱。有很多钱的不仅有国家财政，还有企业和个人。这些“钱”存入银行，钱的意义抽象成为财富拥有权和支配权在银行中的信号，使货币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调剂、流通。如果财政部门成立投资银行，这个银行成为部门专用银行，违反金融群体原则，会降低部门投资银行的信用，同时也削弱了全社会银行的信用，对货币流通十分不利。

2. 利　率

通货是流动的。现金的流动性最好，持有者支

配权最大，利率等于零。活期存款和支票也比较流动，但毕竟不象现金那样自由，未用部分的使用权是让给商业银行的，因此有较低的利率。短期存款向长期存款变化，流动性越来越差，支配权越来越小，利率越来越高。以上变化说明利率是银行购买货币流动性和使用权的价格。利息是货币财富的机会费用，又是借款人付给贷方的使用费用和成本。凯恩斯认为：利息是对不贮钱的报酬。

利率体系一般可按利率从低到高分几个层次：一层是国家储备系统向商业银行制定的贷款利率或贴现率；一层是政府短期库券、票据利率；一层是长期政府债券利率；一层是信用程度低、风险大的公司债券利率；一层是抵押贷款（如住宅购买）利率；一层是银行贷款利率。

银行发放贷款除了以流动程度决定利率而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贷款风险度越大，利率越高。风险度表示贷款有一定程度会丧失，在边际决策时，为了不至亏本，把利率提高，作为预防性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利息是风险成本。一般新兴的利用科技成果开发的产业，成功率不高，一旦成功，获利也是大的。对新兴产业的投资，称风险资本，利率也高。

3. 投资需求和投资效果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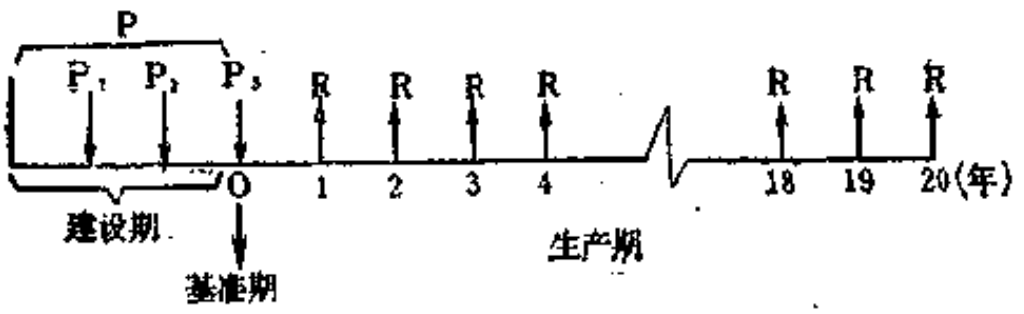
前面一直采用“开发性消费”这个词代替投资。投资可以看成供给能力的扩张，为了增加盈利。即使不是直接盈利，也一定会有间接盈利。因此，在评价投资效果时，除作企业财务评价外，还要作社会效果评价。我们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包括了使用折旧费搞技术改造部分，它既包括了原来磨损了的固定资产补偿，也赋予了新的开发意义（不是复制古董）。

工程经济中，对企业的投资效果评价（财务）指标主要是：投资收益率，投资回收期，项目在经济寿命期中的净现值收益。银行在估量借钱一方的信用程度和贷款好处时，主要是考虑以上指标。

1. 投资收益率（ROI）

假设某项目的总投资为P，它在建设期内按计划分别使用一个数额的贷款。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都有收益R（假设不变），如果项目经济寿命期为20年，可绘成投入产出时轴分布图如下：

对基准年而言，如果找到一个这样的利率：把20年的收益R，贴现到基准年后的现值总和（P_0C_0



F_0法）等于总投资，这个利率就称项目的投资收益率。设投资收益率为i，可建立如下关系：

$$P = R\frac{(i+1)^n-1}{(i+1)^n \cdot i}$$

$$n = 20$$

$$\frac{P}{R} = K = \frac{(i+1)^{20}-1}{(i+1)^{20} \cdot i}$$

可通过对上式的试算，用内插法求得i值。

实际情况要比这个例子复杂得多，投入产出分布情况也远非如此。贷款使用计划，贷款偿还计划，建设期长短，生产期长短，折旧政策，残值处理等都要影响投资收益率。有了投资收益率，还要对它进行衡量，而衡量标准往往用社会（或行业平均）基准收益率，或预计的资金利率。当一个项目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贷款利率时，产出小于投入，贷款将无法收回，并随着时间流逝负债越来越重；投资收益率等于贷款利率时，这笔投资如同存在银行里一样，对项目而言，则是不亏也不赚，白辛苦；投资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时，项目产出除还清贷款本息外，还可以额外赚一笔钱，投资收益率越高的项

目，竞争也越激烈，项目风险也就越大，投资者往往要采用比贷款利率高得多的风险收益率来评价项目投益效果。影响投资成败的因素很多，许多因素是无法计量的。因此，在工程经济上有一套对“不确定因素”分析方法和敏感度分析方法，用来处理投资活动中的复杂情况。

2．投资回收年限

工程经济经常把债务和偿还能力列成“财务报表”格式，从投产年开始，把逐年未还的投资（包括利息）用逐年的收益（包括利润、折旧）抵偿，一直到偿清本息为止的那一年，称投资回收年限（不是负债年限，负债年限包括建设年限在内）。项目投资收益率越高，偿还期就越短；相反则偿还期拖长，甚至永远无法偿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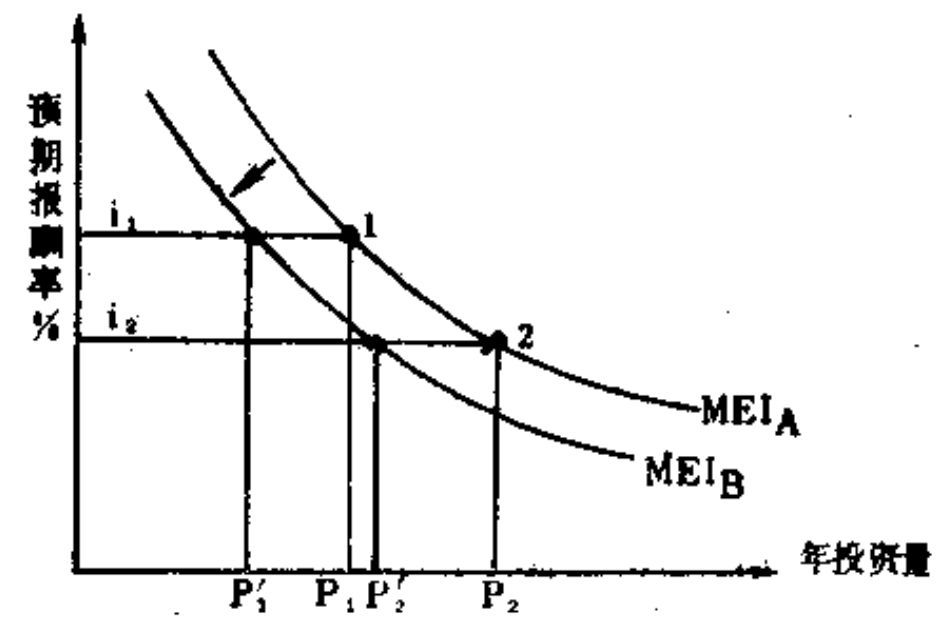
3．净现值收益：为了求得项目的净收益，必须有一个“基准折现率”。“基准”对不同评价并不一样。对投资者而言，基准折现率包括抵偿贷款利率，股东分红，风险因素在内。以投资开始年为零点，把投资负债当负值，按贷款利率贴现；经济寿命期内各年收益（正值）按基准折现率折现（对零点年贴现），把零点年的正负值相加得到的数值，就是这个项目的净现值（NPV）收益。NPV越大，项目经济效益越好。以上评价指标是项目信用，是

银行贷款的重要依据。

投资效果的社会评价，牵涉到影子价格、环境质量及间接收益等问题，这里不作探讨。

投资者的资金主要是企业折旧和利润留存。之所以用贷款来描述资金来源，是因为这部分企业储蓄一般存在银行，与银行利率有紧密联系。

对全社会而言，投资需求与利率间的关系同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曲线相似。利率高则投资收缩，利率低则投资扩张。投资需求曲线和边际投资效率曲线是一致的（把纵坐标的利率改为投资预期报酬率）。见下图：（边际投资效率是指每增加一元钱投资所获得的报酬或收益，它是社会总投资收益率。）



从全社会投资总量的边际投资效率曲线MEI_A

走向可知，如果年投资量从$P_1 \rightarrow P_2$，投资预期报酬率从i_1降为i_2，这是产业竞争造成平均利润率下降原理起作用。在经济收缩时期，MFI_A将下降至MEI_D，在同样预期报酬率变化情况下（$i_1 \rightarrow i_2$），投资也将收缩（$P_1 \rightarrow P'_1$）。

如果考虑货币币值问题就会发现，在通货膨胀情况下，折实（用价格指数）投资将下降，造成预期报酬率的虚假上升。这种假象也会刺激投资扩张，造成实际预期报酬率的下降。

国民总产值的变化引起对货币需求的变化；投资变化又是总量需求变化的重要原因，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是总量需求变化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他们对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并不敏感（货币需求曲线陡）。由于投资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边际投资效率曲线平坦），因此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运动始于货币供给的小量增加，这个增量强烈影响利率下降，利率下降又敏感地影响投资，提高总需求。他们这些分析导致的结论是：国家宏观控制最有力杠杆不是宏观的财政政策，而是货币政策。只要控制货币的供给，就可以解决赤字与通货膨胀难

题。有些国家曾经采用货币主义者的理论，劝说公众相信货币控制能够解决问题。实践证明，单纯货币政策并非想象的那么灵。但是，应该承认，货币主义者在货币问题上补充了凯恩斯理论的不足，把货币政策看成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更接近现实地处理复杂问题。

4. 货币数量的探讨

货币形态的运动，好象使货币数量的探讨变成多余。但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按纸币数量估量价格的观念并没有改变。老一辈经济学家十分密切注视“货币发行量”这个可怕的幽灵，唯恐会导致中国的通货膨胀提前到来。因此，有必要对货币数量问题作新的探讨。

货币数量与国民总产出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与价格水平成正比。

设：货币数量为M，货币流通速度V，国民产出为Y，价格水平（指数）为K；

那么，$M = G\frac{K \cdot Y}{V}$　　G为换算常数。

随着经济发展节奏的加快，V也在加大，M有

下降趋势。Y与K都呈增长趋势；Y增长越大，M也越多，K越大，M也越大。V以年计量的变化率不明显（与经济扩张或收缩也有关系），于是，货币数量主要决定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和价格指数的大小。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广大农村从自给性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自产自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进入了市场，农村为此一下子吸收了大量货币；另一个是经济与价值同时增长，又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如果考虑近几年投入的开发性资金量，货币数量必然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支票、信用卡这种通货形式还不多的情况下，只有“印钞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印少了，经济过程就会中断；印多了，银行发不出去（没有国民产出和债务为依据的货币是无法进入流通的）。只要社会需要，发多少票子都是正常的，用不着为此提心吊胆。人们往往担心发票子多了，会引起物价上涨，币值下降，这也是一种误会。价格是供需的单值函数，与货币数量是时序先后的关系，先有价格变化，再有货币数量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货币是为了计算价格、体现价格和实现价格的后续概念，国民总产值是以货币计量物质总数的。

5. 收入—货币综合分析

货币主义者的功绩在于补充了凯恩斯和后凯恩斯学说中的均衡国民总产值的理论。以前，均衡国民总产值是由储蓄和投资决定的。弗里德曼认为，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可以控制利率，从而影响投资需求。投资本身是总量需 求的重 要组成 部分。因此，货币控制将间接影响总量需求和国民总产值的均衡。

在国民总产值与价格的均衡体系中，是二维平面坐标系；如果把利率作为另一维引入价格—产出体系，将出现三维空间坐标，使分析复杂化。为此，我们分别讨论后再综合分析。三元体系的均衡必须满足两个均衡条件：

1．商品市场均衡：总量需求必须等于国民总产值。即$S + Sb + (Tn - G) = I + (X - M)$

这个均衡的实质是储蓄与投资的均衡。

2．货币市场的均衡：货币需求与现存货币量的均衡。

$$L =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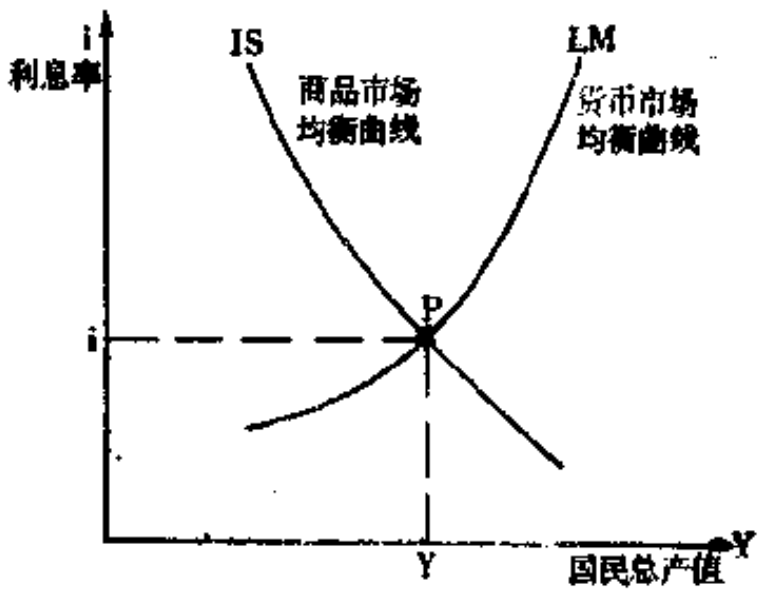
第一个均衡中，投资需求与储蓄共处一体。如

果这个体系引入利率i，i低时，投产就扩张，从I＝S条件可知，I增加，S也同步增加。储蓄是来自国民总产值的分配。所以S增加，国民总产值也就增加。利率—投资—储蓄--国民总产值一条链就连在一起了。原来商品市场的均衡曲线图，只要把纵坐标由价格改为利率，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商品市场的i—Y均衡（利率—国民总产值）体系；利率越高，国民总产值越小；利率越低，国民总产值越大。

第二个均衡，货币需求（L）与现存货币量（M）共处一体。利率决定货币需求，货币需求与现存货币量均衡。持有货币量决定于国民总产值。这又是一个链条：利率→货币需求→现存货币量→国民总产值。建立起的货币市场均衡i－Y体系，是一个上升曲线。即货币需求上升时，i上升，Y也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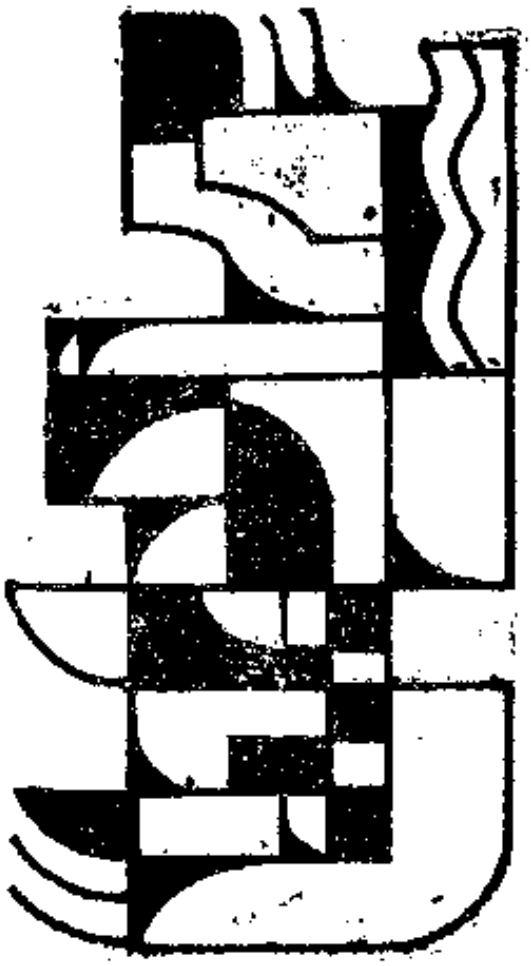
把上述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总均衡条件如下图：

同时符合两个市场均衡条件的，只有交点P，这一点的i与Y，是综合系统的总均衡的利率和国民总产值。当商品市场或货币市场起变化时，综合均衡点就要移动。如果总需求增加（LM不变），IS线右移，P点沿LM上升，i、Y也随着上升；如果货币供给增加（IS不变），LM线右移，P点沿IS下



降，i下降，Y增加。

这一分析走向极端，就是货币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IS线是平坦的，LM是陡直的。IS上移（总需求增加），对Y不产生什么影响；LM右移时，i只有很小的变动，而国民总产值则大幅度上升。因此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力。



第四部分
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章 国民经济行为分析

不同规模的经济体系，如企业、市、经济区和国民经济全局，都有自己特有的行为。研究国民经济行为，寻找其规律性的东西，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是有帮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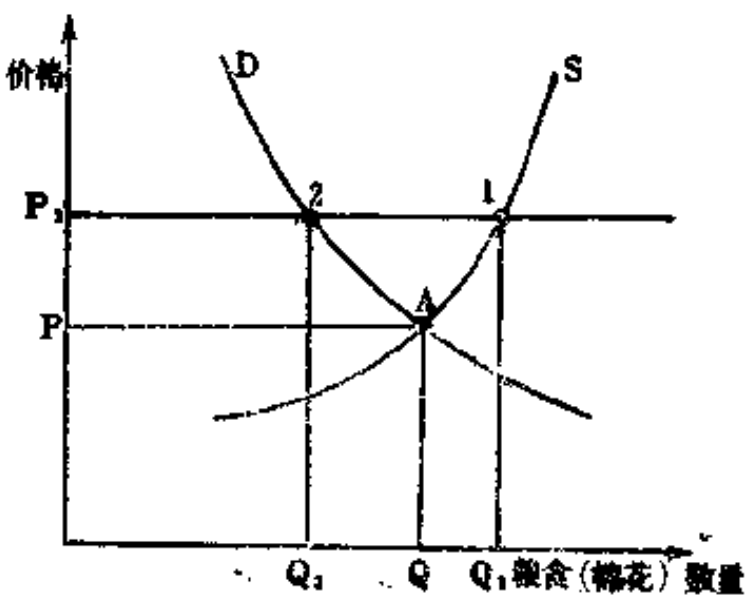
1. 供给过剩

供给过剩包括劳动力、产品、资金等供给大于需求现象。这是国民经济经常出现的行为。比如全国性的粮食、棉花过剩，有些省煤炭过剩。相对过去什么都匮乏的情况，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怪事。经济学从供给一方而言，说什么东西少了，就是说什么东西贵了；说什么东西多了，就是什么东西贱

了。本来这是一个普通常识，中国古语从需求一方而言："物以稀为贵"。

粮食、棉花多了，这是明摆着的事。但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相对过剩"、"暂时过剩"，只要加强转化，多发展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和养殖业，粮食不仅不会多，而且还可能不够。

上述观点貌似正确，但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有明显错误。下图是粮食（或棉花）的供给需求曲线：



由于国家对粮食规定的统购价P_1比市价（均衡价）高，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从Q增加到Q_1；同时又抑制了对粮食的需求，使需求沿D线收缩到Q_2；对全国市场1984年而言，粮食共过剩Q_1-Q_2。这种过剩是绝对过剩，是与价格相关联的经济性过剩。过剩是不是暂时的，并不涉及转化与

否，只决定于价格。如果在价格政策上，不仅不降价（为了保证农民收入不下降），而且还要提价，势必扩大过剩趋势，农民将生产更多的粮食，消费者将更减少消费。多的粮食只好由国家花钱压在仓库里，占用大量资金。能不能动员人民多吃些“爱国粮”呢？消费行为是经济行为，对收入如何安排？多少钱用来买粮，多少钱用来做衣服，多少钱储蓄是有一个严格的边际选择的。多吃粮就要少吃肉或少穿少玩。如何抉择，决定于价格。粮食贵了，菜便宜，就少吃粮，多吃菜。从经济意义上说，粮食过剩是不能用政治办法调节的。过剩出现后，第一件事就是老老实实承认过剩；第二，只能从价格上打主意才有效（国家财政支出收购，是双重价格问题）。就是说，粮食要从过剩变为不过剩，只有降价这条路可走，要一直降到上图A点为止。“转化”是一个粮食增值过程，是过剩以后的供给问题，与本命题无关。可以断言，农村粮食价格放开后，是下降的趋势，决不会上升（有一个严格的前提条件是：要彻底开放粮食市场），农民从粮食中的收入会下降。这种变化，将引起供给与需求双方的变化，粮食减产，消费增加，价格回升。

一般说对付过剩的政策有四个：一、销毁多余粮食，保持市价；二、紧缩供给，限产压产，让

土地休耕；三、继续由国家收购全部剩余的粮食；四、放开价格，让市场调节供求关系。与其让农民辛辛苦苦把粮食种出来，卖不出去，倒不如让土地休耕；与其由国家收购存在库里，倒不如付之一炬（用于救济等用途另作别论），还免得增加保管费用。国家补贴歪曲了粮食供求信息，阻抑了市场机制对供求的调节，农民在国家错误信号下，不仅不减少粮食生产，反而增加生产。如此下去，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直到累垮为止。毫无疑问，放开价格会造成粮农收入的下降，正是由于这种下降，才会迫使粮农作出选择：少种粮食，多种市场需要的其他作物，就会退田还湖，退耕还林、还草，就会使更多的农业劳力从种粮食中转移出来，兴办工商业、建筑业、矿业、运输业、服务业。这就是喊了多年没有解决的“农业结构合理化”，将在放开价格以后，依靠市场力量自动调节，趋向合理。可以预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变以后，农民收入将很快从下降的谷底中走出来，实现新的增长。农民种粮食的收入下降，可以通过政府向农民购买劳务的办法，向农民转移支付一部分财富，既兴办了公共工程（如水库、运河或公路），又增加了农民收入。这种政策（即使是赤字支出）将促进农业结构顺利转变。所有这些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好政策，都

在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体现，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最好的宏观经济决策之一。

2.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周期（危机）规律，其实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具有商品经济的一切特性，也具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和商品的市场生命曲线一样，整个商品经济也有自己的发展曲线：发展扩张期——稳定期——下降收缩期——下一个周期开始。这种波动的根源在于总需求的波动，特别是自发性的开发消费波动。这得追寻到投资的起点考察：一个投资高潮往往是科技成果转入新产业，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上升时期，开发这类产品有市场，有利可图，吸引投资者竞相投资，形成高潮。由于每一项投入都具有经济寿命期，其曲线与产品市场生命曲线一致。赚钱产业投资得多，竞争激烈，价格下跌，导致投资收益率下降，改变了投资者对资本边际收益的预期，使投资减速直至收缩。投资变化是经济变化的寒暑表，投资的周期性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那

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不能削平这种波动？计划无论多么高明，也不可能改变产品开发、市场寿命的周期性。产品的销售波动很快就反馈给投资，并放大了投资的波动（即所谓的加速原理）；当产品在市场出现滞销和积压时，投资将作出“绝对下降”反应。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周期性。

3. 经济系统的可控性

对一个有机的经济系统而言，系统内部在广义价格信号作用下，能够调节微观运动。在系统外部存在一个国家的调控机构，能够依据系统信号作出宏观判断，按宏观目标的需要，向系统回授新的控制信号，在系统固有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控制。这种系统就叫可控系统。商品经济是一个经济有机系统，系统在市场机制下，依靠价格信号进行微调，这个过程是连续自动和精确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国家通过统计信息系统对市场活动进行跟踪，及时地把价格、利息、总需求、总供给等各种信息反馈给经济决策机构，作出相应反应。通过国家储备系统，税收财政系统，物价管理系统，把控制信号转

译成经济语言，转达给市场，达到控制经济运行的目的。正因为经济系统具有的可控性，才有“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我们常用的“运用经济杠杆”这个词儿，就是宏观控制的形象表达。如果经济系统不可控，杠杆就撬不动。正因为经济系统是可控的，对杠杆的使用就要十分审慎。握有杠杆力端的国家综合经济部门，用很小的力，就可以撬动整整一个系统的经济。一旦用力不当，或作用端偏离了方向，就要造成巨大损失。计划调节是经济管理中最难、最高级的管理技术。没有一个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崭新的宏观调节体系，没有具有这方面才能的人，是无法进行有效宏观控制的。在目前条件下，乱调节倒不如不调节。因为市场调节的力量要比主观盲目的力量强大得多。只有当宏观调节能够补充市场调节的不足时，这种宏观调节才真正有益和有意义。这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来了：“指令性计划”不是一种调节力量，而是一种以权力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强迫经济离开价值规律轨道的粗暴方式，对经济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政治、军事及非经济目标的需要另作别论）。

4. 国民总产值的预测

国民总产值是可以预测的。直接从产出一端预测比较困难。在旧计划体制下，各企业的生产严格按指令进行，各行业、各主要产品以及一切生产因素，都在控制之列，只要计划控制系统健全，国家总产值是容易预测的。简单的强度法、外延法、系数修正法就可以在年初对年终进行准确计算。搞商品经济，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经常照市场需要修正生产计划，产出这一头已经无法采用老办法预测了。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是从总需求计算国民总产值的。只要对总需求的各因素进行预测，就可以预测国民总产值。当然，总需求的每一因素都不是孤立的，要预测一个因素，总是涉及其他因素。为此，研究消费行为的延续性，是很重要的。另外，“分离体”研究方法是处理复杂问题最常用的方法。即把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企业的投资，进出口等因素，从相互关联的体系中分离出来，分别加以预测，然后再进行综合处理。

政府开支有国家预算作依据，考虑在执行中可

能遇到的变化灵活加以修正，就可以做到相当准确。企业投资一般都预作了前期准备，投资倾向也比较容易预测。进出口作准确预计是很难的。从统计数字分析，利用前一期的惯性，可预测本期，但准确度与预测者的经验有很大关系。居民消费可以从消费行为的延续性中加以预测。完成每一个消费因素预测后，国民总产值预测值就可以计算出来了。它是：

$$Y=C+I+G+(X-M)$$

如果C是未知数，据统计资料可以找出平均消费（可支配收）倾向和国民总产值平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以上两个比例是在长期内比较稳定的），就可以求出Y与C的关系，代入Y式即可。

预测虽然可以用数学方法，但其准确度决定于采用的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好的方法对错误和不准确的数据是无能为力的。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专家对经济的预测，可能各不一样。下面可以采用“化不确定为确定数值”方法加以处理。如，专家们对国民总产值预测估值，上限估值为a，下限估值为c、中限估值为b，最可能的预测值（K）为，

$$K=\frac{a+4b+c}{6}$$

第二章 近期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对策

经济分析是建立正确对策的基础。认识经济的目的在于控制和发展经济。与认识自然相比，认识经济要更难些。因为经济是人参加和从事的创造活动，具有更大的动态特性和主观偏好的影响。因此，不能说哪一种经济对策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或“万应灵药”，可以“一劳永逸”地采用下去。经济决策具有极大的实用性，凡是对处理实际问题有效，并推动经济发展的对策，都是成功的对策。离开实际问题，离开成功，任何对策都是没有意义的。

1. 财政政策

我们的目标是高速度增长国民总产值，提前实

现双倍增规划，使人民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财政政策有：减少税收，为企业让利；提高总需求，刺激投资，增加政府支出；发行短期公债券，吸引储蓄，用于扩大总需求。

目前遇到的中心问题是企业缺乏活力。如何确定对企业的财政政策，激活企业，有如下方案：

1．认为交通能源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为此采取“集中资金保重点”的对策，压缩非重点投资，控制固定资产建设规模，发行长期国库券，增收能源基金税。

这一对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限制投资，突出重点。并且认为能源交通不是企业的事，而是政府的事，政府有责任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首先要解决一个策略原则问题：电力、煤矿、公路运输等等是经济实体，也是企业，也要受市场的调节。缺电、缺煤，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电、煤的供小于需，价格被控制死了，大大低于市价，以致电力企业无利可图。无利可图的企业只能萎缩，决不可能发展。电价不放开，仍然保持高度统一的指令性分配办法，企业发展没有电力供应，只好找国家要。国家怎么办？只好向企业多收钱，由国家包办一系列“重点项目”。国家包办企业是办不好的，这是很多国家的长期历史经验。国家越是包办，电、煤价

越是控制，电、煤就越缺，国家就越要集中，陷入恶性循环。因为长期国家包办惯了，从观念到组织机构都有很大的惯性，使得这一对策很有市场。但可以断定，其结果是不会太好的。

2、对企业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按《决定》设想，企业是要与指令性计划及行政主管部门实行“政企分开”。企业的投资决策是内部的生产经营决策，允许“自发投资”、“诱致投资”。也就是说，投资（I）是企业的事，而不是国家的事。为了刺激投资（市场是无限的），国家采取“休养生息”政策，降低税率，把国民总产值中的折旧、更多净产值转给企业，提高企业留利水平，扩大企业的投资需求。企业在国家长期包办下，素质差，竞争力低，应变能力差。为了增强企业的自我改造和发展能力，为了提高职工工资收入，把利润多留一些给企业，企业就会把大部分留利转化为投资。投资是经济扩张的基础，这一对策将有利于经济扩张。

给企业让利的总原则，许多决策者是不会有太大争议的。但要让利多少合适？按照新的体制模型，国家财政负担将大大减轻：基建投资担子压在企业肩上，企业亏损、价差补贴以及工人工资不再是国家财政负担了，国防也将通过改革减少财政支

出，国家机关消肿。当然，也存在有增加开支的因素：如教育，基础设施扫尾，国家机关等增加工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每年维持1984年的财政收入水平，足以应付各项开支的需要。这一头定死以后，另一头税种和税率以及征收面就可以灵活处理了。具体意见是：乡镇工业，个体、集体工业开办投产后，免税三年，三年后征10%所得税；国营大中型企业提高折旧率，一般要达10%以上；国营企业只征所得税和地方税两个税种，总税率不超过毛利的50%；对建筑、交通、能源、劳务性服务业、科研设计免税；开征个人收入累进所得税和利息税；取消农业税、屠宰税；营业税率为毛利的30%。以上财政政策用老基数算，会减少财政收入；如按发展的新账算，不仅不会减收，还可能大大增收。给企业让利是一项一本万利的投资，所谓“让利”，只是政策的许诺，“一诺值千金”。

3．维持现行财政政策，把多收的部分转移支付给准备重点发展的部门、行业。这个方案对各方面振动小，容易实行，也会比过去有效些。但它最大的弊端在于现行财政政策太紧，企业留利水平太低（11%），企业活不起来。财政的转移支付很容易造成财政统支和“群起而争之”的局面，助长官僚主义和浮夸风。

企业要活，需要有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市场是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也是环境。为了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和投资环境，必须给城市以一定的财力。财政政策中必须考虑城市财政政策：1．要征城市管理税，主要是对国营工商企业征税，税率为毛利的5%；2．开展房地产交易，土地使用权商品化；3．有偿服务；4．对城市第三产业（公园、苗圃、影剧院、旅游港口、车站）免税，自我发展；5.提高养路费标准或收汽油、轮胎附加费，用以发展公路运输；集资修路、桥可通过收费回收本息。

近期经济起飞，是一个十年到十五年的上升期。这期间，只要政策对路，双倍增计划是可以实现的。上面谈到过“商品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是否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也适用？回答是肯定的。由于中国市场的广阔和消费的多层次多样性，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周期较长的客观条件。

2. 货币政策

要实现近期起飞的目标，光有好的财政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好的货币政策。

我国货币投放量在目前水平下是多了，还是正

好？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银行系统，没有国家储备系统和与之相应的商业银行网络。发行货币量是随经济扩张而增加的，经济扩张又可以通过资金市场的利率反映出来。由于我们没有开放资金市场，又实行僵化的利率控制政策，货币投放活动成了银行被动反应，很难控制。我们并没有清醒估计近两年来的经济在质上的变化，发行货币一般都是在货币流通出现断流现象时，银行不得不向市场投放。经济不断发展，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到年终一结算，大吃一惊，“怎么投放了这么多货币？”。有可能在某一瞬间或局部地区，因人为大量投入货币，会出现短暂的挤兑现象和抢购风，因为是人为的，并不是经济的客观现象，所以不值得大惊小怪。198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万亿元，每增长10%，就有一千亿元。如果我国目前货币流通速度是3次/年，那么一年就需要向市场投放至少300亿元货币，经济才能运行下去。如果我们这一年发行量不足300亿元，就惶恐不安起来，那是盲目恐惧（上述假定考虑了涨价因素）。

要提前实现双倍增目标，可供选择的货币对策有如下几个：

1．保证充分数量的货币供应，采用随机应变

的货币投放对策。货币供给增量是经济增长的指征。假定往后每年经济增长率为10%，据

$M=\frac{P\cdot\triangle Y\%}{V}$公式，货币供给量也要同步增长

$K\cdot\triangle Y\%$。K决定于价格指数（P）和货币流通速度（V）。假定价格增长恰好被加快流通所抵消，每年货币需增加10%。这个增长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不能等到年底一次投入，那样是跳跃式的，必然对经济有冲击作用。中央银行要不断密切注视经济的发展动向，象水龙头一样源源不断按需要流量向经济土地里浇灌。每月要对下个月货币需求量有所预测，并在执行中按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这就是随机应变的货币投放对策。

2．广泛采取支票、信用卡形式的通货，加速货币流通。职工工资、企业流动资金等要尽量采用支票与信用卡形式的通货，使流通层次减少，提高经济运行速度。经济倍增，光建立一个合理的金融体系还不够，货币形式也要随着改革。当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会自动地把节约下来的货币连续地投入市场，变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这些需求正是经济扩张所必需的。

3．灵活控制中央银行贴现率，鼓励企业使用

自有资金投资。外国企业的投资，主要用企业自有资金（折旧加利润留存）。如果存款利率等于社会（或行业）平均收益率时，企业就不愿意投资而把资金存入银行。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央银行是社会资金的逆止阀。灵活控制中央银行贴现率，可达到既鼓励企业从银行贷款，又挡住企业资金回流存入银行的双重目的。光有财政对企业减税和提高折旧率，没有灵活的中央银行贴现政策，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投资就无法扩张。

这里有一个“控制基建规模”的观念需要加以分析。在搞建设靠国家拨款、交企业无偿使用的旧体制下，投资不是为了收益，而是为地方争实力、争花钱的权利。本来就是严格控制的指令性计划。在“权利平衡”原则下，面对群起而争的各部门、各地区，综合平衡所能做的只能是切块分配，人人有份，“排排坐，吃果果”。要到了手的项目成了下年度要投资的钓饵，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项目摊得宽，建成竣工的少，投产后生产上不去。这一切都是政策所忌讳的恶果，却都被政策本身促成了。因此“控制基建规模”成了银行、计划对付投资恶性膨胀的一个补救性的政策。在商品经济阶段，要发展经济，宏观政策从来都是引导投资而不是“限制”投资。刺激投资会不会使投资规模超出国力所能承

受限度，而影响其他消费？首先，投资是耗费国力的提法不妥。投资只是动员企业和居民的力量自我发展的行为。其次，用于建设的贷款是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储蓄行为是决定于对资金未来收益的预期，是扣除生活消费之后“多余”的钱。尽量把这部分钱动员起来发展生产，决不致有上述之虞。至于投资与建材平衡问题，不应该是宏观层次的问题，而是市场与企业的事。东西少了，就要涨价，涨价会使建材生产发展，同时又会抑制投资的扩张（主要是因为涨价后资本成本增加，收益率下降）。

随着经济的扩张，企业留利也增加。只要有市场（不断开发新产品），投资就会跟着扩张，在乘数和加速原理的作用下，将保持一个较长的经济发展时期。这里并不否定周期规律，只是周期拉长，上升（双倍增）期拖10～15年（并非说某种具体产品有这么长的市场寿命期）。

以上说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涉及银行业务和资金流通体制问题。货币政策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的，政策再好，没有一个开放的资金市场和银行系统，就很难起作用。此外，资金使用效率和信用手段，对货币政策有很大影响。发达社会的货币流通速度快，通货质量的层次多，其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大，不确定性高，风险也大。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水

平低，商品流量小，范围窄，加上体制上的条块分割，货币政策显得单纯得多。这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要尽早决断，从速实行。

3. 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

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的一个目标，孤立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往往是很难协调一致的。扬·丁伯根*认为一种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当两种政策同时为着一个目标时，这两种政策就必须按照系统的观点，各自作出妥协，制定出一个相得益彰的综合政策，才能奏效。长期以来，财政与银行在争夺控制权上互不相让，多有龃龉。财政政策往往得不到货币政策的支持，或货币政策被财政政策所抵消。如此各自为政的条条控制，往往是搞乱控死微观的根源。

财政常常为了刺激总量需求，采取赤字政策；如果货币总量不增加，利率就会上升，从而抑制了投资的扩张，无法达到经济扩张的目标。这时，货币政策应该及时调整，增加货币供给，平抑利率，投资扩张就不致受到影响。

---

* 荷兰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当赤字太大（总量需求膨胀），引起通货膨胀时，为了减少总量需求，一是要减少政府的财政开支，二是要使与之配合的利率升高，抑制投资。由此可见，财政—货币综合政策的实质，仍然是随机应变的动态政策。任何以静止和绝对观点对待这个政策，想制定一个几年不变的综合政策，只能是一个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的主观政策。

双倍增目标，一般都要求保持较低水平的利率，以刺激投资。不可否认，企业负债投资有可能使总量需求膨胀。为此，有必要采取与之相反的收缩财政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增长势必形成全局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出现阶段性的停滞现象；而投资增长一下子又降下不来，通货膨胀将与停滞并存。这就是西方七十年代出现的“滞”现象的原因。我们在进行宏观决策时，对这个教训要引为鉴戒，避免“滞胀”情况的出现。

4. 分级决策

一个国家实行统一的财政、货币政策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市场是统一的，政策理所当然要统一。但市场是一个网络，各个市场是开放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每一个市场都有供给与需求的均

衡体系，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选择相应政策。我国是个大国，每一个省从人口和面积上，都可以与欧洲的一个大国相媲美。加上中央目前管理大幅员的大市场商品经济，缺乏必要准备和实践经验，在双倍增期间，应采取分级决策战略。货币和财政宜以经济区为单位制定政策。经济区中心成立储备系统和财政管理局，在全国统一原则下独立活动。各个省、市也有自己层次的决策内容。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做到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均衡发展。即使在个别地区政策失误，对全局的影响也不会太大，避免了全国性风险。全国设国家储备系统和国家财政部，协调各经济中心一级的货币、财政政策，真正做到“大的管住，小的放活”。

管理水平是与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当生产发展到能够实行全国统一决策管理的水平时，分级决策就逐渐隐退和消失。分级决策并不是过去那种行政意义的划片管理，更不是自成系统，各自为政。各级都是开放的，每一个决策都必须考虑输出输入给分系统造成的影响。

实现分级管理的基础，一是有懂管理的人员，二是有一个灵通的经济信息系统；三是有一个开放的市场。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实行分级管理和决策的前提。

第三章　远期经济发展问题

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远期增长策略就是解决按人口平均具有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的生产率，让劳动者得到更多的实惠，生活得更幸福。经济学的一个古老而又重大的课题之一，是关于国民产出的增长问题。从亚当·斯密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到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科林·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都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成功之作。现在经济学界都认为，平均每个人口创国民财富的增加率，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率的指标。也就是说，在扣除人口增长因素以后，每个人还可以有剩余的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这种剩余

增长率越高，可供享用的财富也就越多。现实经济中，国民总产值并不是全部用来供劳动者享用的。比如税收的大部分社会性支出，劳动者并没有得到直接好处。但也存在相反的因素：国家削减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把空闲当作一种重要资源和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环境保护的努力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质量，促进身心健康；各种商品质的变化，满足人们更多方面或高质量的需求；劳动者自我服务节省的财富用于其他方面的需求……等，又在增加和补充国民财富。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累积性发展达到了质变的程度，经济发展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就是所谓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第三次浪潮”。这对我们的远期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场挑战。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新趋势。

经济增长有三种不同的类型：1．劳动（体力劳动＋技巧＋微型电脑机械）集约型（不是纯体力集约型）；2．资本集约型；3．技术（知识）集约型。不同类型，都是在生产要素上作偏重于某一因素的组合。技术集约型的本质也是劳动集约，是物化了的脑力劳动物品的集约。国民财富的增长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因素的投入增加率，还决定于生产因素质的变化与合理的生产因素结构。质与结构的差异，

造成在相同价值投入情况下，产出的悬殊差异。因此，不能笼统地认为资本、技术集约一定比劳动集约好，或认为可以互相替代。新的技术革命，有可能采用电脑等人脑的延长和廉价的设备，加上分散的家庭生产，有可能创造人类历史上空前高涨的生产率。这叫做生产因素的综合效应。影响远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资源、环境、人口、现有基础的改造、教育与科技等。

1. 资源问题

自然界中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是否存在一个“枯竭”问题，对选择未来对策关系极大。合理分配和节约使用资源是市场机制就可以做到的事，用不着多费笔墨去讨论。资源枯竭对某一具体资源而言，是存在的，比如有一天石油采光了，锑、钨等金属资源用完了，这都是可能的。我们讨论经济问题不要忘记两个重要原则：一是资源的世界性，二是资源的节约性，三是资源的替代性。一个国家某种自然资源枯竭，不等于全世界自然资源的枯竭；在陆地上枯竭，不等于在海洋上也枯竭；原来划到储量表外的贫的、难选的、难采的资源，不等于将来就不能

利用。如果考虑空间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资源枯竭还可以到空间外获得新的来源。资源的节约趋势是明显的。技术的进步，材料性能的改善，用金属须造的钢索，其抗拉性能比同断面的普通钢索高几十倍，合金钢的性能也比普通钢好得多。这种靠技术因素引起的节约几乎是没有穷尽的。资源的替代性也是同样没有穷尽的。炭、硼纤维和塑料代替了钢材、铝材；光导纤维代替了铜铝导线；陶瓷、水泥代替了金属；核材料代替了石油和煤；……。材料科学的每一项突破，都创造一个崭新的替代领域。

以上三个原则，告诉我们不必为后人担忧“资源枯竭”问题。那种有资源可以利用又舍不得利用的“节流”思想及政策，是“守财奴”的封建意识体现。中央提出“有水快流”的方针是正确的远期发展的资源方针。现在可以利用的资源不加以利用，就象有了钱把钱埋在地下一样愚蠢。资源不利用，资金、劳力都无法充分起作用，近期发展都不可能，更谈不上远期发展了。“大胆地开采吧，资源是无穷尽的。”“发展本身在创造新的资源”，这就是远期发展的资源政策。

2. 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经济增长引起的。和化学反应原理一样，生成物的浓度增加，将阻滞顺向反应。经济顺向发展造成高生产率的同时，是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阻滞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环境问题已经比较严重，花很多钱去治理三废，与积累水平不相适应。环境质量与贫穷相比，贫穷是更大的“污染”。经济不上去，治理三废就是一句空话。过去投资是国家拨款，企业治理三废项目又可以优先得到资金，因此按环保法的要求，搞了一些治理工作。今后，企业在选择一个扩展能力的项目投资与一个三废治理项目投资时，无疑总是选择前者；因为后者投资是没有或者很少有收益的。边际投资效率原则，迫使企业放弃“环境”追求增长。从宏观看，三废治理将减少总需求，减少有效投资，降低发展速度。在长期增长目标下，只可能适当限度地做些治理工作，做到既保持增长，又不致把环境破坏到不可接受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加大环境投资绝对量，逐渐把环境问题处理得更好些。第一位仍然是增长，然后才能兼顾

环境。

国家财政收入中，可以拨一笔费用用于环境建设。这项事业和国防、安全事业一样，是一项“令人遗憾的需求”，是国民对环境支付的一笔生活质量管理费。国家环境支出不是开发性的转移支付，但却是消费性需求，对供给多少会起一些促进作用。有一些三废治理项目本身，是综合回收资源，有效益的项目。应该从技术上加强开发，尽量把环境投资转变成开发性投资，这样就可以大大缓和发展与环境的矛盾。

3. 人口问题

因为一国经济增长率是作了人口增长扣除后的剩余增长，因此，人口问题就成为远期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人口问题又显得特别严重，主要是人口基数太大，经济基数又太小。人口问题之所以变成经济问题，是因为把人看作“口”，只会消费财富，消灭财富，而不会生产财富。如果把人看作“手”“脑”，看作活跃的生产力要素，问题的结论正好相反。美国一个农业人口，养活近百个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问题不仅不存在，而且还感到不

足。现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以内，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将达十二亿。如果经济发展能保持在10％以上，每年剩余增长率可维持9％以上。不管人口基数有多么大，可以肯定，社会财富会越来越多，人民的生活将越来越幸福。

本篇第四部分§2—8将讨论劳务出口和移民问题。中国幅员广大，生活空间远没有被充分利用。我们可以象美国早期向西拓荒一样，向西部进军，使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结合起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我们还可以向急需劳力的世界其他地区移民，走向世界劳力市场，把劳动力资源充分开发出来。那时，中国不会再感到人口是个严重问题了（当然，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仍然是发展经济的重大国策）。

4. 现有基础的改造

现有基础总是要随着社会需求和科技发展进行自我改造的。企业改造是企业自己的事，这里不作探讨。宏观经济基础怎么改造？当然不是依靠权力捏造一个新的结构，主要是顺应发展方向，指出一条发展路子，引导企业前进。

首先是农业。这是一个向自然界索取财富的产业，特别是向太阳能索取有机物的产业。农业发展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充分发展和利用有机物的问题。生物工程在农业上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要围绕充分利用有机物这个中心，应用生物工程成就和一切适用技术，象工厂那样，注意技术的进步。钱学森提出知识密集型的农业构想，并认为这是第六次产业革命，是很有道理的。人们舍得在工业上、海洋上、空间上、核子上花大本钱搞开发，却很少有兴趣在农业上花不多的钱搞开发。而农业可供开发的领域是如此广阔，如此诱人，被人们不公正地冷落在一边。人们从农村走向城市，遗忘了自己的出发点。现代科技成果在农业上的应用，就可以改造现有农业基础，实现农业持久稳定的增长。

工业现有基础将在新产业萌发时被慢慢取代。我们面向未来，不能走工业国的老路，要采取逆向发展战略，从开发新产业入手，改造现有工业基础，实现高速增长。

工业的发展出现“软化”和后工业化趋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向第三产业，商品中包含的精神、知识、脑力劳动的成分越来越多了，商品软化导致消费的软化。这是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要清醒地认识我们面临的巨大变化。现在对发展第三产

业议论颇多，好象想发展多少，就可以发展多少。这是一种误会。第三产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没有发达的第一、第二产业，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第三产业。过去三个四个农民才养活一个城市居民，居民的工资收入也不高，许多服务性消费无法进入市场，变成家庭内部的自我服务。在这种状况下谈发展第三产业，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论。第一位仍然是发展经济，随着经济的增长，第三产业就会同步增长起来。

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力量是很大的，靠什么力量去综合呢？国家可以在政策上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综合。不过这种宏观粗糙的政策无法对生产因素进行细腻和动态的综合。主要是靠高度活化的中介环节、企业家和市场机制达到合理综合的效果。高度活化的中介环节、企业家，在敏捷捕捉信息和机会，灵巧地把有限的生产要素及时地组织起来，追求最大效果，并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改组、变态或变性，维持综合体的最高效率。我国现在“活化质点”太少，活性也不大。改革应把激活企业家、给企业家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自由度和用武之地作为重大课题，以保证远期的增长。市场机制也间接地起到生产要素结构合理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已在“市场机制”章节中做了说明。不

再赘述。

附带讲一个非经济的长期增长因素——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是需要精神文明支撑和灌溉的。日本古老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是日本物质文明建设成功的基础；美国混杂的无传统文明，实际是自由竞争的文明，是自立和无限发展的文明，这个文明造就了世界第一流的物质文明。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什么是这种文明的特征？勤劳、勇敢、互助、团结这是不待言的，但还不够，还要有自强自立、竞争法治的文明。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一切美好东西的综合体及发展。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有日本的顽强自立精神，有美国的法治和自由竞争文明，有苏联的团结协作文明。所有这些，都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都是保持远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5. 教育与科技

教育与科技对远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渗透在劳动力及资本要素中起作用的。同时也强烈影响着经济体制、宏观管理和精神文明。所以教育与科技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前面讨论的四个问题，都

少不了教育与科技在起作用。人们在论及教育与科技时，常常归结为人的要素的改进和革新，认为经济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这种归结是精辟的，符合实际的。经济现象是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有了机器人和电脑，也不能忘记这些聪明的玩艺也是人创造的。发明创造和科学管理也得依靠训练有素的人。邓小平把这些概括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贴切的。

教育是智力投资，或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国家办教育，把教育看成智力投资，教育经费开支越来越大，逐渐成为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能不能找到一条不必国家包办教育的路子，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只要把关系理顺了，路子就出来了。国家办教育的资金是从税收中来，如果把税收中教育费用转移支付给职工，由职工出钱购买教育劳务，使教育变成第三产业，从官办框框中解放出来，使教育劳务进入市场，受劳动力市场供需的力量调节，教育价格也由社会对教育劳务需求决定。这样的教育体系就变成有活力、能自我调节的产业，无疑将极大提高质量与效率，并在市场调节下，使教育结构合理化。现在教育与经济需要是两张皮，专业设置，教材内容，初、中、高级教育比例严重脱离实际，学校办社会，学校成为部门附属物，自成系统等

等，都严重障碍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想象，企业富起来后，存在一个劳动力再培训与提高的企业教育需求问题；不排斥大企业和国家办少数为培养企业人才和公共管理人才的学校。

科技的大部分问题本来不属于长远发展问题。因为大量的科技成果是通过新商品向市场推出而被社会承认的，因此科技是“供给”范畴的事。我们习惯于国家包办科研，由国家拨款搞科研，科研成果往往停留在“鉴定”这个阶段，不能及时地转化为生产力。至于成果怎么变成商品，那不是科研单位的事。近两年来，提出科研单位企业化，科技成果是商品，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交易，这是一个根本的变革。科研的生命力在于推动生产力发展。新的科研体制，把科研与生产融为一体，从行政事业领域回到经济领域，使科研获得蓬勃的生机。做到这一步，科研就能做到超前经济发展，引导远期经济的增长。国家为了长期发展目标的需要，要注意基础科学研究，还是应该办一些个人、企业无力办的基础理论研究事业。但不能是过去那种办法，而应采取国家向研究单位订购成果的方式，用经济合同办法，把国家与科研单位分开，成为买方与卖方的关系。许多基础理论研究是依靠企业资助，高等学校进行研究，成果分享。企业有了实力，也会办自

己的基础理论研究所。

过去我们花很大气力去说服企业，要企业“注重技术进步”。由于体制不合理，企业无力进步，无权进步，无法进步，而不是不想进步。企业有了自主权，有了受法律保护的权益，追求技术进步成为企业第一本性，毋须宣传鼓动就会自动重视技术进步，不仅引进国内的科技成果，还要引进世界最适用的先进技术。

第五部分
国际经济问题

第一章
世界货币体系

国际经济可以归结为国际市场的开放和商品流通。国际间的商品流通，是通过货币的流通实现的。不同国家的不同货币是如何实现流通的，这要借助一个组织严密的世界货币体系，才可能实现。

世界货币体系约略模型是：首先要有一个公认的世界货币和一个国际货币储备系统。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多数贸易国参加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要按其在国际市场货币流通量（或资产）认购准备金——称做"纸黄金"的特别提款权，各国认购的准备金，成为国际储备基金的财产，构成国际信用的物质基础。其次要有按商流中心建立的外汇市场（如伦敦、纽约、香港），在这些市场上，各

国的通货可以自由兑换，汇率一般是受通货供需变化而浮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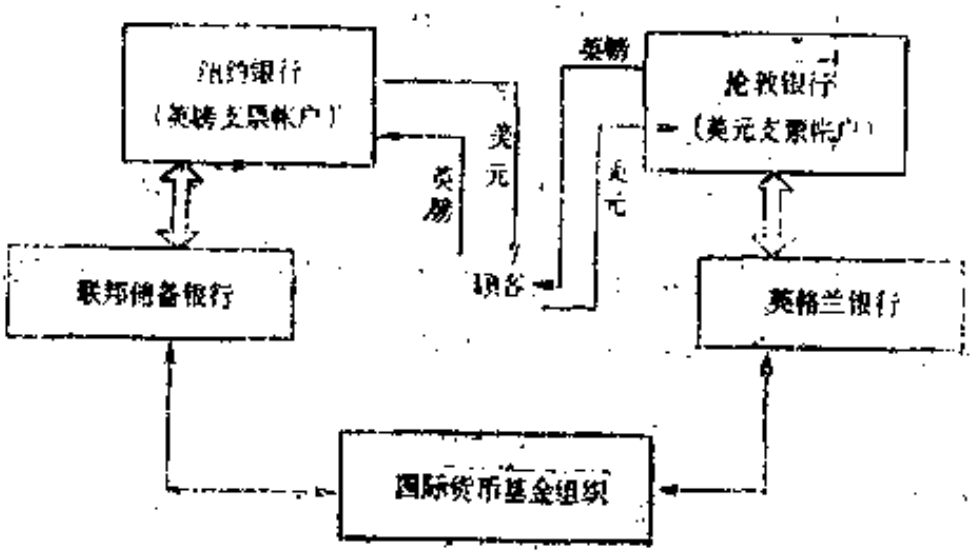
1. 国际支付机制

国际支付看起来纷纭复杂，涉及多个国家，不同货币，好象很难搞清其间的机制。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简化成同一种货币，在不同区域间的支付进行讨论。因为不同货币总是可以找到一个汇率换算成一种货币。

同一种货币在不同区域是如何结账的呢？各地区的居民，在自己地区的某一银行里有活期存款（即手持该银行支票），他用这种支票在不同地区采购物品，使支付账挂在不同地区的银行帐上。每一个银行都可能出现这种支付。每天结算时，就可以把外地区银行支票汇集起来，到一个中心票据交换所去，把自己的支票换回来。经常会出现票据交换的“剩余”或“不足”情况，这时只要把差额换成银行间的支票，就可以结清财产与债务。如果这个差额太大，使某银行账将低于正常营业的警戒限时，这家银行就得想办法从储备系统借钱进行调剂。

国际支付同上述机制十分相似。不同国家的外汇结算银行，就相当不同区域的商业银行，它们互相间有不同货币的支票往来，有对方国家的货币支票账户。对方国家进口时，用本国货币兑换对方国家支票支付；向对方国家出口时，对方银行同样进行这种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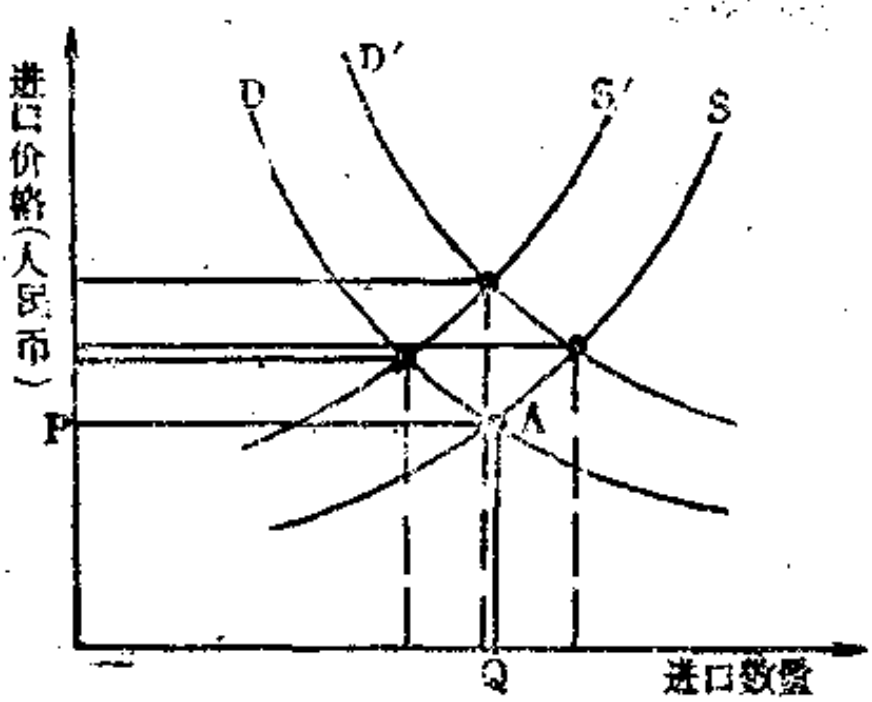
比如：



2. 汇 率

汇率是国际货币市场上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格。这种价格的形成不是人为的，而是通过商品进出口的需求与供给关系确定的。

如下图：



正常情况下，1美元＝2.8元人民币，进口供给（S）、需求（D）曲线交汇在A点，均衡价格为P，均衡进（出口）量为Q。这时，美元供给与需求在汇率＝2.8时均衡。

当汇率改变时，设1美元＝4元人民币，美元升值，进口减少（出口增加），S曲线左移至S′，在需求曲线不变情况下，均衡点向左上方移动，均衡价上升，均衡进口（需求）减少。最后，导致用于进口对美元需求的量下降。相反在这一情况下，出口增加（D→D′），导致出口的美元收入供应量增加。

以上两个对美元供求相反的倾向，最终将达到

一个均衡点，这一点就是市场上实现的汇率。出口多赚的美元，因为含人民币多，因此愿意抛售出去买人民币，以便推动出口；另一方面美元升值，进口不振，对美元的需求减少。多的美元换不成（4元）人民币，就迫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一直降到均衡点为止。我们经常在汇率变化时，感到疑惑不解，认为汇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幻影。因为不了解汇率的由来，在早期把汇率看成可以任意确定的参数，对外挂牌买卖价总是维持在1美元＝1.5元人民币。实行结果往往大大突破挂牌价，这叫做汇率的人为扭曲。不同商品比率相差很大：钨砂、锡等，1美元还不足一元人民币；有些轻工、电子产品则一美元等于十多元人民币。进口也有相似的现象。以外国货币单位为基础折算本国货币数额的方法叫做直接标价法。反之，称间接标价法。

中国有了特区以后，人们对汇率的认识逐渐感性化了。在对同一商品作比较时，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出人民币、兑换券、港币或银元间的比价，它们之间自由兑换，就把各种通货间的比值显示出来了。

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汇率看作影响进出口活动的强力杠杆。国家往往通过国家储备系统购进和卖出某种货币来干预货币市场，维持货币价格，这叫

做固定汇率制度。如果听任货币市场的变化，不控制货币市价，这叫灵活汇率制度。

大家经常听说“套汇”这个词。它是在自由兑换外币的市场上，当一种主要货币突然跌价或抬价，在各种货币间比率未来得及作出相应调整时，有人进行货币投机经营，从中牟利。比如开始一美元等于5法郎和5马克（1法郎等于1马克），突然，美元对马克贬值1美元=3马克，而对法郎还没作出反应。立即有人把一美元换成5法郎，再换成5马克，转而兑成1.67美元，一个循环牟利0.67美元/1美元。当今世界金融界通过发达的信息系统时刻在监视、追踪着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化，很少有可乘之机。局部货币交易市场（如深圳），则还可能出现套汇的漏洞。

浮动汇率制度往往吸引货币投机者，给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灵活汇率是弥补赤字、促进国际收支自动平衡的杠杆，也是借市场力量解决国际货币收支中出现难题的简便方法。本国货币的贬值往往还是推动出口、限制进口的手段。

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除国际贸易状况的影响外，各国的货币政策，国内货币市场行情，利率水平高低，国际间的投机活动，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及

对比等都在影响着汇率。

在货币市场开放的国家里，汇率变化对国家经济有很大影响。首先影响进口与出口，并影响资本的国际运动，影响非贸易收支，影响本国市场物价，影响国际经济关系。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主动影响汇率的变化方向，朝有利于本国的方向运动。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认真研究体制变化与汇率变化的内在关系，预计到改革对汇率影响的程度和范围，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外贸政策，引导经济顺利增长。

3. 世界货币新秩序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货币秩序，货币市场将是混乱不堪的，经济运行及控制也成为一句空话。对世界而言，各国政府长期以来，主张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合理的货币秩序，以便各国安居乐业，相安无事。基于上述愿望，总的倾向是主张固定汇率制度。这个制度要点是：每个国家必须储备国际准备金（外汇储备），用以调节短期国际支付差额；有一个世界性的调节机制，对异常现象进行调节。

储备准备金的准备金规范化，已经经历三个时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采用金本位，黄金是硬通货，是各国货币币值的物质基础，它本身也作为通货手段在民间和国家之间流通，各国发行的金铸币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两国货币汇率决定于它们相对含金量之比，汇率波动的波幅等于两国之间黄金运费、保险费和利息。由于当时国际经济来往规模较小，流通比较缓慢，金本位储备系统运转正常。1919～1939年由于战争，国际资本运动受限制，货币出现了浮动和改值现象，原来的货币秩序被摧垮了。战后（1944～1971），建立了“布雷顿森林制度”，采用黄金外汇本位，各国通货对黄金的汇率固定化，规定每盎司黄金的官价为35美元（允许经批准作10%波动）。虽然黄金继续是各国准备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上述规定，使美元同黄金一起成为世界货币，黄金已不再是国内通货。随着经济交流规模的扩大，货币流通节奏加快，准备金中的黄金比重日益下降，美元逐渐上升为“主要通货”。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分量加大，美元信用和黄金一样高；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世界储备金，可以无限制地随贸易支付增长而供给各国，保证了国际经济正常运转。美元的信用和地位，给美

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和政府借公债一样，美元变成世界性债券。各国接受美元准备金等于承认了美国的借据，美国靠这种正常的收支结算赤字，向海外购买大量物品和劳务。在美国高额赤字和各国大量采用美元准备金情况下，美元地位发生动摇，迫使各国仍然坚持黄金外汇本位。经济规模扩大，黄金储备量远远不足，危机终于在1971年出现了，西方外汇市场不断掀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货币的风潮。1971年8月，美国政府被迫宣布按官价兑换黄金的规定作废，黄金外汇本位制度也随着垮台。

秩序瓦解后，代之以浮动汇率制，这是借供求力量影响汇率的“无秩序”制度。这个制度是那么有效和易行，以致各国都习惯和喜欢浮动汇率制了。

各国政府仍然在寻求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的可能性。美元失去信用后，新的方案是：把国际货币基金看作是各国中央银行的世界储备体系，各国在这里有一笔规定份额的存款，成为各国的准备金。各国持有支票称特别提款权（SDRs）（或者称“纸黄金”）。这个方案取消了美国无限借债的特权，加上各国持有大量美元没有明确的出路，变成“悬在头上的美元威胁”，新秩序并未顺利地建立起

来。

在世界货币秩序中，石油美元大量结余成了不稳定因素。这笔为数巨大的美元，随心所欲地奔驰在世界货币市场上，足以破坏一切精心建立起来的不稳定的任何新秩序。石油美元是石油危机的产物。石油涨价，使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动摇了美元的地位。由于节能和非石油输出组织的石油产量增加，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稳中有降，石油供大于求，这种情况已经使美元升值。美元坚挺了，美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些变化，可能将有助于美元卷土重来，建立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国际货币新秩序。美元的地位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反映。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新秩序既对美国有利，也对世界各国有利。我们不能因为对美国有利而反对建立新的稳定的货币秩序。

第二章
国际贸易

1. 国际贸易原理

一、互通有无原理

国际贸易的发端就在于国与国之间互通有无。世界各国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传统各异，犹如色彩斑斓的百花园。如果一国想得到自己所缺乏而又是另一国所剩余的，这两国就会发生贸易关系。贸易总是相互的，一国的需求与供给也是多层次多样化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取长补短，互补互取，这就是国际贸易得以发展的简单原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交易的内容逐渐深化和外延。人才，科技成果，专有技术，信息，劳

务等交流越来越频繁；资本流动也越来越活跃。当今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排斥国际贸易而独立发展，没有一个国家会以为“自给自足”是高明的政策。商品经济和市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高效率的组合，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综合效应，各国都在这种效应中受益。中国把对外开放当作一项长期国策，就是顺应这种潮流的正确决策。国际贸易的命题已经不是“有与无”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更快地发展”的问题。一切“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万事不求人”的思想，是封建自然经济观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表现。中国这方面的意识与观念影响比较深，不肃清这些观念，中国经济现代化和对外开放就没有希望。

二、比较优势原理

中国游击战有一个重要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个原则，是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原理的形象解释。

中国的瓷器、丝绸，印度的香料、珍宝，波斯的骏马，在古代国际贸易中，都是从比较优势原理出发，选择在本国能大量有效地生产、廉价又有利可图的贸易产品。

国际贸易的“廉价”，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价

格概念，而是商品供求引起货币供求均衡的价格。大宗廉价商品拥入一个国家，就会引起商品出口国货币的升值，从而“钝化”出口势头；另一方面，出口国货币升值，进口国的货币相对贬值，从而推动了进口国向出口国的逆向回输。在相向较量中，实现了均衡。这时，可以输出并有利可图的商品，就是比较优势商品。“比较”是一个重要条件，它告诉我们，“优势”不是想象的或自封的。没有对比，没有较量，就不存在“优势”。“优势”也是迁移的，随着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居民偏好、代用品的出现，一些原来是“优势”的商品，就会失去优势，原来非优势商品则可能变成“优势”。

比较优势的相对性，说明某一国资源、生产要素的优势并不是无限的，可以不作出国内牺牲就能“稳操胜券”。经济问题的基本事实就是“稀缺”与“匮乏”。为了合理使用有限资源，就要对一种资源的可能机会费用进行比较，选择那些最划得来的机会加以利用，而不得不放弃那些相较不怎么划得来的机会。如果一国大量出口它的优势，就要占用大量资源和劳力，失去了大量其他机会，造成国内价格的上升，优势就会被削弱。大量商品拥进一个国家，必然会供大于求，价格也会下降。两种因素的反向运动，限制优势发挥的程度，实现双方贸

易的均衡。

比较优势有可能导致国际生产分工，成为专业化出口产业。不过，这种分工只有在不受挑战和无法竞争的条件下，才可能维持。比如矿产资源、自然条件，是人力不可改变的，与此相联系的优势，在长期中可以保持下去。诸如人力优势、技术优势是能够改变的。比如瓷器生产技术，日本等国就有新发展，茶叶在印度、非洲也有特色，中国这些古老的优势正面临世界性的挑战。

专有技术优势是很重要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开发的新产品、有竞争力的产品，主要来源于科技与传统技艺的新应用。这是推动出口的强大动力。

比较优势原则，要求一国在制定国内供求策略的同时，也要制定包括国外市场在内的供求策略，要有国内外的综合、总体的供求观念。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不同范围的供给一需求关系。一个开放的、向现代化经济目标挺进的国家，它的供一求战略天经地义应包括国际供一求内容。

三、竞争原理

这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基本原理。国际贸易也是商品经济和市场问题，竞争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贸易。

不同国家间的竞争，特别是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经济水平国家间的竞争是“不充分的自由竞争”，或“有条件”的竞争。因为，竞争不完全是经济范围的事，还带有浓厚的区域、政治、民族色彩。和竞争相对抗的是国际贸易垄断，比如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国的粮食，澳大利亚的羊毛等。贸易往往变成政治战略的工具。

另外，企图建立的固定汇率制度，从根本上打击了竞争原理。那种由供求决定价格和汇率的“纯粹竞争”市场并不存在，各种优势成为“不可比”的既成事实。有人形容：“纯朴自然的比较优势，让位给强权与实力”，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有许多困难，竞争仍然是国际贸易中经常起作用的力量。搞国际贸易，竞争意识浅薄的国家是搞不好的。无论非经济壁垒多么森严，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毕竟会突破封锁，横行市场。

四、互惠对等原理

国际贸易的互惠对等原理是必须遵守的。如果一国的利益是建立在损害另一国利益的基础上，这个贸易就做不成。殖民时代的掠夺性贸易已成为历史陈迹，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也不会接受不平等的贸易条件。

我们在初开放时，有一种“怕吃亏”的心理，总怕对方占了便宜，尽管自己也占了便宜。因此，在对外贸易上胆子小、搞不活。这就是不了解外贸互惠对等原理的结果。有的买卖人说得好：“要想发财，首先要让人家发财；人家发了财，自己也发财”。还有一种盲目不怕吃亏的倾向：把追求出口额作为主要目标，把赚钱的目的忘记了。长期以来，我国外贸是一个亏损大户，独家经营，官贸合一。营业额越高，亏损越多（主要指国内结算）。做买卖不想赚钱，搞出口没想到搞进口，这种国际贸易现象是十分罕见的。

过去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有“无偿援助”这个内容，严格说，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国际贸易问题不应该包括政治或慈善问题在内。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友谊、同情不等于做生意本身。

互惠对等在量上的分配是比较复杂的。这主要决定于双方（或多方）事先约定的贸易条件（包括汇率）。

2. 国际贸易史话

国际贸易史上，经历前、后两个发展期，中间

夹了一个衰退期。

二十世纪初叶以前的近半个世纪，是世界贸易的“黄金时代”。1870～1913年间，世界贸易年平均增长3.4%，比同期世界生产发展速度还要高。人们愿意把增加的商品更多地投入国际市场，因为在那里比在国内市场更有利可图。不可否认，这一段贸易有许多不平等条件，并不是互惠的，特别是殖民地国家遭受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正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从外贸中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日益把原料市场看作经济的生命线，并为了争夺海外原料和商品市场，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1914～1945年，是世界贸易不景气年代。由于战争和政治目标高于经济目标，世界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瓦解，边界管制和贸易保护主义泛滥，造成经济萧条和国际贸易量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建立起来了，被破坏的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了，新的国际货币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促使国际贸易以很强劲的势头复苏和发展起来。1950年以来，世界贸易以大大高于生产增长的速度增长，年上升6%。象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都提出贸易立国国策，把国内经济增长紧密地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对国际贸易史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早期世界贸易的繁华。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史实是，这期间的贸易增长，总是与海运成本下降相联系。许多低值的重货，有可能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从经济落后国家返销给工业发达国家，改变了偏向贸易的格局。如果海运成本高，初级产品就不会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初级产品进口受阻，工业发展的资源枯竭，出口也受到限制。海运成本成了出口增长的“瓶颈”。贸易发达国家，无不是海运大国，就是这个原因。

二、掠夺式的贸易并不是最赚钱的贸易方式。市场是“镜面对称”的。看起来，第三世界成了经济发达的国家的市场，实际是经济发达国家也成了第三世界的市场。你要开辟一个海外市场，同时也给对方让出了一个国内市场；你出口多少商品，也意味着要进口同等价值的商品。

三、通货关系的中断，外贸关系也就随着中断。

四、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想既限制进口，又推动出口，结果是国际贸易秩序的崩溃，大家同归于尽。

五、国际贸易在经济发展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中日渐活跃。经济越发展，外贸必然越发展，贸易已经成为近代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

六、生产率低、购买力低的国家，闭关锁国倾向比较明显。不发达国家互相间的贸易流量也不大。

七、工业发达国家出口构成中，加工品比重虽然很高，但初级产品出口量并不亚于不发达国家。他们评价出口商品的标准，并不是加工品或初级产品，而是“比较优势”原则。工业发达国家也进口工业品，甚至大量进口工业品。如美国进口的一半是工业品，因为这样做比自己制造更有利。工业发达国家的主要市场并不在第三世界国家，而在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美国出口量的四分之三是输往英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

以上各点，只要对照国际贸易原理，就不难找到答案。

3. 关税壁垒和保护主义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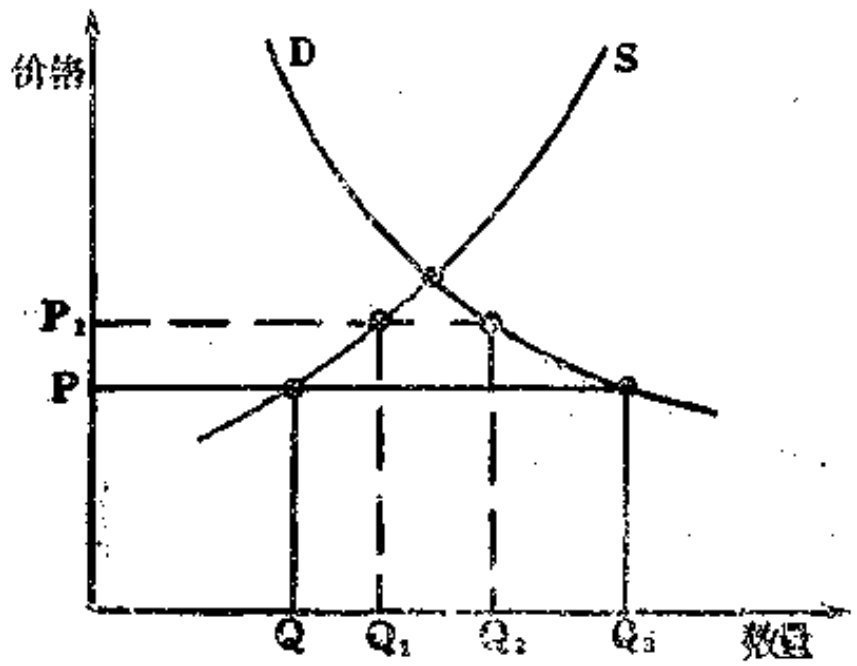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国家，在开展国际贸易以来，都不约而同的设了海关，征收关税。国际贸易原理与关税理论是相排斥的。因为关税制度从一国利益出发干预了国际商品市场和价格，从而妨碍了正常的较量，“比较优势”原理被淹埋，无法起到自动调节

国际贸易的作用。

提出关税理论的最大依据是“保护民族工业”。为什么民族工业要用关税加以保护？竞争力太弱，在进口同类商品的竞争下，有可能垮下去。说到底，这是一个限制竞争、保护落后的办法。保护的结果，是从本质上摧毁了民族工业，使民族工业无法适应竞争环境，无法自立自强。这和我国过去采取保护亏损企业的失败政策是雷同的。各国都搞关税，都想限制进口，增加出口，造成国际贸易发展的严重障碍。这种政策还可能打击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使其出口受到限制。政策造成的后果与政策目标是这样矛盾，不断坚持下来的代价是沉重的。人们很聪明，但也不免在干着莫名其妙的蠢事，这就是其中一桩。香港等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撤除关税壁垒，让商品自由进出市场，自由竞争，其结果是贸易大发展，经济大繁荣。这个事实说明关税理论是错误的。自由贸易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自由贸易区日益扩大。

落后的企业是希望坚持关税制度的。它的产品在国内市场要卖好价钱，就不允许在市场上出现比它更便宜的同类产品。一般外国出口商品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即比对方同类商品便宜，这个价差就通过进口国税收把它削平，或对本国企业更有利的负

价差。其机制可用下图说明：



P是进口商品的税前价格，也是在世界市场中实现的竞争价格。如果不征关税，进口货就可以以P价在市场上出售。在P价下，消费需求量为Q_3，而国内供应量为Q，Q_3-Q的产品由进口提供。征税后，进口货的价格上升到P_1（P_1-P为税率）。在P_1价下，消费减少到Q_2，国内供给增加到Q_1，进口压缩到Q_2-Q_1。很明显，关税保护了国内工业，使其产出增长，把外国货挤出相应份额。但，关税坑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使消费者多负担了税收的支出。消费者为了抵制涨价，沿D线收缩了消费。

还有一种出口关税制度。我国为了限制有些产

品的出口，对这些产品征出口税，一直征到与国际价格相等为止，把外流渠道堵死。

美国等有分等级的贸易优惠政策，对不同国家执行不同政策，搞“差别壁垒”。为了控制进口额，对有关国家规定某些商品的进口限额，并附带许多条件。大凡这些政策，都是“不干净”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目标不是完全吻合的。并不能因此排斥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政治目标、安全目标或民族目标，这是关税制度得以绵延至今的根本原因。

中国外贸的壁垒，主要是官僚主义体制壁垒。国家行政垄断外贸经营权，企业、消费者及各种生产因素与世界市场绝缘，进出口都无法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生意做得死，对宏观经济发展没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正在酝酿中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决定实行政企分开、进出口代理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外贸改革的要害是开放世界市场，让企业（工、商、银行）自由进出国际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

4. 国际市场策略

一、储备与垄断

当一国以绝对优势控制国际某一产品的市场时，就会不自禁地采取“储备与垄断”策略。采取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对市场形势的正确判断，并从“边际原理”出发衡量利害得失。储备与垄断的目的是为了卖好价钱，赚更多利润，而不是别的。比如我国钨砂是国际市场的主要供应国，出口量占世界年消费量25%以上，有影响钨砂市场价格的实力。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收缩，对钨砂需求剧降，钨砂市价（伦敦矿产品市场）从130美元/吨·度下跌到75美元/吨·度（WO_3）。我国外贸当局当时对市场变化趋势预计，认为价格下跌势头会在稳定下来后回升，因此决定停止钨砂出口。一方面要矿山压产，另一方面国家出钱收购钨砂作为储备，等待时机向国际市场抛售，以赚一笔利润。为了储备，就要积压储备金，按当时市场价格和利率计算，每年需支付利息几千万美元。如果在短期内，价格上升率赶不上利息率，储备的风险是很大的。实际如何，以上也只是一种预期。

二、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小

在几个都有利的国际贸易方案中选择时，就要“货比三家”，取其最有利的方案加以实施，这一点，是不会有争论的。如果不得不在无利的条件下决策，能不能选择损失最小的方案，则是不容易的。比如上例所举的钨砂贸易问题，当看到国际市场钨砂行情在短期内不可能回升时，就要及时决策，以低于市价的优惠价把储备钨砂抛出去。这样做虽然比卖高价少得许多利润，但与国内生产费用相比，卖低价仍然有利可图，并且避免了储备利息的损失（储备时间越长，损失越大）。这个决策还有两个附带好处：一是在国际市场上挤垮了小产钨国，提高市场占有率；二是国内钨矿山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采用这个决策越迟缓，造成经济损失就越大。

三、渗透策略

一个商品在尚未被消费者承认的国际市场上，要想站住脚，并有所发展，经常采取渗透策略。通常办法是把出口价降到可以打进该市场的“渗透价”。如果没有保护主义的阻挡，渗透价具有开拓

消费、扩大需求的力量，顺利地把商品销出去。消费者通过使用，建立对商品价值的认识，那时再逐渐把价格提上去。这叫“欲取之，先予之”的策略。

四、先让后出

有选择地让出国内市场，把某些外国商品先迎进来。根据对等贸易原则，必然会开辟对方的市场。单向贸易是不会持久的，不必担心“先让”吃亏。“让”要有战略眼光；要利用世界贸易的多边性和竞争原理，让那些非让不可的市场。在短期内的不对等关系是为了获得长期的国外市场好处，在对等条件下，国内市场开放是互利的。

五、搞跨国公司，把厂子办到国外去，就地生产、就地销售。

5. 资本流动—输入与输出

国际经济很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我国要在十五年时间内实现双倍增计划，需要世界先进技术，需要管理和资金。开发能源交通——近海石油、华北西北的煤炭、沿海的港口、高速公路，都希望吸收外国资本。资本不是资金，而

是产生利润的生产要素。为了加速外国资本输入，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过去狭义地理解投资环境为“四通一平”，其实最重要的投资环境，是国外资本能够无风险地获得较丰厚的利润。除市场环境外，外国人更重视政治、法律、意识环境。能不能创造比发达国家更优良的投资环境，是能不能吸引更多国外投资者的关键。

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巨额的资本积累，多数都是投向发达国家。日、美、欧之间的资本流动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这说明发达国家投资环境比第三世界国家好，冒的风险也小。

过去，我们经常把降低所得税这一政策看作是吸引外资的主要政策，这是一个大的误会。这个政策对国内投资者更有吸引力，而对国外投资者几乎不起作用。原因是发达国家规定海外企业在所在国交纳所得税不足额的，要补交投资者所在国政府。

我国不仅要考虑引进资本问题，同时也要考虑资本输出问题。输入是为了发展，输出也是为了发展。相对不够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很需要与当地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技术与装备，这些是我们的长处，也是南南之间必须大力发展的经济协作。有些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产品，也有可能以资本方式打进发达国家。只要在这方面用心经营，是大有可为的。

6 南北矛盾

欠发达的南部国家为了发展，迫切需要国际贸易。他们主要是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换取生活消费品和设备。要求这些国家向先进国家出口先进技术和工业品是不现实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本身，就造成了南部国家进口与出口结构的畸形。为了更有利于南部国家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秩序，提高初级产品的出口价，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并希望经济发达国家提供更多贸易优惠条件和支持。

从经济角度看这个问题，南北矛盾不仅尖锐，而且难于解决。发达国家一般并不缺少什么，他们互相之间的贸易，占全部贸易的大多数。即使是农产品、矿产品，比较优势多数也在发达国家这一边。国际贸易是做买卖，无利可图的买卖是做不成的。从供—求原理可知，如果提高不发达国家出口价，必然的结果是减少贸易量。而欠发达国家缺的东西却很多，许多只能从发达国家进口，特别是工业品和技术。南南之间交往在近期内不会太多，因为他们的供给与需求是一个方向的。

我们的经验是：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把国内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用自己的艰苦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这同时，积极争取外援，实行对外开放方针。只要国内政策对头，高速度发展经济是有可能的，南南合作也是大有可为的。因为南部国家已经有一部分摆脱了困境，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坦途，他们的经验和援助将是南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南南国家在政治上，为建立一个对发展中国家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七十七国集团1964年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向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挑战，第一次发出建立国际经济关系的呼吁。1974年，这个南南国家集团在纽约开会，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提出若干基本原则。在联合不懈的斗争中，1974年12月第二十九届联大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75年又通过了《达喀尔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此后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先后通过一系列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件。通过努力，南南国家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旧秩序是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构造起来的庞大体系体现的。

动摇和改革这个体系，难度是很大的。改革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尚且困难重重，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国际经济体制，怎么改可以说不是发展中国家一方就能决定的。西欧成立经济共同体，从科技到政治的联合，保障了经济发展的协调；东欧建立经互会，实行区域性的经济新秩序。这是很富启发性的变革。南南国家有了政治上的松散联合，但还缺乏经济上的联合；南北间的对话有了好的开端，但对于南北的经济联合的目标相距甚远。看来，改革国际经济秩序，首先要有一个总体设想，然后分阶段、有层次地逐步实施。关键在于南北国家间的谅解和联合。

必须指出，任何单方面的愿望和努力，不会产生明显的经济效果。迄今为止，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取得了一些政治性的成果，但这些成果与《宣言》、《纲领》所预期的相差太远，还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7. 东西方问题

东西方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别称，指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各种矛盾关

系。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说的是公有制经济将战胜私有制经济，人民大众将战胜少数剥削者成为社会的主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将战胜落后、贫穷和低效率，共同富裕将战胜两极分化。

凯恩斯曾经用经济学的观点评价战争，认为战争是在过去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就象奴隶制时期驱使奴隶修建金字塔和空中花园一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国际化经济的发展，战争不仅不可能成为解决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工具；相反，战争将破坏生产力，切断社会和国际的经济联系，给人民带来灾难和贫困。

在当今世界上，战争并没有被消灭，军备工业在经济发展中仍然起一定的作用。军备竞赛一方面在浪费资源，一方面在支持动乱，这种愚蠢的行为为什么得不到纠正？主要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用经济眼光看问题，往往是令人费解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平力量的增长，战争在未来有可能避免。

在东西方相容性方面的学术研究，有巨大的经济效益。以苏美为代表的东西方集团用于军备竞赛方面所花的钱(不可否认，也创造了大量财富和发展了生产力)，足以解决地球上的一切自然灾难造成

的饥饿和破坏。如果能把耗费在军备等这方面的力量转向开发沙漠、极地、海洋、地下和空间，人类必将获得空前的进步和繁荣。这些好处与现代战争可能导致的巨大灾难相比，其经济效益是无法计量的。因此，东西方问题是涉及全人类发展和福利的第一大经济问题。和平共处原则和国际裁军的努力，都对缓和东西方关系、发展各国经济带来好处。我国一再宣称决不称霸，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单方面裁减军备，反对国际上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国不需要战争。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也说明，曾经诉诸战争手段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也觉悟到战争对发展现代经济是不可取的。相反，中东战争等局部战争，多少都给日本经济带来损害。日本也不需要战争。如果这种趋势成为东西方之间关系的总趋势，就可以创造一个较长和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

值得在学术上给予充分估价的“一国两制”理论，将是处理东西方问题和一些历史上遗留的棘手问题的重要原则，对指导社会实践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东西两大政治集团，在许多国家也分割成为一国范围内的“东西”政治集团。政治制度的分割，造成经济

上的分割。世界市场是不完备的，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规模受到了制约。经济社会化与国际化对各国都有好处，分割削弱了这些本来应该得到的好处。“一国两制”首先对于处理一国范围内的“东西方”关系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有重大现实意义；进而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与合作有历史意义。

8. 移民与劳务出口

从经济角度讨论移民和劳务出口问题，是一个劳力市场开放的问题。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流动，也可以在国际市场流动。这种流动并不是一种民族转移，也不是政治性的移民，而是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供求力量的推动下，引起的生产因素转移。商品经济是没有国界的，一旦出现壁垒和单向流动，就会出现“堆积”和“虚脱”现象，最终将窒息商品经济的发展。《决定》提出要学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对无阻碍流动政策的表述。

劳动力是中国最深厚最可宝贵的资源。自然经济观认为，劳力流向国外，是“背井离乡”。固守

故土是中国几千年的观念。这些观念无不是与闭关自守、自成体系的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春秋战国时，中华大地上国家很多，并没有很严格的“守土不移”的观念，秦成霸业就吸收了许多“外国人”。封建经济的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成了相应的守土守国观念。过去的管理体制搞的是条块分割，搞指令与附庸关系，自然经济色彩很浓，“守土”观念并没有多少改变。八亿农民困在土地上搞饭吃，每个劳动力平均拥有的土地就不多，加上生产决策权又是由指令性计划控制，农村实际上是自给不足的贫困地区。照道理，从土地上转移出去3/4劳动力，余下的1/4劳力经营现有土地已绰绰有余。劳动力不转移，只能是宝贵资源的积压浪费，劳动力变成了纯消费的人口包袱。人口问题与劳动力政策不合理、劳动力市场关闭有密切关系。不能说，城市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已经解决了。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不能进入市场，还要靠国家安排。已就业的劳动力就生产率而言，许多是闲置的；结构性就业不足也很严重。进企业的工人，只要不犯罪，总是不会被开除的。工厂在收缩时，工人没事干也要由企业养起来。这些都造成了城市的人口问题。城市另一个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的原因是，不承认家庭劳动也是社会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社

会均衡和发展的重要劳动。在劳力过剩、资本不足、工资偏低的情况下，家庭是吸收劳动力的海棉。美国西部的开发主要靠从东部向西部移民而成功的。我国人口重心严重偏向东部，可以借鉴美国经验，由国家推动向西部移民，在西部造成有巨大吸引力的政策环境，鼓励人们到西部去发财致富，这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自从“商品经济”概念建立以来，对国际劳动力市场开放，促进劳力外流是解决中国人口大难题的又一出路。首先，要允许农村多余劳力进入城市；其次要允许劳力进入国际市场。国际劳力市场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不仅没有竞争意识，甚至还认为劳务出口和移民是不爱国行为。有这些障碍，就无法实现劳力的真正进行国际性流动。在中东、欧洲、南斯拉夫、印度、南朝鲜、菲律宾有大量劳力在那里找到了工作，赚得大量外汇，成为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力资源进入国际市场，是一个经济现象，不能把经济上的劳力外流与政治上的“不爱国”等同起来。出国就业可以同爱国统一起来。我国在劳务出口上，最近几年有很大进步，但与中国雄厚的劳动资源相比，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为了推动这种流动，第一要开放国界，简化出国手续，鼓励一切愿意出国就业的人出去，并解除其后顾之忧；第二要针对世界

劳力市场的需要进行劳动力预投资，提高素质，提高竞争力。预投资是可以收回的。主动开发中国资源之中最大的资源——人力资源，将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把这篇文章做好了，中国经济的大难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劳力流动从来是相互的。在中国引进技术和外资时，必然伴随劳力的流入。就是这样互相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结　语

本书初稿在1985年6月完成。在此后的一年里，作过多次修改。中国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适合于商品经济体制模式的宏观经济控制体系。由于这个体系尚未建立，更没有投入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写宏观商品经济学难免缺少中国特色。我希望随着改革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继续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探讨，共同努力，把宏观商品经济学向前推进。

本书上篇的理论基础部分，主要参考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的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下篇在结构上主要参考雷诺兹著的《宏观经济学》（马宾译）。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茅于轼、杜家俊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谢忱。

林一知

于长沙1986年6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